



2012 年 1 月 31 日创刊      2012 年 8 月 30 日第 8 期

## 本期目录

### 〔董国强南京文革研究专辑〕

#### 本刊特稿

#### 董国强简介

董国强 我为什么进入文革史研究“禁区”

#### 史林一叶

董国强 南京大学文革造反第一波

董国强、Andrew G. Walder 南京文化大革命冲突的起源

董国强、Andrew G. Walder 1967 年南京“一月革命”的失败

董国强、Andrew G. Walder “军管”时期的南京

董国强、Andrew G. Walder 江苏省革命委员会的建立

#### 文摘

董国强 社会史视野下的文化大革命研究

### 〔董国强南京文革研究专辑〕

说明：本刊所接触到的活跃于国内外的文革研究者，大多是“40 后”或“50 后”，他们在青少年时期遭遇文革，亲历或旁观了文革前三年“史无前例”的群众运动。因此其研究著述与那些没有亲历文革的人相比，在历史现场感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不过，这段“史无前例”的历史，毕竟是会长期吸引一代代学人的重大课题，必然会有更多的后来者参与其中。令人欣慰的是，近年来已经有一些“60 后”、“70 后”、“80 后”甚至更年青的人投入文革研究并有了一些成果。作为“60 后”的董国强教授，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位。在 60 年代后期那些急风暴雨的日子里，董国强还只是个懵懂无知的学龄前儿童，他怎么会进入文革研究领域？他对那些历史事件和人物有什么独到的见解？他取得了哪些学术成果？他的努力对年轻的研究者有什么启发？这都是令人感兴趣的问题，本刊特编此专辑。也希望有机会为更多的年青文革研究者推出个人专辑。

本专辑中有几篇文章的第二作者 Andrew G. Walder 是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文革研究专家。原文有许多注释特别是英文注释，本刊发表时略有删节或精简。

---

【本刊特稿】

## 董国强简介

董国强，1962 年出生于南京。1981 年考入南京大学历史系。1985 年本科毕业并留校任教，历任历史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兼任南京大学～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客座教授。1998～99 年美国伊利诺大学亚太研究中心访问学者。1999～2002 年在职攻读博士学位。2007 年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访问学者。2008～09 年美国斯坦福大学人文中心暨 Freeman Spogli 国际问题研究院高级研究员。2011 年香港中文大学东亚研究中心访问学者。学术兴趣主要集中在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与社会思潮研究、文革史研究和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等领域。已在 *The China Quarterly*、*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The China Journal*、*The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中共党史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二十一世纪》（香港中文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江苏社会科学》、《民国档案》、《南京大学学报》、《开放时代》、《书屋》等学术刊物上发表各类论文 80 多篇，出版学术著作 5 种。曾独立承担过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美国 Freeman 基金会项目、香港中文大学利希慎计划资助项目和美国斯坦福大学“人文与国际问题研究”资助项目。目前正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中国 60 年江浙地区麻风病防控与社会保障机制研究”和南京大学人文基金项目“江苏‘文革’运动研究”。



### 主要学术论著

#### 一、著作：

《亲历“文革”——十四位南京大学师生口述历史》，美国纽约柯捷出版社，2009

《文革》（日文版），日本筑地书馆，2009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及其政治思潮研究》，美国溪流出版社，2009

《遥想盛世——人治的理想与现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

另外，参加了《江苏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卷》（凤凰出版社，2012）、《国共两党关系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的写作。

#### 二、论文选目（英文论文略）

社会史视野下的“文化大革命”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12 年第 2 期  
1957 年江苏某些地区中小学反右运动初探，《中共党史研究》，2010 年第 12 期

对五十年代农村改造运动的再探讨，《中共党史研究》1997 年第 4 期

关于 1950—60 年代中国外交的几个问题,《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 年第 2 期

评《剑桥中华民国史》中关于毛泽东思想的研究,《毛泽东思想论坛》1997 年第 4 期

论建国初期的国内主要矛盾,《南京大学学报》1995 年第 1 期

试论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若干失误,《南京大学学报》1996 年第 4 期

略论新理论新方法在史学研究中的应用,《江苏社会科学》2004 年第 1 期

对《南街社会》的不同看法,《中国图书评论》2005 年第 2 期

警惕“现代化”的陷阱——《文化、权力与国家》读后,《开放时代》1998 年 10 月号

历史档案中的“毛时代”,《二十一世纪》(香港中文大学),2012 年 2 月号

一个西方社会学家眼中的红卫兵运动,《二十一世纪》(香港中文大学),2011 年 8 月号

一个神话的诞生与破灭,《二十一世纪》(香港中文大学)2003 年 4 月号

何谓“大历史”、“小历史”和“西方”、“本土”之分野?《二十一世纪》(香港中文大学)2003 年 6 月号

令人着迷、令人困惑的“主义”,《二十一世纪》(香港中文大学)2004 年六月号

知识分子改造的歧路,《二十一世纪》(香港中文大学)2005 年 4 月号

“边缘知识分子”的桥梁作用,《二十一世纪》(香港中文大学)2006 年十月号

一代革命者的心理肖像,《二十一世纪》(香港中文大学)2008 年 6 月号

道德原则冲突下的囚徒困境,《二十一世纪》,2010 年 4 月号

思想的印迹——南京大学李良玉教授《思想启蒙与文化重建》评介,《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02 年第 3 期

“王实味现象”解析,《书屋》2004 年第 3 期

张春桥宦海沉浮与“文革”悖论,《书屋》2009 年第 2 期

王申酉:一个以身殉道的先知,《现代人文评论》2004 年第 8 期

异邦的想象与想象的异邦,《中国书评》第 3 辑,2006

戴著思想的枷锁翩翩起舞——评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红岩春秋》2008 年第 1 期

1966 年夏:南京大学“六二事件”的来龙去脉,《领导者》(香港)总第 9 期,2006

大陆学界红卫兵运动研究述评,《二十一世纪》(香港中文大学)网络版 2006 年 5 月号

从南京大学“倒匡”事件看“文革”的复杂属性与多重面相,《二十一世纪》(香港中文大学)网络版 2006 年 9 月号

江苏“一·二六夺权”前后的权力角逐,《二十一世纪》(香港中文大学)网

络版 2007 年 6 月号

1967 年夏天南京“倒许”风潮的台前幕后,《二十一世纪》(香港中文大学)网络版 2006 年 11 月号

从南京大学“清队”运动看“文革”主要矛盾的转化,《二十一世纪》(香港中文大学)网络版 2008 年 1 月号

1976, 南京全城排查匿名信,《党的生活》2006 年第 5 期

1967 年南京“一·三事件”浅析,《记忆》,第 67 期,2011 年 1 月 30 日

新中国阶级关系的解构与重建,《记忆》,第 60 期,2010 年 10 月 20 日

革命? 还是帝王政治的回光返照?《当代中国研究》(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当代中国研究所)2009 年秋季号

“林彪事件”与江苏军管的终结,选入启之、何蜀主编之《温都尔汗的幽灵:林彪事件——“九一三”四十年后的回忆与思考》,台湾: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2

---

【本刊特稿】

## 我为什么进入文革史研究“禁区”

董国强

我 1985 年毕业留校以后,南京大学历史系领导指派我给郭勋老师当助教。两年后郭老师退休,我开始独立承担“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课程的教学工作,同时进行相关的学术研究。将 1949 年以后的历史纳入“中国通史”教学体系,南大历史系走在全国的前面。

1980 年代是中国思想界和学术界“新启蒙”运动的高潮时期。在“解放思想”、“开拓创新”的主旋律之下,如何解构与重构近现代中国历史的认知体系,是当时史学界关注的焦点之一。而“当代中国史”研究则到处是未开垦的处女地。我在这样的历史氛围下投身学术事业,内心是十分兴奋的。不过当时面临的问题,是不知道如何做学术研究。所以尽管杂乱无章地读了许多流行的书籍和文章,尾随“热点”话题做了一些漫无边际的理论思考,却没有写出什么像样的东西。

进入 1990 年代后,国内的学术环境发生了显著变化,喧嚣一时的“文化热”讨论逐渐转入低潮。我个人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也受到一定的影响。为了应付业绩考核和职称评审,我不得不在现有的认知体系中选择了一些可以讨论的小问题,写了一批“急就章”式的论文。其中发表在《南京大学学报》和《中共党史研究》上的两篇文章,从不同角度探讨 1950 年代合作化运动的得失,在国内学界产生了一定反响。

1998 年春评上副教授以后不久,我有机会参加一个校际交流项目,赴美国伊利诺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做为期一年的访问研究。美国 **Freeman** 基金会资助这个交流项目,目的在于使中国的青年学者有机会直接接触西方的高等教育和学术研究。而我个人的最大收获,则是对西方近代文明和美国社会生活的亲身体验。在

这个过程中，一些此前形成的固有观念受到严重冲击，一些新的观念意识在不知不觉中悄然萌动。例如，通过参加当地教会组织的“Bible Study”和社区活动，我意识到西方社会宗教现象的存在，不但基于人们固有的宗教情结，而且基于哲学意义上的追问和现实生活中的种种需要。而当年轰动一时的“克林顿性丑闻”事件，以及美国各大媒体和社会公众的反应，则使我对美国政治有了更直观、更全面的认知。我后来将自己的观察与思考写成小文章，发表在《读书》和《书屋》上。

在此前后，南大校方为提升本校教师的学术水平和学历层次，规定本科毕业留校的教师都必须在职深造。因而我回国后不久，即师从崔之清教授攻读“中国近现代史”博士学位。我的博士论文选题，是“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及其政治思潮研究”。这个选题在时段上属于“民国史”的范畴，然而促使我选择这个题目的动因，却是1990年代中后期发生的“新左派”与“新自由主义”之间的论争。我当时希望搞清楚的几个历史问题是：第一、近代中国是否存在自由主义传统？第二、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有哪些？第三、近代中国的自由主义思潮与其西方母本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异同？而要很好地回答上述问题，当然必须首先搞清楚什么是“自由主义”。换言之，我当时希望借助“思想史”研究，探讨“历史”与“现实”之间的某些内在关联，同时在“学术兴趣”和“研究对象”方面找到某种平衡。

2002年底，我完成了博士论文的研究与写作，并顺利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我对上面提到的几个问题的回答是：第一，近代中国确实存在着自由主义传统；第二，近代中国自由主义思潮的鼎盛时期在1930年代前后，其杰出代表人物是以胡适为首的“人权派”和“独立评论派”知识分子群体；第三，近代中国自由主义思潮在具体的政治主张和社会主张方面带有一些“中国特色”，但是在“自由”、“共和”、“宪政”等核心观点上，与其西方母本一脉相承。我还指出，国内学界之所以在上述问题上众说纷纭，关键在于许多论者对“自由主义”概念及其理论内涵存在严重误解。例如，自由主义理论体系中的所谓“自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不受约束的状态，而是受到法律保障的权利。客观地讲，我在博士论文中提出的一些看法，在“自由主义”观念体系及其发展史的学术探讨方面的创新意义并不太大，但对于廓清当时国内学界的一些糊涂认识、增进人们对“自由主义”概念的全面深入了解，还是有些帮助的。更重要的是，通过这项研究工作，我个人的理论素养和历史认知水平都有很大的提高。

2003年初，南大“民国史”研究中心与北京“三联”书店签订了一份合作出版协议，计划在当年推出一套“民国史研究丛书”。我的博士论文也在其中。不料数月后北京“三联”突然打来电话，说他们接到上级指示，规定有些选题的书籍不宜出版。与“自由主义”概念有关的选题也在其中。我得到这个消息后，真是欲哭无泪：正是为了尽量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我才自觉地将自己的博士论文研究延伸至“民国史”领域。然而最终得到的，却是这样的结果！

在彷徨、苦闷、焦虑、沮丧情绪相互交织的情况下，我渡过了近两年的黯淡

时光。成天萦绕脑海、挥之不去的两大问题是：

**还要不要继续从事学术研究？**

**从事怎样的学术研究？**

2005 年春天，通过一个偶然的機會，我意外地獲得了由旅美學界宋永毅先生主編、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的《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盤。該光盤收錄了 3000 多万字的原始資料，內容涉及北京和全國各地的文革運動。尤其難得的是，該文庫收錄了許多當時的中共中央文件。這對我們了解中央高層的決策過程和宏觀層面上的文革運動，提供了極大的便利。而在此前的長期學術閱讀中，我對採用微观實證的路徑研究文革運動也有相當的了解。北大教師印紅標關於北大“聶元梓大字報事件”的研究，清華教師唐少杰關於清華“百日大武鬥事件”的研究，都給我以很大的啟迪。因此，我當即決定以南大為突破口，專題研究南京地區的文革群眾運動。而且我當時還樂觀地估計：2006 年是文革爆發 40 周年和文革結束 30 周年，國內學界和新聞出版界一定會對這個選題有所關注。然而後來的實際情況證明，我當初的樂觀估計是完全錯誤的：在 2006 年，國內學術期刊和文史類雜誌上極難看到關於文革的文章；與此同時，國內為數眾多的各類出版社也幾乎沒有推出一本與文革有關的新書。文革史研究似乎成了一個心照不宣的“禁區”！

但我個人的研究並未因此受到太大影響。因為在博士論文的出版遭受挫折後，我已經下決心放棄“曲線救國”的策略，不再考慮業績考核和職稱晉升問題，安下心來只做自己真正感興趣的研究。其次，我確實在研究文革的過程中得到了很大的樂趣。

概要說來，我的文革研究以社會史視角切入，關注的重點是單位內部和地方上的群眾運動。之所以選擇以南大為突破口，首先是因為追根溯源，文革運動的起點是“文化的革命”，眾多的文教單位在這場運動中首當其衝。在此背景下，作為具有全國影響的重點大學之一，南大自然而然地成為南京文革運動的發源地，並在此後持續不斷的矛盾衝突中始終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南京地區幾大群眾組織，都是以南大的學生和青年教師為領導核心的。其次，我自己作為“南大人”，無論在“地利”還是在“人和”方面，都有著一般研究者所不具備的獨特優勢。我的研究工作是从對身邊一些熟悉的人的訪談開始的。經過近兩年的走訪，我逐漸接觸到一些南京文革運動中的風雲人物，同時也通過各種渠道收集到一些重要的歷史文獻。在整理訪談資料和閱讀歷史文獻的過程中，南大和南京文革群眾運動的歷史影像在我的腦海中逐漸清晰起來。這些生動活潑、豐富多彩的历史影像，不但徹底顛覆了國內主流輿論關於文革群眾運動的“妖魔化”解釋，而且對西方學界盛行多年的“社會衝突理論”形成巨大衝擊。在深入扎實的實證研究基礎上，我逐步提煉並回答了以下幾個重要的理論問題：

中央的文革號召對於一般幹部群眾意味著什麼？

群眾性造反運動的動力有哪些？

為什麼在群眾運動中會出現激烈的派性鬥爭？

我的第一批系列研究论文陆续发表在香港中文大学主办的《二十一世纪》学术期刊上，在国内外同行中引起了相当程度的关注。

2007年夏天，我的“南京大学与江苏‘文革’运动研究”选题获得香港中文大学“利希慎访问学者资助计划”资助，使我有机会前往该校“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做为期一个月的访问研究，并在那里做了专题学术讲演。此后我又凭借“社会史视野下的南大‘文革’运动研究”选题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胜出，获得美国斯坦福大学人文研究中心2008~2009年度高级研究员职位。在美期间，我先后应邀在斯坦福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和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做过专题学术演讲。此外，我还开始尝试用英文撰写与发表我的研究成果。我的第一篇英文论文，是我在哈佛大学专题演讲的基础上修改完成的。这篇论文的标题翻译成中文是《南京大学的第一波造反浪潮：动力、性质与诠释》，发表在哈佛大学学报《冷战史研究季刊》（**The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上。

我的其他几篇英文论文，则是与斯坦福大学资深教授、著名中国问题专家**Andrew G. Walder**教授合作的成果（发表时均以我为第一作者）。**Walder**教授研究文革的时间长达30多年，对上海和北京的情况尤为熟悉。由于所采用的研究路径和对文革的整体理解不谋而合，所以我们两人一见如故，合作得非常愉快。我们的合作论文分别以“造反”、“夺权”、“军管”、“大联合”和“批林批孔”为主题，深入、系统地探讨了群众运动的动力、派性冲突的起源和派性斗争持续存在的多重原因等重大理论问题，后来陆续发表在著名的英文学术期刊《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亚洲研究季刊》（**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和《中国研究半年刊》（**The China Journal**）上。这种合作研究极大地拓展了我的学术视野，使我对西方的文革研究和西方学界的一般学术规范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同时也为我自己赢得了一定的国际声誉。

在我个人的学术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同时，国内的学术研究环境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国内各重点大学纷纷积极致力于“争创国际一流大学”的过程中，文科教师的**SSCI**论文成为一项非常重要的业绩考核指标。在此背景下，我耽搁多年的职称问题也在2010年迎刃而解。更重要的是，我在文革专题研究中积累起来的当代史知识与研究经验，使我在未来研究选题的抉择方面获益。我2010年申报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中国60年江浙地区麻风病防治和社会保障机制研究”获得批准立项，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这个课题试图以疾病防治问题为突破口，全面考察新中国60年来地方上的行政管理和社会生活，在实证研究和理论探讨方面都存在巨大的开拓空间，有望产生一批令人满意的研究成果。

综上所述，我在过去的30年中有过彷徨与苦恼，但更多地是享受着从事学术研究所带来的乐趣。我并不后悔当初选择历史研究作为职业，因为在长期的实践中，我已经逐渐形成对历史研究的独特理解。在我看来，所谓“历史研究”，其实无非就是听故事、读故事、讲故事、写故事。我在过去的几年中始终处于一种痴迷状态，乐此不疲，是因为研究过程中的每一个新发现不但会带给我惊喜，而且会成为下一个新发现的动力。而我不停地进行学术写作，不过是为了与他人



分享这些新发现的喜悦。我就这样“痛并快乐”地生活着，而且打算这样“痛并快乐”地生活下去。

---

【史林一叶】

## 南京大学文革造反第一波

董国强

按：本文译自英文，原标题为 *The First Uprising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t Nanjing University: Dynamics, Nature and Interpretation*，发表于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联合出版之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Vol. 12, No. 3, Summer 2010, pp. 30-49。为便于国内读者理解，作者对行文和语汇略有改动。原文的注释本刊有删节或精简。

混沌理论说：一只蝴蝶在巴西偶然煽动几下翅膀，有可能间接地引发数月后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如果我们将这个理论应用到中国文化大革命研究中，毛泽东无疑就是那只蝴蝶。许多关于中国精英政治研究的中英文论著，已经很好地解释了毛为什么要煽动他的翅膀。然而如果没有对当时大众政治的深入研究，我们依然无法解释为什么毛的翅膀煽起的微风最终会给中国带来如此严重的灾难。本文试图借助南京大学的个案研究深入探讨上述问题。

新华社关于南京大学“六二”事件的长篇报道在1966年6月16日《人民日报》头版上发表，并配发重要社论《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使南大在文革初期闻名全国。实际上，这个事件是紧接北京大学“聂元梓大字报事件”之后又一个具有全国影响的重要事件。然而与北大事件受到广泛关注的情形不同，迄今为止，国内外学界尚无关于南大事件的研究论著发表。

尽管《人民日报》对南大事件和北大事件作了类同的诠释，其实这两个事件的起因和过程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北大“聂元梓大字报事件”与精英政治有着非常直接的关联。对宋硕（北京市委大学工作部副部长）、陆平（北大党委书记兼校长）和彭珏云（北京市委大学工作部干部、新任北大党委副书记）的批判，是由康生和他的妻子曹轶欧背后主使的。他们都附属于毛身边的激进主义小集团。他们策动这场批判运动的目的，在于揭露北京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教育路线”的“罪行”，为清洗北京市委书记彭真提供合法性依据。

南大“六二事件”的背景则大不一样。许多相关史料显示，直到1967年“一月风暴”爆发时为止，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始终受到毛和其他中央领导人的信任和保护。而南大党委书记兼校长匡亚明，也因其在“四清”运动期间的积极表现得到过毛的赞许（1965年6月，匡亚明授意《南京大学学报》发表三篇由南大文科青年教师撰写的文章，主题是论述个人在“四清”运动中的思想转变。据说毛泽东看过这些文章，并表示赞许。匡亚明当时非常得意，多次向别人提及此事。秦浩访谈，南京，2007年2月8日。秦当时是青年教师，在南大党委宣传部工



作。他的说法与其他几位访谈者的叙述吻合)。因而,南大事件与党内高层清洗没有直接关联,而是校园内部冲突结果。

本文旨在解释,一个地方基层单位内部的细小争端如何演化成一个具有全国影响的重大事件。南大事件深刻揭示了文化大革命对普通人意味着什么,以及他们如何在运动中主动或被动地扮演某种角色。匡亚明和学生之间的关系由团结走向分歧,再由分歧走向对抗,实际上源于一系列的误解。而这些误解与当时中国政治中的组织架构、行政原则和意见沟通方式等因素有关。本文关于南大个案的论述,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示了文化大革命的复杂性,可以帮助中国问题研究者更好地理解毛时代中国政治的本质内容及其显著特征。

### 政治实践中的悖论:“六二”事件的背景

要很好地理解南大“六二”事件,就必须了解毛泽东时代中国政治的两大原则——“党的领导”和“民主集中制”。这两个概念实际上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在所有的政治与经济事务中的不容挑战的权威和各级党组织“一把手”领导下的高度集权的决策机制。任何未经党中央和单位内部党组织负责人同意的行动都是非法行动。对各级党员干部提出批评即意味着“反党”,而“反党”是十恶不赦的大罪。这些原则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得到强化。由此带来的结果是,每当任何新的政治运动到来时,没有人敢于表达不同意见。相反,每个人都会积极地对这些运动表示认同,都会声称自己是运动的坚定支持者。

然而,至少在某些情形下,不同意见总是会出现的。而且,“党的领导”实际上涉及到成千上万的各级领导干部。中国幅员辽阔,地区之间的差异很大。因而在很多时候,党中央向全国各地发出的指示往往仅限于指明前进的大方向。如何结合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情况,把这些指示转化成具体的、可操作的政策和措施,是各级领导干部的任务。作为不同个体,他们对中央指示的理解往往会受到个人的认识水平和他们所面临的特殊环境的影响。所以在正常情况下,政策实施过程中的某些差异是允许存在的。但是如果一个单位内部已经存在不和,持不同意见的人就可能指责单位党组织负责人违背中央的指示。在这样的情况下,反对派们其实并不反对“党的领导”,而是把在北京的党中央看作“党的领导”的合法性源泉。而那些基层党组织负责人,则会借助“党的领导”原则和1957年反右运动经验,给反对派们贴上“右派”、“反党分子”的标签,加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因而,尽管“党的领导”是一个普遍公认的原则,但在基层单位内部,党组织领导人和被领导者们之间依然可能存在矛盾冲突,尤其是在一个或多个基层干部被判定没有“正确”执行中央指示的时候。

此外,在毛时代,当局的政治意向是通过一系列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实现的。每次运动都会留下一批牺牲者和一些政治裂痕。这些反覆无常、不期而至的政治动荡,使得绝大多数普通人——包括像匡亚明这样的基层干部——内心充斥着巨大的不安全感。所以每当一场新的运动来临时,每个人脑海中闪过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如何避免成为被牺牲的羔羊。对最高权威的无条件服从和积极迎合运动的各

项要求，是最重要的自我保护方法。而且，那些预感到自己可能会成为运动目标的人，往往会先下手为强，极力扭转运动的导向。由此可见，尽管毛时代的中国希望造就一批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社会主义新人”，而实际的结果却是造成一种畸残的社会心理：只要能够保护自己，牺牲其他任何人都无所谓。南大事件就是这种背景下的产物。

### 创办溧阳分校：一个取悦毛的行动

“六二”事件并非发生在地处南京市中心的南京大学校本部，而是发生在距离该市约 60 英里外的溧阳分校。到溧阳农村创办分校是南大党委书记兼校长匡亚明的主意，旨在对毛泽东在 1964 和 1965 年对中国高等教育——特别是文科教育——现状的若干批评意见作出积极回应。1964 年农历春节，毛在与其他中央领导人闲谈时说：“现在课程多，害死人，使中小學生、大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学生成天看书，并不好，可以参加一些生产劳动和必要的社会活动。”（毛泽东《关于教育革命的谈话》，《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1 册，第 22 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6）1964 年 8 月，毛在接见尼泊尔教育代表团时说：“文科要把整个社会作为自己的工厂。师生应该接触农民和城市人，接触工业和农业。不然，学生毕业，用处不大。”（毛泽东《教师要向人民群众学习，文科要以社会为工厂》，《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1 册，第 149-150 页）1965 年 11 月，毛在视察各地的途中说：“现在的教育制度要改革，……大学文科只要两年半到三年，要办抗大式的学校。”（毛泽东：《在一次视察各地工作时的讲话》，详见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大学服务中心，2002）1965 年 12 月，毛在杭州会议上说：

要改造文科大学，要学生下去搞工业、农业、商业。……大学如果是五年的话，在下面搞三年。教员也要下去，一面工作，一面教。哲学、文学、历史，不可以在下面教吗？一定要在大洋楼里教吗？（毛泽东《改造学校教育让学生接触社会实际》，《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1 册，第 493 页）

根据毛的意见，中央高教部于 1965 年 12 月在北京召集全国大学校长会议，要求各个学校着手进行试点工作。（王德滋主编《南京大学百年史》，第 367 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1966 年 1 月中旬，南京大学党委作出“关于建立溧阳分校的决定”。这个文件高度颂扬了毛的关于缩短大学教育年限、打破传统学科划分、鼓励教师学生更多地参加社会实践的主张，倡议将南大文、史、哲三系迁往溧阳农村创办文科分校，实行“半农半读”的教育模式。该文件还指出：

办好分校的关键在于，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教育全体师生员工树立一心为革命的精神，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百折不挠地坚持半农半读的方向，像大庆人那样把冲天的革命干劲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广大群众的创

造性，不断总结经验，遵循毛主席关于勤俭办一切事的批示，采取各种革命办法，自力更生地把溧阳分校办好。（《南京大学党委关于建立溧阳分校的决定（草案）》，《南大百年实录——南京大学史料选》下卷，第 96-97 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匡亚明提议创办溧阳分校，部分地基于他在党的组织系统中的特定角色。作为一个基层党委负责人，他必须对上级的各种号召作出热烈的回应。与此同时，上述激进办学蓝图还与他个人的教育背景有关。匡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大学教育。他从他的家乡江苏丹阳的高中毕业后前往上海，成为一名激进文学青年，后来被“上海大学”接纳。（席与齐《匡亚明同志的革命生涯》，《匡亚明纪念文集》，第 61 页，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尽管被称为“大学”，这个“上海大学”其实和毛泽东提到的延安“抗大”一样，是中共出资创办的培训机构，其教学内容主要是向学生灌输革命精神和动员民众的技巧，以便他们将来为党工作。由此可见，匡对毛的教育革命思想的追捧，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他个人的带有些许怀旧色彩的革命激情。

由于匡的提议直接源自毛的指示，所以很快得到中央高教部的批准。中共华东局和江苏省委也对此表示支持。（侯夏、胡康《揭穿匡亚明办溧阳分校的内幕》，南京大学八二七革命串联会所编《新南大》第 6 期，第 13-16 页，1968 年 1 月印发）绝大多数教师和学生一方面源于理想主义的激情，另一方面源于对中央权威的畏惧，也作出积极反应。于是这个提议很快被付诸实施。2 月底，在匡的率领下，南大文、史、哲三系 500 多位学生和教师前往溧阳农村。为了体现“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师生们没有乘坐汽车，而是高举着红旗，唱着革命歌曲，徒步行进。他们用了三天时间才到达目的地。（王德滋主编《南京大学百年史》，第 367 页）

## 分歧的酝酿

溧阳分校校址原来是一个集体农场。从 3 月到 5 月，文科师生们一直忙于新校园的基础建设工作。为了探寻匡亚明和学生们冲突的原因，笔者采访了不少亲历“六二”事件的教师和学生。尽管他们对匡创办溧阳分校的动机有着不同看法，但绝大多数人都提到溧阳经历中的几个情况。笔者认为正是这些情况很快引发不和。

**第一，艰苦的建校劳动。**当 500 多名教师和学生抵达溧阳农场时，当地除了 30 多间供农场工人及其家庭居住的房屋外，没有其他建筑。所以，师生们的首要任务就是尽快建造一批宿舍、食堂和办公、教学用房。按照匡提出的“自力更生”原则，所有的基建工作都要由教师和学生承担。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从未参加过如此强度的体力劳动。一位哲学系的学生回忆说：

建房子没有现成的材料，我们就到 30 多里外的深山里去开采。我们在石洞里劳动，拉黄沙，拉石子，这些都是我们学生自己干。……我们

每天劳动十一二个小时，几天以后就累垮了。有一天，我们班有个男同学累得晕倒在地。把他送到校医院后，其他同学都很羡慕他：他可以不用劳动了，而我们还得继续劳动。（经盛鸿访谈，南京，2006年10月3日）

**第二，艰苦的农村日常生活。**即使在今天，中国城市和乡村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质量依然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当年创办溧阳分校时，师生们的日常生活显然遭遇到更大困难。仓促之间建造起来的房屋——或者叫“干打垒”——是延安时期革命精神的一种突出象征。这种房屋的建筑材料仅限于石头、沙子、毛竹、稻草和油毛毡，夏天不隔热、冬天不保温。碰到雨雪天气，情况就变得更糟。一般情况下，一个大房间里要住70~80个学生，个人的卫生和隐私根本无从谈起。一位历史系的学生还在访谈中提到另外一些困难：

当时大家最感到头疼的是缺水。当地有一个小水库，原来供应当地几十户老乡的用水，问题并不太大，但是我们一下子去了五百多人，用水就显得有点紧张了。匡校长想了很多办法寻找地下水源，结果都失败了。因此盛夏来临的时候，大家开始担心起来，会不会在外面劳累了一天，晚上回来洗澡都洗不上？……还有一个就是蚊子。那比南京的蚊子厉害多了。谁愿意呆在农村受蚊虫叮咬呢！因此都想回到南京去。（崔之清访谈，南京，2006年3月1日）

**第三，一些学生对学业的忧虑。**为了尽快完成基础建设，学生们在最初的三个月中并未实行“半农半读”模式。所谓“学习”仅限于早晚抽空看看报纸、听听广播。而且这样的“学习”往往是政治导向的，目的在于使学生对校园外面的革命大批判运动有所了解。专业课学习被完全放弃。这引起许多学生对匡的不满。有人公开提出质疑，他们的大学教育最终是否会一无所获？（蒋广学访谈，南京，2006年3月9日。蒋当时是青年教师，在溧阳分校政治部工作）

最后，随着毕业时间（通常在6月底）日益临近，一些毕业班的学生开始担心匡的教育改革是否会延误他们的工作分配。（蒋广学访谈）

上述情况孕育着一个共同的愿望，那就是早日返回南京，恢复正常的大学生活。在溧阳呆的时间越长，这个愿望就变得越来越强烈。不过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没有人敢于公开、直接地表达这样的愿望。

### 溧阳分校的大字报：两种不同的动机与含义

6月2日早晨，溧阳分校的师生们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中获悉北大“聂元梓大字报事件”。当天中午，分校校园里出现了第一张大字报。随后在下午和傍晚，更多的大字报涌现出来。根据事后统计，有270多位学生和教师贴出了大字报。这就是所谓“六二大字报事件”。尽管这些大字报极少流传下来，但是通过阅读1966年6月16日《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新华社长篇报道、文化大革命期

间南大红卫兵编印的大批判资料和走访许多亲历者，我们还是可以知道这些大字报的主要内容（笔者看到的唯一幸存下来的大字报，是“溧阳分校政治部按语与解放军报社论唱反调”。这张大字报的作者是13位历史系学生，后来被收录在南京大学八二七革命串联会所编《八二七的光辉旗帜》，第23-24页）。其动机和含义可以大致分为两类。

第一类大字报涵盖了这批大字报中的绝大多数，是长期的政治规训所引发的一种自然的集体反应。很多人写大字报或者在别人的大字报上签名，只是一种简单的从众行为，目的在于表现对党中央的忠诚，争取当局的政治信任。这些大字报的标准格式，一般都是先对聂元梓等人的“革命行动”表示热烈支持，然后再对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展开笼统的批判。因而，除了那些已经被中央锁定的目标，这些大字报不会对任何其他其他人造成伤害。

相比而言，第二类大字报则包含着更多的个人真实想法。在充分展现与第一类大字报相同的政治姿态的同时，这类大字报往往试图将对北大事件的讨论延伸到南大，并对学校当局提出隐晦的批评。这类大字报的典型样本是“十问匡校长”和“溧阳分校政治部按语与解放军报社论唱反调”（这两张大字报均被1966年6月16日《人民日报》报道提及。所谓“溧阳分校政治部按语”是匡亚明亲自起草的一个有关文艺批评问题的文件，大致反映了与彭真主持起草的《二月提纲》相类似的观点）。不过这类大字报的数量极少。

创办溧阳分校是引发学生们不满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在毛时代的中国，严苛的禁限使得人们的不满情绪无法公开、直接地表达出来。现在受到北大事件的启发，南大的学生们尝试采用一种更激进的话语策略来实现自己的诉求。所以在个别大字报和一些私下谈论中，有人指称匡亚明提出到溧阳农村创办文科分校，是为了把广大教师和学生同正在轰轰烈烈展开的文化大革命运动隔绝开来。还有人指称，匡让教师和学生整日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目的在于借此阻止他们参加政治学习和革命大批判运动（崔之清等人访谈。这些看法后来得到以下史料的支持：侯夏、胡康《揭穿匡亚明办溧阳分校的内幕》，南京大学八二七革命串联会所编《新南大》第6期，第13-16页，1968年1月印发。《回忆六二事件》，《八二七战报》，1967年6月2日，第二版。《六三反革命事件前前后后》，《农奴戟》，1967年6月1日，第四版）。这种在特定的历史氛围下形成的激进话语策略，是导致南大以及其他许多地方分歧与摩擦不断激化的重要一步。

### 匡亚明的“反击”：冲突的升级

尽管匡亚明创办溧阳分校的倡议包含着个人升迁方面的诉求，不过这样的个人诉求与他对党的事业的忠诚是并行不悖的（匡曾在许多场合谈到，他要把南大溧阳分校办成我国教育领域的一个先进典型，像工业领域的大庆和农业领域的大寨一样。如果真能做到那样，必然会大大提升他在党内的地位。参见侯夏、胡康《揭穿匡亚明办溧阳分校的内幕》，南京大学八二七革命串联会所编《新南大》第6期，第13-16页，1968年1月印发。蒋广学、崔之清等人访谈）。因而，他



对少数学生提出的“蓄意破坏文化大革命”的指控异常愤怒。在他看来，溧阳分校大字报事件是1957年鸣放～反右运动的翻版。学生们贴大字报批评他这样的领导干部，就是挑战党的领导权威本身。能否尽快遏制这股逆流，是对其领导能力和组织忠诚的一大考验。与此同时，匡的内心也充满疑虑。作为一个基层党员干部，他显然无法确知毛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然而基于长期的经验，他知道到这样的运动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早在“六二”事件发生前，匡在学习“五一六通知”时，就意识到“问题严重，提的尖锐，把我们这些人都包括在内了”（《匡亚明覆灭前的挣扎》，《新南大》，1968年5月16日，第四版）。所以他必须利用其领导地位小心地操控运动，使自己免受来自各方的指责。他采取的第一个步骤，是在5月底成立了一个党委领导下的“文化革命办公室”，对全校师生进行摸底排队，并将他们分为四类，其中被归于“第四类”（问题最严重）的70多人是运动的重点目标。了解上述背景，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六二”事件会迅速演化成激烈的对抗。（《匡亚明覆灭前的挣扎》，《新南大》，1968年5月16日，第四版）

匡于6月2日当晚赶到溧阳分校，召集全体党员大会部署反击。6月3日早晨，他再次召集党员干部会议，指示所有党支部书记和政治辅导员加大反击力度，狠狠打击那些卷入大字报事件的师生。为了显示其坚定的政治立场，匡反复告诫与会者：“对这些右派和反革命分子，绝不能心慈手软。你们必须对他们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把他们彻底批倒、批臭。如果有人被斗死了，直接拖出去喂狗！”（胡才基访谈，南京，2007年4月22日。许多其他访谈者的回忆支持胡的说法。）

溧阳分校召开了几次大型批斗会，十多名教师和学生被选作“重点打击对象”。各班的党员、团员和其他政治积极分子都被动员起来，强迫那些贴大字报的同学交代罪行。一位亲历者对当时的批斗会场景作出了如下生动描述：

首先批斗几个教师，包括政治系的林××、中文系的胡××、外语系的苏××等人。这些老师当时三十多岁，而我们都是一些年轻学生，所以匡校长认为贴大字报是他们策动的。老师批斗完了，就开始批斗学生干部。第一个被批判的是南京大学学生会主席、中文系的胡才基，他的年龄比较大，是调干生，老共产党员。第二个受到批判的是中文系的孙家正，他是中文系的团支书。此外还有政治系的学生朱英才等人。他们都被认为是大字报事件的幕后主脑。……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批斗会，当时内心充满恐惧。所谓“批斗会”，就是一旦哪个人被确定为批斗对象，立刻就发动群众起来，不管真的假的，统统的往你身上扣，上纲上线，甚至要侮辱你的人格，你根本没有分辩的余地。批斗者使用的都是“阶级分析”的观点，平时的各种言行表现，包括个人之间某些极为私秘的问题，统统被揭发出来，使人有一种被剥光衣服、赤身裸体的感觉。看到平时我们尊敬的老师被学生围在中间批斗，甚至于有的人开始动手，我们当时站在后面就感到恐怖。（经盛鸿访谈）

上述回忆得到其他史料的支持。其中提到的几个人——

胡才基 1934 年出生于一个山东农村家庭。成年后参加革命工作并入了党。1962 年，他作为“调干生”进入南大中文系学习，很快被任命为校学生会主席。“六二”事件后，他被江苏省委钦定为南大第一批“造反英雄”。红卫兵运动兴起后，他组织了“南京大学红旗战斗队”，持捍卫工作队和省委的立场，与新的造反派红卫兵组织公开对抗。1967 年 1 月省委垮台后，他逐渐淡出群众运动。后因毕业分配离开南大。1976 年文革结束后，他被任命为江苏省教育局副局长。在 1980 年代初清查“三种人”时，匡亚明对他提出指控。但是他得到时任省委书记的许家屯的保护。后来许家屯赴香港担任要职，胡也随他而去。1989 年许家屯叛逃美国，胡的仕途大受影响，不得不提前退休。

孙家正，出生于革命烈士家庭，文革爆发时是中文系三年级学生，团总支书记。“六二”事件后，他也跻身于南大第一批“造反英雄”行列。后来又加入“红旗战斗队”保卫江苏省委，直到省委垮台。1968 年毕业后下放农村基层锻炼。自文革后期起，历任县委副书记、团省委书记、省委副书记、文化部长等职。

朱英才，文革爆发时是政治系三年级学生，是党员、学生干部。“六二”事件后成为南大第一批“造反英雄”，后来也参加过“红旗战斗队”保卫省委的活动。1968 年被分配到解放军总后勤部下属的一个部队宣传单位工作。其后情况不详。

根据当时正式公布的数据，在 6 月 2 日至 5 日间，有 70 多人在各类“批斗会”上遭到批斗，其中学生 64 人，教师 4 人，工人 2 人。他们当中有 9 名党员，22 名团员。（《南京大学揪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匡亚明》，《人民日报》1966 年 6 月 16 日，第 1 版）还有许多学生虽然没有当众接受批斗，但在那几天也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崔之清访谈。崔的叙述与其他一些访谈者的叙述相互吻合）。

匡的反击存在着致命的错误，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第一，他错误地判断了绝大多数大字报的动机和含义，过分高估了反对者的数量和实力，毫无必要地为自己树立了大批敌人。

第二，他将十数位老师和学生确定为“重点打击对象”，是一个更大的错误。没有任何证据支持他的主观判断——即这些人是大字报事件的幕后主谋。例如，外文系的苏寿祁老师虽然应学生们的要求在一张大字报上签了名，但他丝毫无意挑战匡的领导权威（苏寿祁电话访谈，2006 年 4 月 8 日）。而那些学生干部——如胡才基——则出于其党员身份的考量，曾拒绝在同班同学的大字报上签名（胡才基访谈）。

第三，还有许多人因为匡在部署反击时的某些过激言论，例如“对右派和反革命分子绝不能心慈手软”、“如果有人被斗死了，直接拖出去喂狗”等等，在反击期间饱受残酷的精神和肉体折磨。

匡的反击实际上产生了双重效果：一方面，通过高压威慑的方法，溧阳分校的秩序迅速得以恢复，建校工作得以继续进行；另一方面，高压威慑的方法同时



孕育着更多的潜在不满情绪。在那些被匡确定为重点打击对象的学生和老师中间，这样的情绪尤其强烈。很快地，后一个因素便引发了一波更为强劲的反弹。

### 中央干预，形势逆转

匡亚明对溧阳事件的武断处置在学校党委内部引发了争议，于是有人向江苏省委提交了一份报告（《南京大学揪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匡亚明》，《人民日报》1966年6月16日）。省委领导人又将这份报告转呈中央文革小组。鉴于几天前毛对北大事件的处理意见，康生（中央文革主要领导人之一）很快代表中央做出判决：南大学生贴大字报是“革命行动”，匡亚明的反击暴露了其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真面目，应该受到严厉惩罚（胡才基访谈。胡对中央的处理过程有所了解，是因为康生曾在事后和他说过这个事情。此外，1967年11月18日，康生在接见江苏省赴京代表团时说：“你们匡亚明一揪出来的时候，我就叫马上登报，……那个人是自首过的，我知道这个人，无论在思想上、组织上都是有油水的。文化大革命一起来，镇压你们，不是很偶然的……”详见《中央首长论匡亚明》，载于南京大学八二七革命串联会编《新南大》，第1页，1968年1月印发。另见《中央首长接见江苏驻京代表团的讲话》，载于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接到中央的明确指示后，江苏省委于6月6日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免去匡的党内外所有职务。6月8日，省委向溧阳分校派出联络组，支持学生们的革命行动（王德滋主编：《南京大学百年史》，第377页）。一位学生后来回忆：

6月8号晚上，学校广播站突然播放《东方红》歌曲，让全体学生到大操场集合。我们集合完以后，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戴××向全体学生宣布：明天你们就看不到匡校长和分校的其他干部了，因为他们犯了错误被调走了。他还说：同学们你们贴匡亚明的大字报是对的！你们的行动是革命行动！听到这个话以后，我们都激动得哭了。我们高呼口号，支持省委的决定。（经盛鸿访谈）

另一个学生回忆到，省委的干预很快便引发了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当省委派来的代表在大会上宣布：“省委支持你们的行动，你们不是匡亚明所说的反党先锋，而是革命先锋！”听众中立即爆发出一片掌声和欢呼声。随后，突然有人在人群中叫道：“既然我们是革命先锋，那么那些在匡亚明组织的反击中批判我们的人是什么？”显然，有些学生希望对批斗过他们的人进行报复。省委代表说：“大家应该把斗争矛头对准匡亚明。同学们之间就不要再相互纠缠了。”不过这样的忠告没有得到多少人的理睬。校园里很快出现了很多新的大字报。除了匡亚明以外，那些参与“反击”的党支部书记、政治辅导员和“左派”学生都成为批判对象。大家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分校陷入无政府状态。

这个学生接着回忆到：

6月9号，一位校领导从南京来到溧阳分校。小轿车一进分校的大门，大家就把他围起来了。他向我们传达了省委的指示：第一，匡亚明就是北大的陆平，他们两人都应该打倒。第二，南大党委不等于北大党委，南大党委还是好的，你们不要把南大党委和北大党委搞混了。第三，文科的老师 and 同学要坚守溧阳，一面搞文化大革命，一面继续劳动建校。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就有学生叫道：“我们要回南京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这个提议立即得到大家的热烈响应。学校领导说：“你们不能回南京去，你们必须留在溧阳。”大家七嘴八舌地说：为什么我们必须留在溧阳？匡亚明又不在这个地方，我们怎么同他斗争呢？还有人说：怕甚么，我们自己走回去。我们学习红军长征，两万五千里。校领导见控制不住局势了，想溜。同学们不让他走，叫他打电话给省委反映学生的要求。最后，江苏省委从南京军区借了几十辆军用卡车，把我们在溧阳的所有南大师生都接回南京。（崔之清访谈）

6月10日，溧阳分校的教师和学生们返回南京校本部。为了迎接这批“革命先锋”胜利凯旋，江苏省委和南大党委组织了一个盛大的仪式。不但留在校本部的理科教师 and 同学们都被动员起来在校园门口迎候，许多其他单位也派出代表加入到欢迎的行列，借以展示社会各界对溧阳分校师生“倒匡”斗争的支持。有关方面还在校园里树立起一个巨大的红色“光荣榜”，卷入溧阳大字报事件的270多名师生的名字，全都赫然其上。（虞友谦访谈，南京，2006年4月12日）

### 《人民日报》对“六二”事件的诠释

“六二”事件的性质和动力非常清楚。无论是卷入大字报事件的师生，还是发动反击的匡亚明，都无意颠覆现有政治秩序。恰恰相反，他们的举动均意在表明自己对现有政治秩序的支持和拥护。然而，基于不同的立场和观点，他们对所谓“正确立场”的理解却大相径庭。绝大多数学生的理解，源自当时的主流舆论宣传。而匡亚明的理解，则源自1957年的反右运动经验。即使在少数观点偏激的学生中间，不满和抱怨也仅是针对一些具体政策和做法的。他们并不想挑战学校党委的领导权威，更不用说反对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了。他们的愿望只是借“开展运动”之名，行“返回南京”之实。匡亚明和学生之间对抗的加剧，部分地源于学生们的激进话语策略，部分地源于匡的错误判断和武断处置。双方的修辞和行动都深深地植根于1949年以后建立起来的政治规范。这些政治规范分别涉及组织结构、行政原则和意见沟通方式。

然而，在6月16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的新华社长篇报道和《人民日报》社论，却对这个事件作出截然不同的诠释。6月12日下午，江苏省委在南京大学操场召开万人大会，揭发批判匡亚明。新华社记者对此事的报道，表明他们对溧阳事件的理解受到当时的激进意识形态和中央判决的误导。这篇报道提到，大

会开头宣布了省委关于免除匡亚明一切职务的决定。与会者对此报以热烈的掌声，并振臂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随后，溧阳分校学生代表胡才基、孙家正、王晓中和教师代表苏寿祁上台发言，以极其愤怒的心情揭发了匡亚明在溧阳分校的“三反”罪行。按照新华社报道的说法，这四位发言者都热烈支持省委的决定，并表明了如下决心：“我们有伟大的党的领导，有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作武器，有广大群众的支持，一定能够把匡亚明和其他一切牛鬼蛇神全部揭发出来。我们不斗倒他们，决不罢休。”随后校本部理科学生代表陈季平上台发言，对遭到匡亚明打击的溧阳分校师生表示慰问和支持。他还说：“毛泽东思想是我们的命根子，谁反对毛泽东思想，谁就是我们的死对头。不管他有多高的职位、多老的资格，我们一定要同他斗争到底。”（《南京大学揪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匡亚明》，《人民日报》1966年6月16日）显而易见，这里所采用的各种指控与革命修辞，与聂元梓的大字报和两周前《人民日报》关于北大事件的论述几乎如出一辙。

新华社的上述错误认知，在《人民日报》社论《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中得到进一步强化。该社论宣称：

匡亚明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的反革命事件，告诉我们什么？它告诉我们，匡亚明这些牛鬼蛇神，这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黑帮，是决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是决不会甘心自己的失败的。他们必然要负隅顽抗，必然要做垂死的挣扎，必然要采取种种阴险毒辣的手段，来镇压革命的群众运动，来维持他们摇摇欲坠的反革命统治。

这篇社论还强调指出：

这场文化大革命，对于那些被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篡夺了领导权的部门和单位来说，是一个夺权的斗争，是一个变资产阶级专政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这个斗争，决不能采取改良主义的办法，决不能搞“和平过渡”，决不能搞“合二为一”，而必须采取彻底革命的办法，必须把一切牛鬼蛇神统统揪出来，把他们斗臭、都垮、斗倒。（《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斗倒反革命黑帮》，《人民日报》，1966年6月16日）

上述文献关于“六二”事件的描述和诠释，严重扭曲了真实情况，甚至包含不少虚构成分。然而由于主流媒体的话语强势，这样的历史叙事不仅在当时占据着主导地位，而且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匡亚明与其反对派的冲突中所包含的多重复杂内涵，被简约为“革命”与“反革命”势力之间的殊死对决。匡亚明被判定为十恶不赦的坏蛋，胡才基和其他一些卷入冲突的师生则被标榜为“造反英雄”。按照《人民日报》社论定下的调子，原来由匡亚明兼任书记的溧阳分校党总支在7月4日发生改组。一位省委派来的干部成为一把手。胡才基被任命为

副书记。其他几个著名的反对派人物也被任命为新总支成员。（《工作队、党委关于改组溧阳分校党总支委员会的通知》，《南大百年实录——南京大学史料选》下卷，第237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 后续的发展

“六二”事件无疑标志着南京大学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起点。然而，卷入这个事件的人们——无论是匡亚明，还是反对匡亚明的学生们，还是后来介入的江苏省委领导人——并不知道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真实意图。他们只是根据自己的理解和推测，力图紧紧跟上运动发展的步伐。此后南大文革运动的发展，是日趋激进的舆论宣传和内部矛盾的纠缠延续共同推动的结果。

南大与北大的一个不同之处在于，北大的聂元梓等人在被戴上“造反派”的桂冠后，牢牢控制校内权力达两年多之久；而南大发生“六二”事件以后，学校的权力很快落入省委工作队之手。尽管工作队员们公开声称他们毫无保留地支持群众运动，但实际上，他们千方百计地试图将群众运动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任何自发倾向都会受到压制。溧阳分校事件发生后，留在校本部的外文系和理科院系中的少数激进学生于6月3日贴出大字报，也对学校党委的一些缺点和错误提出批评。这个行动同样招致学校当局的反击（《六三反革命事件前前后后》）。工作队进驻后，这些学生原以为他们会和溧阳分校的同学们一样获得平反，并进而成为“造反英雄”。但工作队遵循保守政策，坚称除了匡亚明之外，南大党委总体上还是好的，不应该被打倒。这种自相矛盾的态度无疑招致那些卷入“六三”事件的学生的怨恨。

一些性格偏激的学生自发地组织批斗会，并在批斗会上对匡亚明和其他“黑帮”分子拳脚相加。工作队员闻讯赶来制止，结果引发了一些人的不满。所以到7月底，当毛泽东对派工作队的做法提出批评并下令撤出工作队时，一些激进学生揭竿而起，对工作队展开批判。更多的人随后跟进。为了扼杀新一轮造反苗头，同时避免与反对派直接对抗，工作队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大批党员、团员、学生干部和其他政治积极分子被动员起来保卫工作队。胡才基、孙家正、朱英才和其他文科学生，一方面基于其党员身份，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报答省委对溧阳事件的处理，成为保工作队学生中的骨干。

学生之间的对抗与冲突，于8月底导致两大派红卫兵组织出现：即“保守派”和“造反派”。进入9、10月份，当群众运动向校外蔓延并将斗争矛头指向省市市委后，胡、孙、朱等人发起成立了一个全市范围的“保守派”群众组织，与“造反派”群众组织进行对抗，直到省委在1967年“一月风暴”中垮台。此后，南大校园内“保守派”与“造反派”之间的对抗，很快被“造反派”内部两大势力的对抗所取代（详见拙文《江苏‘一·二六夺权’前后的权力角逐》，《二十一世纪》2007年6月号，香港中文大学）。在蛰伏了一年多以后，胡、孙、朱等人于1968年夏秋被分配工作，离开南大。

由于来自中央的判决，匡亚明无疑成为文革运动中最大的输家。在1966和

1967年群众运动高潮期间，相互敌对的群众组织——无论是“保守派”和“造反派”，还是后来由造反派分裂而来的“好派”和“屁派”——都把批斗匡亚明作为彰显自己“革命立场”的一种方式。1968年春实现的“大联合”也没有改变匡的命运。此后，每当新一轮运动来临时——无论领导这些运动的是军训团，工宣队，还是文革中后期复出的老干部——匡总是被列为主要斗争对象之一。他的噩梦一直持续到1976年毛泽东逝世之后。

1978年5月，匡亚明被江苏省委重新任命为南大党委书记兼校长（《关于匡亚明等同志任职的通知》，《南大百年实录——南京大学史料选》下卷，第287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此时，几乎所有“造反派”头头都遭到清洗，有些还被关进监狱。然而，那些新近复职的省委领导人从原来的“保守派”学生领袖中提拔了一批人担任高级领导职务，以表彰他们在文革初期对省委工作队和江苏省委的效忠。其中包括胡才基和孙家正。在1980年代初清理“三种人”的运动中，匡亚明极力主张对这些人进行查处。但是他的主张并未得到省委主要领导人的理睬（胡才基访谈。蒋广学访谈）。

## 结论

尽管南京大学“六二”事件最初主要是单位内部矛盾冲突的产物，但外在的宏观政治环境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主流媒体对这个事件作出“革命化”的诠释，主要是因为党内高层中的激进集团试图借此指明运动的走向，解释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推动全国范围运动的开展。

溧阳事件中的所谓“造反英雄”——如胡才基——大多是党员和学生干部。他们与匡亚明在反击行动中所依靠的那些“左派”几乎没有什么差别。他们先是被匡亚明确定为“重点打击目标”，后来又被江苏省委封为“造反英雄”，均不是基于他们的个人意愿和实际行动，而是源自当权者的实用主义的政治策略。因而，这个事件不是具有不同政治诉求的利益团体之间相互斗争的产物，而是特定历史语境下一系列不期而至的相互碰撞与相互误解的结果。

溧阳分校的学生和教师会产生不满情绪，表明长期的意识形态灌输并未消除人们的自我意识和利己主义的考量。这无疑是对毛泽东倡导的“思想改造”方法的一个辛辣嘲讽。然而由于革命的意识形态在当时社会生活中的巨大影响，人们不得不采用激进的话语策略去表达他们的真实愿望。由此可见，毛时代的政治实践所改变的只是人们的外在行为，而非他们的内在本性。

## 鸣谢

这篇文章是本人的研究课题“社会史视野下的南京大学‘文革’运动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非常感谢斯坦福大学人文研究中心为此项研究提供的财政资助。同时感谢斯坦福大学 Andrew G. Walder 教授和其他三位匿名评阅人对此前两稿的批评意见。

---

## 南京文化大革命冲突的起源

董国强、Andrew G. Walder

按：本文译自英文，原标题为 *Factions In A Bureaucratic Setting: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Revolution Conflict In Nanjing*，刊载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主办之 *The China Journal*, No. 65, January 2001, pp. 1-26。

长期以来，人们对 1966 至 1968 年间中国群众派性冲突的理解被禁锢在一个“群体团结”的框架中。按照这种解释，群众派性冲突是那些具有共同利益诉求的人们，基于其在现行政治和社会秩序中的不同地位，分别实施政治动员的例证——换言之，这是一种典型的“利益集团政治”方式。派性冲突——表现为“保守”和“激进”势力之间的斗争——被看作是“后革命”秩序中有着利害冲突的团体之间的斗争。这种解释乍看起来条理清晰，很是合理，而且与社会科学关于政治争端的一些流行观点非常吻合，因而在 1970 年代后期一经提出便倍受推崇，主导关于文化大革命历史的研究和教学长达数十年之久。

这种解释的论据主要来自若干具有较大影响的早期研究论著。北京和其他地方的中学红卫兵曾就家庭出身问题进行过激烈的辩论——争论的焦点是，“红五类”和各级党政领导干部的子女们是否天生地具有更多的政治忠诚，因而比其他人更有资格领导学生运动。这种观点是由许多出身于“红五类”家庭的人首先提出来的，后来遭到其他学生和中央文革领导人的尖锐批评。这场辩论将人们在现行体制中的利害关系与其政治立场抉择联系起来，从而构建出一种可以用“利益集团”理论加以解释的人际分野。另一个重要的论据是，临时工、国营农场退伍转业军人和下放农村的城市知青群体为了改善其现实处境，都在文革运动中提出了各自的群体要求，并普遍地加入到那些试图推翻地方政权的群众组织中。此外，几乎在所有地方都出现了一个试图打倒当地官员的造反派联盟和一个试图保护这些官员的反对派组织——许多学者将这种冲突定性为“激进派”与“保守派”的冲突。

Keith Forster 早年关于浙江地区派性联盟的研究，是较早对上述解释体系提出质疑的论著之一。尽管他沿用了“激进派”和“保守派”的概念，但他认为这些概念本身过于武断。浙江两大主要派别的头头们在运动初期都有向其所在单位当权派造反的经历。导致他们分裂的唯一显而易见的因素，是在省委领导人中支持谁、反对谁。尽管 Forster 所掌握的有限资料使他无法全面考察群众派性组织成员的社会背景，但他对省委领导班子主要成员的背景情况和两派政治立场的论述，从根本上动摇了“利益集团”解释体系。Richard Baum 批评 Forster 无视学界关于群众派性组织的“社会—经济基础”的理论预设。他认为“如果忽略了社会—经济基础，就无法对政治行为作出合乎逻辑的系统分析”。Forster 随即写了一篇文章捍卫自己的观点，指出与现有社会群体类别划分不相匹配的派性分野，



可能源于政治冲突。然而由于缺乏这方面的直接论据，Forster 不得不作出妥协，承认社会—经济利益冲突也可能存在一定影响。

由于前所未有地接触到大量档案资料，Elizabeth Perry 和李逊对文革期间上海工人运动中派性问题的透彻论述，揭示了区分不同派别成员的群体特征和个体特征之间值得关注的微妙差异。她们指出造反派组织中的党团员数量和比重，与敌对派别乃至整个工人阶级队伍中的情况并无明显差别。事实上，造反派身上所具有的显著特征是，此前与当权派冲突的经历、上海以外的籍贯或政治歧视所导致的个人政治发展挫折。Perry 和李逊肯定了党组织在动员保守势力反对造反派力中的作用，但她们强调，一些更为细腻的差别会诱使企业员工们以不同方式介入政治活动。按照她们的叙述，尽管先验的群体特征依然是冲突模式解释体系中的主导因素，然而个体层面上的差异——如一些详细的个人传记资料所示——却使得许多早期论著中提出的群体类别的分野显得日益模糊。

徐友渔在写作《形形色色的造反：红卫兵精神素质的形成及演变》一书时还没有接触到 Perry 等人的细致分析。他是“西方的”利益集团解释模式的尖锐批评者。他指责这种解释模式通过中学生中的“血统论”争论和临时工们的群体反抗推导出派性冲突的普遍成因，未免过于简单轻率（徐友渔《形形色色的造反：红卫兵精神素质的形成及演变》，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9）。徐的最具说服力的观点之一，是“利益集团”解释模式混淆了 1966 年支持和反对地方当局的派性冲突与 1967 和 1968 年间重建地方权力过程中的派性冲突。他指出，在绝大多数省份，在权力重建过程中殊死搏斗的两大派别其实都是造反派——他们在早先推翻地方当局的斗争中曾经是盟友。他还指出，即使承认 1966 年下半年派性斗争的基础是群体共同利益，并不必然地意味着 1967 年及以后的情况也是如此。徐的论据主要来自省级层面的派性冲突。他并未就地区层面做过深入分析，也没有就学校和其他基层工作单位层面的冲突做出有力论证。（不过，一项新的研究成果支持徐友渔对省级层面派性问题的看法。参见 Dong Guoqiang and Andrew G. Walder 的论文“Nanjing’s Failed ‘January Revolution’ of 1967: The Inner Politics of a Provincial Power Seizure”，载于 *The China Quarterly*, No. 203, September 2010, pp. 675–92）

Walder 新近关于北京高校红卫兵的研究支持徐友渔的批评意见，并对派性分裂的原因做出了新的解释。按照他的论述，1966 年秋发生在首都那些具有相同背景的大学生群体中的派性分裂，并非基于对此前中国政治秩序的不同态度，而是由运动初期一些校内争端引发的。而且，1966 年以后全市范围两大派性组织的对抗显然存在于造反派阵营的两翼之间——尽管双方的争斗显得不可调和，却没有人能够说清楚两派的政治观点究竟有何差异。Walder 的解释与此前所有解释的显著差异在于，这种解释将人们如何在瞬息万变的历史语境中做出政治抉择置于分析的中心。

由此引发的问题是：个人家庭背景和政治隶属关系与人们实际所面临的抉择之间，是否存在着高度的内在关联？



不过 Walder 也意识到，支撑其解释体系的论据主要来自首都，而首都的情况在以下三个方面显得较为特殊：

第一，北京市委领导层在 1966 年 5 月即遭到彻底清洗批判，而其他地区的地方党委在此后的几个月里依然掌握着权力并千方百计地保护自己。

第二，中央文革小组与北京的学生领袖之间有着十分亲密的关系，并对他们的活动实施广泛的干预和操纵。这导致并加剧了造反运动的分裂。

第三，北京从未发生过群众夺权，也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对市级领导权的争夺。这和中国其他绝大多数地方的情况形成鲜明对照。

简而言之，与首都北京不同，地方上的原有政治建构在 1966 年下半年依然掌握权力、发挥作用，因而保留还是推翻原有政治建构便成为当地政治冲突的核心内容。由于 Walder 的研究重点在于揭示同一语境下派性政治冲突的多元性和多样性——如他对北京的大学、中学和相关官僚机构的分析论述——他无意断言其他地方的派性政治冲突也会以类似的方式展开。

新的个案研究的简单堆砌无助于解决这个问题。在不断收集新的论据的同时，我们还必须反思现有解释的逻辑框架，重新思考那个时期的政治——尤其是当时的社会和组织语境。利益集团解释体系的核心观点是群体团结。然而这样的观点通常缺乏清晰有力的论证。它们主观地认定，在学校和其他单位中，那些家庭背景和政治诉求相似的人们在文革政治语境中具有共同利益，并团结起来捍卫这些共同利益。它们还断言以这种方式形成的团体能够在其他学校和单位中找到具有相同看法的团体，并与之结成联盟。而与之敌对的个人和团体也会以类似的方式形成联盟。两大联盟不同的成员构成和不同的政治倾向至少间接地反映出其团体成员的与生俱来的共同利益。

我们提出一个截然不同的思路。这种思路强调的不是“团结”而是“分裂”。

在我们看来，尽管文化大革命的内在诉求是促成具有类似背景的人们的团结，然而其实际的后果却是导致他们的分裂。来自北京的政治号召往往含义模糊，并不断地发生着无法预测的变化。利益集团解释体系认定这种模糊性为那些具有共同利益的团体利用激进的政治修辞谋求其各自的利益提供了机会。我们则强调，这种模糊性事实上使得那些在现有政治体制下具有共同立场的人们难以在瞬息万变、无法预知后果的情形下做出相似的政治抉择。

### 南京语境：两个学校和一个工厂

为了进一步阐释上述分析思路，我们需要考察不同学校和工厂中派性组织的起源，以及它们如何结成联盟去捍卫或推翻地方上的党政领导机构。我们将系统再现 1966 年下半年南京三个重要单位内部派性冲突的发展。这些单位产生了一批著名的学生和工人派别头头——他们在 1966 至 1967 年全市范围的政治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样的历史叙事不但可以使我们意识到不同类型的单位中派性问题起因的多样性，而且可以很好地说明跨单位的联盟是如何形成的。

第一个单位是南京师范学院附中。这是南京最重要的重点中学。与其他那些

在既往红卫兵运动研究论著中受到高度关注的学校大体类似，党政干部和知识精英子女在该校学生中占据着主导地位。该校诞生了两个红卫兵组织，主要来自党政干部和军队干部家庭的学生构成。这两个组织主导着早期校内红卫兵运动，并且都公开宣称其成员最有资格领导中国的“反修”斗争。像中国其他地方一样，这两个“精英”红卫兵组织都必须面对一个新的持反对“血统论”观点的造反派组织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上述两个“精英”红卫兵组织采取了不同的政治立场：一个从一开始就捍卫学校当局，并始终捍卫省市党委；另一个则攻击学校当局，并在后来加入旨在推翻地方党委的造反派联盟。

第二个单位是南京大学。该校是南京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源地，在当地的地位和影响与北京大学在全国的地位和影响十分相似。在1966年6月1日北大领导人遭到公开清洗后不久，南大党委书记兼校长匡亚明也被剥夺一切职务，并受到《人民日报》的点名批判。这个事件激发了南京的群众运动。南大的三个学生组织在1966年下半年全市性的群众组织联盟中发挥着突出的作用，并持续卷入1967年以后的派性冲突。其中两个组织的头头们发起并领导了两个主要的造反派联盟，其斗争矛头指向省市党委。第三个组织则由另外一批学生领导——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人先是在反对匡亚明的斗争中被标榜为“造反英雄”，而后却死保工作队，并加入捍卫省市党委的群众组织联盟。

第三个单位是南京长江机器制造厂。长江厂是当地一家国有重点企业，也是第一个工人造反组织的诞生地。这个工人组织的头头们在全市性的派性联盟和1967年以后的南京派性政治中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该组织的发展史，为我们考察文革前期南京政治冲突中几大势力的形成提供了一个绝无仅有的窗口。它是由长江厂党委支持发起的，却在攻击省市党委的运动中发挥领导作用。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长江厂内的反对派们积极致力于推翻厂党委，同时却支持南京地方党政领导。这种复杂的场景，源自工厂领导层与省市委之间的体制内博弈。

上述单位的运动发展情况，在当地主要报刊《新华日报》和造反派的小报与传单中有着大量记载。南师附中几个校友创办了一个网站，发布了不少与该校文革运动有关的照片和回忆文字。本文第一作者董国强近年来对许多卷入运动的关键人物进行了一系列深度访谈。我们还获得一本1980年代中期由南京市档案馆编撰的南京文化大革命大事记初稿。这些资料使得本文对派性政治的起源与发展的再现，在详实程度上大大超过已经发表的相关论著。

本文关于上述三个单位在文革运动头几个月情况的叙述主要聚焦于以下几个问题：

造反运动的初始动因是什么，哪些因素导致运动参与者的分化？

我们对不同派别头头们的社会和政治背景有何了解，他们为什么会采取截然相反的立场？

学校内部的各个派别如何与工厂内部的各个派别建立全市性的联盟，这些派别的诉求是什么？

这些问题的答案，将有助于我们评估派别的形成在多大程度上源自具有相似

背景和利益诉求的人们的群体团结。或者，具有相似背景的人们是否会因一些与他们在现有政治秩序中的地位无关的问题，分裂为相互敌对的力量。

### 南师附中

这所学校始建于 1920 年代，曾附属于国民党中央大学，1952 年成为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这是一所得到社会公认的南京最好的中学，来自教育精英、高级党政干部和军队干部家庭的学生在学生中占有很高比例。学校党支部书记兼校长是沙尧。他 1944 年在家乡——苏北如皋——参加共产党，并在当地担任过不同领导职务，1954 年调任现职（熊益军《访江苏省教育厅原副厅长沙尧》，《通州日报》，C1 版，2003 年 10 月 27 日）。副校长李夜光解放前是南京地下党组织成员，1949 年帮助该校建立第一个党支部，后来便留在该校工作（王虹访谈，南京，2009 年 12 月 4 日。如后文所述，王虹是该校造反派组织联盟发起人之一，该联盟与该校两个早期红卫兵组织相互敌对）。

北大聂元梓大字报于 6 月 2 日公布后，南师附中校园里也涌现了一波大字报浪潮。6 月 9 日，沙尧召集全校大会，号召师生积极投入文化大革命运动。很快地，一张新的大字报出现了，指称副校长李夜光是国民党特务（李夜光立即贴出大字报否认这个指控。王虹访谈。王虹《南师附中文革大事记》手稿）。一些老教师则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受到批判。沙尧对这些行动表示支持，同时严厉镇压关于“学校领导班子反对毛泽东思想”的言论（王虹《南师附中文革大事记》手稿）。

6 月中旬，市委向该校派出一个工作组。然而这个工作组宣称其任务是“协助”学校党支部开展文化大革命，并未发挥独立的领导作用（王虹访谈）。8 月 12 日，该校第一个红卫兵组织“红色造反军”成立。其成员主要是一批军队干部子弟，其头头们也都来自精英家庭——李天燕曾就读于北京 101 中学，其父亲是一位解放军少将，不久前调南京军区工作。王史维是一个省委干部的儿子。曾小渤是一位军队干部的儿子。这三个人同其他较早卷入运动的学生一样，把校内的“反动学术权威”和那些个人历史上有政治嫌疑的人作为目标，不过他们也与学校当局发生冲突。在建立红卫兵组织的前一天，他们曾责令学校当局不得干预学生们贴大字报的行动。这个举动使他们成为全国红卫兵运动的先驱之一。8 月 18 日，李天燕等人在北京参加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的盛大集会，并应邀登上天安门城楼（王虹访谈。李天燕等人能够登上天安门接受毛泽东接见，乃是因为他以前的那些中学同学们在首都红卫兵运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不久，该校出现了第二个红卫兵组织——“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该组织由一批地方干部子弟领导，同时包括大批学生干部和政治积极分子。主要头头陈光华的父亲是烈士，朱汇民的父亲是军队干部，周晓阳出身于工人阶级家庭，是沙尧培养的先进典型和学生党员（王虹访谈）。与前面提到的“红色造反军”不同，“毛泽东思想兵”对学校当局持坚定的“保”的立场。不过两派都认为出身革命家庭的学生应该领导红卫兵。至此，校内出现了两个由特权家庭子弟组成的红卫兵组织：一个是反对学校当局的“激进派”，一个是捍卫学校当局的“保守派”。

8月20日，“造反军”召集批斗沙尧和工作组负责人的群众大会。会后，两人被迫叼着自己的鞋子在校园内游街示众。“思想兵”拒绝参加这次批斗大会，另行组织大会批斗那些有历史问题的教师和那些反对“血统论”的学生。几周后，“造反军”停止对沙尧的批斗，加入“思想兵”发起的批判、抄家和打人行动。他们宣布一些教师和职工为“反革命分子”，把他们关进牛棚，施以暴打。这批牺牲者中包括副校长李夜光（王虹访谈。王虹《南师附中文革迫害调查》手稿）。红卫兵们还召集批斗会，批斗学生中的敌对分子和批评者——他们当中有党员干部子弟、大学教授子弟和若干军队干部子弟。他们的罪名是反对“血统论”，并试图组建他们自己的红卫兵组织（王虹《南师附中文革迫害调查》手稿中有关于这些人的较为详细的情况介绍）。

作为竞争对手的学生头头们于9月初浮出水面。他们与精英主义红卫兵具有相同的家庭背景。他们先是挑起反对“血统论”的辩论，而后试图建立自己的独立组织（最初的挑战来自于早期的几张大字报：何纪宁、杜红月、吴慧蓉、李修竹、郭有莘、秦志宁《我们对红卫兵创立宣言的看法》，1966年8月12日，刊载于《附中八二七》编辑部编印《纪念毛主席接见红卫兵两周年——献南师附中红联》，1968年8月18日印发；高慧敏《出身不好，也可以去北京串联》，1966年10月。王虹《南师附中文革大事记》手稿对此有详细记载）。最重要的挑战者是沈立志、王虹等人领导的“红色野战军”。沈立志出身于革命军人家庭。王虹的父亲早年是中共地下党，文革时是南京一个单位的中层干部（早在7月8日，沈立志和王虹等人就贴出题为《南师附中的教改方向真的对头吗？》的大字报，批评学校当局的“错误路线”。仔细审视当时的特权政治标签的背后，不难发现这些政治标签涵盖下的群体团结中的细小裂痕。沈立志的生父是一名国民党军官，后来逃到台湾。他的母亲与之离婚后，嫁给一位解放军军官。沈从其继父那里继承了红色的政治标签，但因其生父的身份而受到歧视。王虹的父亲由于其地下党员的身份，在1949年以后遭到政治歧视，未能得到提拔重用。换言之，当时的所谓“特权阶层”内部，也存在着许多矛盾冲突。王虹访谈。沈立志访谈，南京，2008年2月24日）。然而他们当时无法撼动“造反军”和“思想兵”在校内的权威。从北京南下串联的首都红卫兵们驻扎在南师附中，公开支持上述两大组织。省市市委也持相同立场——他们还模仿北京等地的做法，组织了“南京红卫兵总部”和“南京市红卫兵直属纠察队”。意识到自己面临的风险，反对派学生们纷纷于9月份离开南京到外地串联，直到11月后才陆续返回（王虹访谈）。

在他们返回前，政治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10月份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陈伯达等人对老红卫兵的“血统论”观点提出严厉批评。一场全国范围的批判谭立夫——北京老红卫兵头头，据称是“血统论”的始作俑者——的运动迅速兴起。特权家庭出身的红卫兵们不再受到宠信。南师附中的反对派学生乘机发起反击，指责“造反军”和“思想兵”是错误政治路线的支持者（这轮反击中最重要的大字报包括：《我校“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究竟要沉默到哪一天？》，《野战军报》1966年12月8日；《我校运动冷冷清清的根子在哪里？》，《野战军报》

1966年12月8日；《“谭氏路线”阴魂不散——驳谬论种种》，《野战军报》1966年12月16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斗争大方向就是错了！》，《野战军报》1966年12月18日；《造反军中的一些同志不是真正的造反者！》，刊载于红色造反联合会井冈山革命造反队编印《大字报选编》，第3页，1966年12月印发）。由于其主张顺应了当时的主流舆论导向，“南师附中红卫兵造反联合会”（简称“红联”）迅速成为校内最大的学生组织（王虹《南师附中文革大事记》手稿。《南师附中红卫兵造反联合会创立宣言》，1966年12月16日）。

“思想兵”对“红联”的指责保持沉默。“造反军”则奋起反驳其批评者，并进而提出更为激进的“炮轰省委”的口号（《我校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事记》，《大字报选编》，第1页）。“红联”宣称“造反军”的行动不过是一个政治伎俩，拒绝承认他们是真正的造反派。他们强调指出，推翻省委的斗争必须遵循“群众路线”，而不是由“造反军”等组织包办代替（《红色造反联合会声明（第一号）》，《大字报选编》，第2页）。“造反军”则辩称，当前运动的大方向是揭发批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红联”在运动中始终揪住“血统论”问题不放，唯一目的在于分裂群众运动，从而保护那些走资派（《我校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事记》，《大字报选编》）。这种交锋形成了一种奇怪的政治立场悖论：老的“保守派”红卫兵大力推动对省委的激进批判，而新的“激进派”红卫兵则更加关注校园内的派性对抗。

另一方面，两个较早成立的老红卫兵组织也分道扬镳。“思想兵”于9月初加入了由省市扶植的“南京红卫兵总部”和“南京市红卫兵直属纠察队”。这两个组织均属于“保守派”阵营。“造反军”曾经参与过它们发起的一些行动，但没有加入这些组织。“思想兵”始终公开坚持捍卫省市的立场，直到1967年初省市垮台。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造反军”在12月初与其旧盟友决裂，转而投身于造反派“炮轰省市”的运动。

新的“红联”从未放弃反对两个老红卫兵派别——“造反军”和“思想兵”——的立场。到12月份，当全市性的造反派联盟“南京八二七革命串联会”成立时，“红联”顺理成章地加入其中。沈立志还成为“南京八二七中学分会”的首脑。

## 南京大学

南京大学是中国最著名的高等教育机构之一。它由国民党中央大学和美国教会创办的金陵大学合并而来，因而许多教职员工的政治历史背景较为“复杂”。

南大党委书记兼校长匡亚明因而决心加强学校的政治工作，积极响应毛泽东关于高等教育改革的激进号召。早在1964和1965年，毛泽东在与王海蓉和毛远新谈话时，对大学教育提出严厉批评。这些谈话内容后来在社会上广泛流传。为了贯彻毛泽东的主张，匡亚明在1966年2月提出建立南京大学溧阳分校的动议，组织文科师生到农村进行“半农半读”的教学改革实践。农村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很快导致文、史、哲三系500多名学生和教师的不满。

就在师生们的怨恨情绪日益增长的情况下，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北大聂元梓

造反事件一经主流媒体披露，溧阳分校立即出现了大批大字报，指责溧阳分校是修正主义的产物。匡亚明认为这些批评是对毛泽东教育革命主张的恶毒攻击，组织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击，给那些卷入大字报事件的师生贴上“右派”和“反革命”分子的标签。他还认定十几位学生干部是大字报事件的幕后主谋，对他们实施重点打击。其中包括胡才基、孙家正和朱英才。胡才基当年32岁，是中文系学生，中共党员，南大学生会主席。他1949年之前参加革命，后来以“调干生”身份进入南大学习。孙家正是烈士子女，学生党员，中文系团支部书记。朱英才才是政治系学生，中共党员，学生干部（蒋广学访谈，南京，2006年3月9日。蒋1965年毕业于南京大学政治系，当时在溧阳分校政治部任干事。经盛鸿访谈，2006年3月10日。经当时是政治系三年级学生。董健访谈，南京，2006年5月8日。董1965年从南大中文系毕业，研究生学历，当时是中文系助教和胡才基所在班级的政治辅导员）。换言之，他们都是现存政治体制的受益者和拥护者。

匡亚明的严厉反击引起北京高层的关注。康生决定利用这个事件向社会各界传达“不准镇压学生造反”的信息。他随即判决溧阳大字报事件是“革命行动”，匡亚明的反击违背毛泽东思想。江苏省委立即向溧阳派出联络组，宣布撤销匡亚明一切职务。主流媒体《人民日报》还对此事大肆宣扬。匡亚明积极贯彻和捍卫毛泽东的主张，反对那些自私自利的批评者，结果却不幸地沦为运动的牺牲品。

那些遭到镇压的持不同意见者现在被标榜为“造反英雄”。受到局势逆转的鼓舞，他们贴出更多的大字报揭发批判匡亚明的“罪行”。6月8日，省委向南大派出一个小组，为省委工作队进驻南大铺路搭桥。6月15日，省委工作队正式抵达该校。首任队长是省计委主任汪冰石。副队长是梁辑卿、杜方平和吴大胜——他们三位都是南京军区派来的部队干部（梁辑卿是江苏省军区副政委，少将。杜方平是南京军区国防工业部部长，大校。吴大胜是南京军区后勤部副部长，大校）。7月4日，省委改派省委书记处成员彭冲担任南大工作队队长，同时兼任南大党委书记。130多位工作队员中，绝大部分是来自南京军区的中下级军官们（王德滋主编《南京大学百年史》，第377-78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江渭清《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忆录》，第517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

省委工作队赞颂溧阳分校的造反者，鼓励师生们对匡亚明展开批判，但他们试图阻止针对整个学校党委的攻击。因为南大党委一直处于江苏省委领导之下，所以对学校党委的广泛谴责有可能危及到省委自身。随之而来的，是试图将揭批运动局限于匡亚明和溧阳事件的省委工作队与试图将揭批范围扩大到学校党委其他成员的师生们之间的摩擦与冲突。

工作队的两难处境首先表现为他们对校本部“六三”事件的处理。溧阳事件爆发后，校本部的一些学生也贴出大字报批评学校党委。因匡亚明亲赴溧阳镇压那里的造反，留校主持工作的两名校党委副书记组织了针对这些学生的反击。匡亚明倒台后，溧阳分校的造反师生受到追捧，校本部的这些学生也希望获得同样的礼遇——由“迫害对象”一跃而为“造反英雄”。但工作队对他们不予理睬，拒绝将“六三”事件与溧阳事件相提并论。为此，卷入“六三”事件的外文系法

文专业四年级 22 名学生于 6 月 18 日贴出大字报谴责工作队，并呼吁将其赶出校园（南京市档案局编印《南京文化大革命大事记（初稿）》，第 5 页，油印本，1985）。

其次，如何应对造反学生的暴力行为也使工作队左右为难。6 月 20 日，一些学生自发组织群众集会批斗匡亚明和他的几个手下，其间对他们肆意羞辱、殴打，还给他们戴上高帽子在校园里游街示众。工作队闻讯赶来加以制止，随后还组织了一场关于自发暴力行为的大辩论（6 月 18 日发生在北大校园的一个类似事件引起中央领导层的关注，促使中央于 6 月 20 日发出文件谴责暴力行为）。

工作队按照自己的既定方针领导运动，斗争矛头指向教师和基层干部群体中的所谓“修正主义分子”。绝大多数校党委成员和各院系党总支书记都得到庇护，免受群众运动冲击（《“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何其毒也！》，《农奴戟》，1967 年 4 月 21 日，第 1-2 页。）。许多教师和学生反对将那些无权无势的小人物作为主要斗争对象。文凤来是最早起来批评工作队的师生中的一员。他是转业军人，中共党员，马列主义教研室青年教师。“法四 22 人大字报”的作者们是他的学生。他于 7 月间贴出大字报批评工作队整肃普通教师和学生的做法，引起各方的广泛关注（王继志访谈，南京，2007 年 2 月 27 日。王 1965 年从南大中文系毕业，留校担任越南留学生班的汉语教师。他曾发起成立一个造反派的小组织，后来加入“南京大学八二七革命串联会”）。

工作队动员党团员们与卷入造反运动的师生对抗。胡才基、孙家正、朱英才和其他在漂阳事件中获得拯救的学生成为工作队的依靠对象，积极投身工作队策动的反击行动。他们张贴大字报，组织群众集会，批判声讨文凤来和其他批评工作队的师生，结果在教师和学生中造成分裂（崔之清访谈，南京，2006 年 3 月 1 日。崔当时是历史系学生）。

8 月初，文凤来带领几个支持者前往北京告状。康生接见了他们，觉得可以利用南大的事件来推动全国范围的运动。因而在 8 月 18 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的大会上，文凤来作为全国“革命教师”代表登上天安门城楼。次日，《人民日报》上的一篇新闻报道还特别提到文凤来的名字（《毛主席和我们心连心》，《人民日报》，1966 年 8 月 19 日，第七版。耿昌贤访谈，扬州，2007 年 2 月 1 日。耿是文凤来的忠实部下，南大外文系法语专科班学生，曾在“法四 22 人大字报”上签名，是“红色造反派”的早期成员。另见《中央首长接见江苏省赴京代表团讲话的纪要》，1967 年 3 月 5 日，载于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康生在那次谈话中，提到他对文凤来的早期造反活动的支持）。从北京回来后，文凤来和他的支持者于 8 月 23 日组建了南大第一个红卫兵组织——“南大红色造反派”。与南师附中老红卫兵一样，文凤来十分强调其组织成员的政治纯洁性，只接受那些政治表现和家庭背景均无可挑剔的人。这种排他主义的立场严重阻碍了“红色造反派”组织规模的扩大，尽管该组织在当地的地位和影响始终举足轻重（王德滋主编《南京大学百年史》，第 378 页。耿昌贤访谈）。

张建山认为文凤来对政治纯洁性的过分强调，会导致“红色造反派”的自我消亡。张是数学系五年级学生，系学生会主席，团总支副书记，“红色造反派”



最早成员之一。8月27日，他发起成立了另一个红卫兵组织——“南大八二七革命串联会”，并说服其所在班级的政治辅导员、年轻的党员教师曾邦元出任该组织一把手。曾邦元1964年从南大数学系毕业后，留系担任政治辅导员，同时担任系团总支书记。“南大八二七”的政治立场与“红色造反派”相同，不过其吸收成员的标准较为宽泛，因而其组织规模很快便超过后者（王德滋主编《南京大学百年史》，第378页。《南大红旗战斗队的大后台是什么人？》，《八二七战报》，1967年1月11日，第三版。葛忠龙访谈，阜宁，2007年4月14日。葛是数学系五年级学生，张建山的同班同学，“南大红色造反派”和“南大八二七”早期成员）。

工作队即将撤离的消息引发了派性冲突。两个造反派组织将工作队员们围困在校园里，要求他们承认错误，交代罪行，并为受到他们打击迫害的学生和老师平反。为了摆脱困境，工作队与支持拥护他们的学生暗中接触，鼓励他们建立自己的红卫兵组织。8月29日，“南大红旗战斗队”宣告成立。在溧阳事件中涌现出来的“造反英雄”胡才基、朱英才和孙家正等人成为该组织头头。他们宣称工作队的政治方向是基本正确的，造反派的围困行动违背了中央关于撤工作队的指示（王德滋主编《南京大学百年史》，第378页。胡才基访谈）。然而造反派们不为所动。僵局直到9月17日才被打破。当天，“红色造反派”和“南大八二七”成员全部前往五台山体育场参加一个全市性的揭批工作队的大会。“南大红旗战斗队”抓住时机在南大操场举行了一个热烈欢送工作队离校的仪式，使工作队得以体面地撤出南大（南京市档案馆编《南京文化大革命大事记》，第17页）。

为抗议工作队不辞而别，“红色造反派”和“南大八二七”组织了一个1300多人的代表团前往北京告状（南京市档案馆编《南京文化大革命大事记》，第17页）。他们参加了10月6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的声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盛大集会。这次大会标志着首都的新造反派组织的地位飙升。南大师生在工作队问题上的立场还得到周恩来的支持，周在大会讲话中说：“我们早就宣布过，任何学校的工作组，本身犯的错误，在学校犯的错误，应该随叫随到。如果他们的上级应该负的责任，那么上级就应该到学校检讨。”（《中央首长在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上的讲话》，1966年10月6日，载于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在中央高层的支持下，南大师生们返回南京，把工作队员们揪回南大校园批斗。梁辑卿、杜方平和吴大胜——三位来自南京军区的工作队副队长——很快承认了工作队挑动群众斗群众和指使公安机关整那些反工作队师生的“黑材料”等活动。他们还指称江苏省委是这些活动的幕后主使（陈其玠《乌云遮不住太阳，真理永远放光》，《红卫兵报》，1966年11月30日，第二至第三版。《从南大的动向看省委的新阴谋》，《红卫兵报》，1966年12月18日，第二版）。反工作队的斗争因而迅速升格为针对省委的攻击。

“南大红旗战斗队”竭力阻止针对工作队和省市委的攻击。他们发起成立了一个全市性的“南京大专院校赤卫队”。他们还贴出大字报，指责文凤来和其他

造反派头头反对党的领导——因为工作队队长“彭冲同志”是省委书记处书记。当中央政策发生变化后，尤其是在周恩来就工作队问题公开表态后，“红旗战斗队”改变了自己的策略。10月6日，他们也发起组织了一个严厉批判工作队的大会，然而他们的主要目标不是彭冲等人，而是交代揭发工作队内幕的梁辑卿、杜方平和吴大胜（《形左实右的集中大暴露——评11月28日红旗战斗队等组织的大会》，《八二七战报》，1966年11月29日，第三版。《红旗战斗队的矛头又指错了》，《八二七战报》，1966年12月3日，第二版。《从南大的动向看省委的新阴谋》，《红卫兵报》，1966年12月18日，第二版）。到11月下旬，当省委领导人公开承认其错误后，“南大红旗”召开大会批判声讨“江苏省委的资反路线”，但他们的要求仅限于希望省委“改正错误”，“早日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揭开“南京红卫兵直属纠察司令部”的黑幕》，《革命造反报》1967年1月17日，第二版。孙晓萍《彻底揭发江苏省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革命造反报》1967年1月17日，第三版。孙晓萍是南大“红旗”副队长，其父孙海云曾任江苏省委组织部长。另见南京市档案馆编《南京文化大革命大事记》，第27页）。

为了打破僵局，南大造反派们挟持省委书记处成员许家屯前往北京请愿。陶铸于12月5日接见了他们，并促成双方达成一个“八项协议”，其中包括省委承认在文化大革命中犯有严重错误（《江苏省革命造反派与省委达成的八项协议》，《红卫兵报》1966年12月27日第二版。《八项协议》的主要内容是：省市委立即停止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做法；省市委立即清查、销毁所收集的全部“黑材料”；省市委领导人公开做出检查，接受群众批判；省市委公开办公，有事与革命造反派协商；等等）。听到这个消息后，“南大红旗”和“南京工人赤卫队”动员数千群众前往省委抗议示威，要求撤销上述协议（南京市档案馆编《南京文化大革命大事记》，第33页）。当这个要求遭到拒绝后，“南大红旗”也派人挟持许家屯前往北京，希望在中央干预下达成一个新的协议。造反派们在北京街头实施拦截，用武力将许家屯从他们手里夺过来（葛忠龙访谈）。“南大红旗”与造反派组织的对抗一直持续到1967年1月——此时南京的保守派联盟随着省市委的垮台而土崩瓦解。

南大两大造反派组织——“红色造反队”和“南大八二七”——在反对省市委的斗争中协同作战，但在当地造反运动的领导权问题上 also 存在着竞争。“南大八二七”的主要发起人张建山和葛忠龙原本是“红色造反队”的成员。他们奉命组建“南大八二七革命串联会”的初衷，在于以一个更为宽泛的接纳标准积极争取外围群众，扩大造反派队伍的规模和声势。后来“南大八二七”的组织规模迅速超过“红色造反队”，他们便宣布该组织完全独立（耿昌贤访谈。但葛忠龙不同意耿昌贤的说法。他强调“南大八二七”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独立组织）。曾邦元成为新的领导人，该组织的社会影响不断扩大。“红色造反队”这时在校内居于少数派地位，不得不通过向校外发展来增强自己的竞争力。他们在11月间发起成立南京地区第一个跨行业的造反派联盟——“江苏省红总”，并扶植了一个工人联合组织——“江苏省工总”。“南大八二七”随后跟进，于12月间组建了

以自己为核心的全市性联盟——“南京八二七”。这两个联盟合力打败了保守派学生和工人。但在共同的敌人消失后，他们之间的潜在竞争立即显性化，随后在1月份的夺权斗争中彻底决裂。

### 长江机器制造厂

这个大型国有企业处于在北京的第四机械工业部和南京市委的双重领导之下——其生产业务归四机部领导，而党组织关系则隶属于南京市委。该企业由国民党政府创办于1945年，许多工人、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都是中共执政前留下的。这些“旧人员”与中共执政后进厂的工人、技术人员和复员退伍军人之间存在显著的身份认同差异。该厂在中国官僚等级制度中的地位、它的历史遗产和文革前不久厂内发生的一系列政治事件，是诱发1966年派性问题的三大因素。

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发生前夕，长江厂的党委书记是高祥芝——他是由南京市委任命的。1964年9月，四机部派了一个600多人的工作队进驻该厂，队长是四机部副部长、党委副书记兼政治部主任谭佑铭。谭是一位部队转业干部，曾任解放军政治学院政治部主任。他认为长江厂的党政干部队伍因受修正主义的侵蚀彻底烂了，因而实施了无情的整肃。高祥芝遭到清洗。近半数的中上层干部被划入“高祥芝集团”，其中80%受到批斗。还有不少普通工人和技术人员也被作为他们的忠实爪牙受到批判（《伸进工人阶级队伍里的黑手必须斩断》，《东方红战报》，1967年10月13日，第二版）。由于该厂的党组织处于南京市委的直接领导之下，所以这场清洗运动无疑隐含着对南京市委的质疑。

1965年1月，“社教”运动的基调发生重大转变，工作队的激进清洗不得不有所收敛，工作队员们还被迫做了自我批评。许多在运动前期被选定的清洗目标得以继续保留在领导班子内。1965年7月工作队撤离时，四机部任命孙树桢为厂党委副书记兼政治部主任。孙也是一位部队转业干部，曾是谭佑铭在解放军政治学院的部下。几个月后，四机部又任命另一位部队转业干部柳金铭为厂党委书记。柳金铭和孙树桢培养扶植一批进厂不久的青年工人、大学毕业生和退伍转业军人，借以压制那些在清洗运动中幸存下来的“旧人员”——其中包括厂长段俊和其他一些中层干部（《谭佑铭受审记》，《江苏东方红》，1967年12月30日，第三版。《“出头鸟”孙树桢》，《江苏工人》，1967年11月25日，第一至第二版。鲁学智访谈，南京，2008年2月28日）。这其实是四机部和南京市委之间的一种妥协：一方面，无情的清洗不再继续；另一方面，四机部工作队继续掌握权力并任命了新的党委负责人。

长江厂第一张文革大字报出现于6月9日，大字报的作者是蒋震虹和鲁学智（南京市档案馆编《南京文化大革命大事记》，第3页）。蒋是共产党员、厂政治部副主任，不久前通过孙树桢由上海某厂调入长江厂。她的丈夫是南京军区工程兵部队政治部负责人（王虹与孙树桢访谈，南京，2009年12月10日。鲁学智访谈，南京，2010年5月5日）。鲁学智是转业军人、共产党员、厂党委办公室秘书，转业前在蒋震虹丈夫所在部队服役，与这对夫妇关系密切（鲁学智访谈，2008年2月28日）。这两位新党委领导人的心腹指控厂长段俊是反革命分子和

“资产阶级技术权威的保护伞”。7月12日，该厂设计部的几位青年技术人员又贴出一张大字报，指责段俊“企图复辟资本主义”（南京市档案馆编《南京文化大革命大事记》，第7页）。这显然是新党委领导人试图利用文化大革命运动，对那些“社教”运动的幸存者重新定性，继续对他们实施打击。8月16日，依然大权在握的新党委指责另一位幸存者、某车间党支部书记陈其昌“镇压群众运动”，并决定撤销他的一切职务（南京市档案馆编《南京文化大革命大事记》，第9页。王虹与孙树桢访谈）。

几百名陈其昌的支持者反对这个决定，游行至南京市委请愿，要求恢复陈其昌的职务。而两千多名新党委的支持者也结队前往市委，表示支持对陈的清洗（南京市档案馆编：《南京文化大革命大事记》，第9页）。8月20日，市委召集长江厂党委成员到市委大院开会。市委书记处书记王楚滨在会上宣布，市委不批准清洗陈其昌的决定（南京市档案馆编《南京文化大革命大事记》，第10页）。

围绕陈其昌的争端折射出长江厂“社教”运动遗留问题对官僚政治的影响。四机部工作队实施的激进清洗摧毁了南京市委任命的长江厂党委领导班子，取而代之的是四机部任命的干部。新党委利用文革运动重启半途夭折的清洗计划，再次对南京市委构成潜在威胁。南京市委否决对陈其昌的处理决定，导致该厂干部群众的公开分裂。随之而来的是分别受到四机部和南京市委支持的两派的激烈角逐。

获悉南京市委的决定后，长江厂新党委的支持者们随即召开群众大会，指责南京市委背离毛的阶级斗争观点，试图通过镇压群众运动来保护他们自己（《革命造反派的一面红旗》，《新华日报》，1967年2月8日，第二版）。当王楚滨前往长江厂贯彻市委指示时，厂党委书记柳金铭以生病为由避而不见。他的副手孙树桢虽然与王见了面，但是拒绝向干部员工们传达市委的决定。王不得不在当天亲自召集了五个不同类型的会议，向各级干部和广大员工宣布这个决定。他还告诫那些与会者：“谁反对市委指示，就是违反党章，就是没有党性，就是反党。”

（同上）该厂党组织内部两派的冲突，因而转化为厂党委和南京市委的对抗。8月22日，两千多名厂党委的支持者高举反对市委的标语在市中心游行示威，并前往江苏省委递交了一份请愿书（南京市档案馆编《南京文化大革命大事记》，第11页。《革命造反派的一面红旗》）。

8月26日，该厂第一个工人组织——“长江红旗战斗队”——在厂党委的公开支持下宣告成立。查尧文和鲁学智成为该组织的头头（同上）。查是厂内某车间计划调度员、新党委树立的“学毛选活动积极分子”（《伸进工人阶级队伍里的黑手必须斩断》。鲁学智访谈，2010年5月5日）。鲁是厂党委副书记的忠实助手。3天后，一个敌对的群众组织——“红色职工战斗委员会”——也宣告成立。该组织反对厂党委、支持南京市委，并得到后者的公开支持。段俊和陈其昌——正是新党委对他们两人的批判和清洗引发了后来的纷争——也因利害相关，宣布支持该组织（王虹与孙树桢访谈）。

8月30日，查尧文率领12名“长江红旗”成员前往市委，要求与王楚滨辩

论。市委领导拒绝了这一要求，并派便衣警察对他们进行监视。9月1日，数百名“红色职工委员会”成员赶赴现场，对市委表示支持。此时王楚滨才出来与“长江红旗”代表见面。他们与对方辩论长达14个多小时，始终坚持市委的决定是正确的（《革命造反派的一面红旗》）。

次日，“长江红旗”动员了一千多人徒步前往北京请愿。当他们行进至安徽滁县火车站时，四机部派谭佑铭和另一位副部长赶来劝阻，南京市委也命令孙树桢赶赴现场做同样的工作。他们最终说服请愿团返回南京（《革命造反派的一面红旗》。王虹与孙树桢访谈）。当这些人回到工厂后，“红色职工委员会”到处散发传单，指责他们的北上行动是破坏生产的“反革命行动”。“长江红旗”则以大字报和传单等形式予以回敬，指责省市领导镇压群众运动，并指控“红色职工委员会”是“走资派”的工具（《革命造反派的一面红旗》）。

在9、10月间，南京市委和四机部领导经过反复磋商，最终一致同意长江厂党委存在严重问题，必须加以改组。11月2日，四机部官员来到长江厂，宣布将派一个新的党委领导班子进厂取代现任领导班子。支持现任领导人的“长江红旗”宣称，这是南京市委阴谋“镇压革命”的新举措。而“红色职工委员会”则热烈拥护这个决定，并指责“长江红旗”践踏党的领导原则。然而，此时南京市委和北京的四机部均因受到群众运动的冲击，无力贯彻这个决定。长江厂领导人得以保留其领导职务。在11月16日爆发的一场激烈的派性武斗中，“红色职工委员会”被打败。该组织一千多名成员随即集体撤出工厂表示抗议（同上）。此后该厂便处于厂党委和“造反派”——“长江红旗”——的绝对控制之下（迫于长江厂造反派的压力，南京市委最终于1966年12月18日宣布同意撤销陈其昌的职务。详见传单《号外——黑帮分子、保“段”主将陈其昌被罢官》，1966年12月18日印发）。

因反对厂党委而受到镇压的少数派组织“红色职工委员会”，积极争取厂外的潜在同盟者的支持。鉴于南京市委支持他们向专横跋扈的厂党委领导人造反，他们后来加入了“南京市工矿企业赤卫队”——一个坚决捍卫南京市委的全市性联盟组织（南京市档案馆编《南京文化大革命大事记》，第25页。《革命造反派的一面红旗》）。他们始终保持对该组织的效忠，直到1966年底该组织因市委垮台而解散。回到厂里后，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遭到监禁和折磨（《革命造反派的一面红旗》。《伸进工人阶级队伍里的黑手必须斩断》。鲁学智访谈）。在厂内占据支配地位的“长江红旗”则在全市性的工人造反派组织“江苏省工总”中扮演了领导角色，并在1967年1月下旬参与发动向省市委夺权的行动。

1967年1月，“长江红旗”在厂内实施“夺权”。柳金铭和孙树桢被标榜为“革命干部”，进入新的权力机构的领导核心（《长江厂红旗战斗队贯彻毛主席制定的干部政策，和革命领导干部并肩战斗联合夺权掌权》，《新华日报》，1967年2月19日，第二版）。查尧文、蒋震虹和鲁学智也成为新权力机构的领导班子成员（《革命造反派的一面红旗》）。夺权的“造反派”其实是现任厂党委领导人建构出来的，他们在1966年始终为捍卫厂党委而战，现在又顺应潮流上演了一出“换汤不换

药”的“夺权”闹剧。

## 结论

显而易见，南京派性斗争的起源与利益集团政治的类型很少相似之处，尽管长期以来很多人一直认为是利益集团政治孕育了文革期间的冲突。只有在南师附中的故事中，我们发现了某种形似性——即高级干部家庭出身的红卫兵借助“血统论”主导着初期的红卫兵运动。正如既往的研究论著所强调的那样，这的确是一个被清晰界定的利益集团在运动中努力提升自我地位的一种方式。“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捍卫学校当局和省市委的行动，也与这种解释非常吻合。如果我们的考察就此打住，仅限于描述这些红卫兵的修辞策略和他们相对保守的政治立场，那么家庭出身似乎确实可以用来界定和解释校内的派性冲突。

然而，一种更深入和更持久的考察却揭示出若干不同之处。

第一，后来取代两个老红卫兵组织的造反派组织的发起者们，也出身于享受政治特权的革命军人和党政干部家庭。尽管他们后来确实在接纳组织成员时表现出更强的包容性，然而这种包容性与他们在“血统论”争论中所持的公开立场有关。这些学生领袖的特权家庭背景也与一般情况有所不同：其中一位的父亲因其早年从事“白区”地下工作的经历而遭受政治嫌疑困扰；另一位继父是解放军军官，而生父却是国民党军官。这意味着特权阶层内部的潜在差异，使得他们之间的团结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牢固。

第二个不同之处更为有趣——即两大精英主义红卫兵派别采取了不同的政治立场。由军队干部子弟主导的“红色造反军”对学校当局更加敌视。校党支部书记兼校长——一位“老革命”——成为他们斗争和羞辱的对象。由地方干部子弟主导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则是在校方的鼓励下成立起来的，其目的正是为了牵制政治立场较为激进的“造反军”。然而这种策略只在一段时间内有效。当“血统论”的观点遭到中央否决之后，“造反军”发出攻击省市市委的号召，其激进程度甚至一度超过了校内新出现的造反派组织。“思想兵”始终坚持捍卫省市市委的立场，而“造反军”的立场则日趋激进。这种反差显示出中国精英阶层内部更为细腻的分野。如果的确像一些研究者经常宣称的那样，老红卫兵们是出于保护他们自身家庭的考量而倾向于捍卫现有党政权威，那么军队干部家庭出身的学生在攻击现有党政权威时往往较少迟疑（与此类似的一个现象是，南大工作队中三位来自南京军区的副队长很快承认省委应该为工作队的高压政策负责，从而将群众运动的矛头引向地方党政领导层）。那些在现存政治体制中享有特权的人们，在这些不断变化的冲突对抗中并不一定存在共同利益——在其他情形下难以察觉的同类群体中的个体之间的差异，在这里变得十分明显。

如果说南师附中个案与现有解释体系之间的相互抵触还显得比较微妙的话，南京大学的情况则更为直观明了。该校三大派性组织的发起者和领导者全都具有相同的背景，全都与学校党组织关系密切——他们都出身于“红五类”家庭，都是共产党员，都担任政治辅导员、学生干部和团支部书记之类的职务。然而他们

对学校当局、工作队和省市委的立场并不相同。那些卷入溧阳大字报事件并在匡亚明的反击中遭受打压的学生，后来被主流媒体标榜为“造反英雄”，得到工作队和省市委的关照。作为回报，他们后来成立一个捍卫工作队和省市委的红卫兵组织。而那些背景相同、在校本部卷入类似的大字报事件的学生，则受到工作队的冷落。因而当北京下令撤出工作队时，这个群体中涌现出一批新的造反英雄。为了推翻工作队强加于他们的不利判决，他们还与省市委发生直接对抗。这样，具有相同背景的两拨人马在不同的时段卷入造反运动，在不同的事件中扮演赢家和输家，最终形成相互敌对的两派。

该校两个造反派组织——“南大红色造反派”和“南大八二七”——之间的关系同样值得关注。后一个组织的发起者是前一个组织的早期成员。他们之所以分裂出去，是因为“红色造反派”固守精英主义的立场，在吸纳组织成员时过于强调家庭出身和个人政治表现。值得指出的是，尽管“红色造反派”吸纳成员的标准与南师附中两个老红卫兵组织的标准相似，然而这并未阻止他们选择反对学校党委、反对工作队乃至反对省市委的立场。“南大八二七”的差异仅仅表现为其吸收成员的标准较为宽泛——结果导致其组织规模迅速扩大。这两个组织在反对省市委的斗争中团结一致，然而他们之间潜在的竞争关系在1967年1月带来严重后果——他们领导的两大造反派联盟在向省市委夺权时发生分裂。“南大八二七”方面先是从夺权行动中退出，继而公开否定夺权。而“红色造反派”则极力捍卫其夺权的合法性。这酿成此后两大造反派联盟之间长达一年多的激烈斗争——尽管在此期间全国的运动发展充满波折与反复。将他们之间的斗争界定为“保守派”与“造反派”之间的斗争，显然名不副实。

最后，长江机器制造厂内两派工人的对抗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纯粹的官僚体制内部派性冲突的范例。1964至1965年“社教”运动期间的官僚体制内部政治，早已在该厂干部和工人中造成分裂。四机部工作队几乎摧毁了南京市委任命的厂党委领导班子。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由四机部任命的新党委领导人随即利用这场运动继续清洗那些“社教”运动中的漏网之鱼。当反对派们奋起抵抗并得到南京市委支持时，厂党委扶植了一个忠诚的“造反派”组织来保卫自己，与南京市委对抗。由此可见，长江厂的派性斗争是党组织系统内部的裂痕不断加剧、直至彻底决裂的产物。而导致这种裂变的，是北京四机部、南京市委和长江厂党委三方在官僚政治中的复杂互动。这场派性斗争展示了一幅十分微妙的图景：反对厂党委的造反派组织从南京市委那里获得支持，并参加了誓死捍卫省市委的保守派联盟“赤卫队”；而厂党委的忠实支持者则与社会上的造反派组织结成联盟，并加入了推翻省市委的行动。长江厂内大获全胜的“造反派夺权”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局：这次夺权行动丝毫没有改变厂内的权力格局，反而进一步强化了对厂内反对派的镇压。

总而言之，本文所论述的是分裂，而非团结；是官僚政治语境中的派别，而非不同利益集团。那些先前在现行体制中获益的人们并未团结一致地捍卫它，从而与那些受到排斥、试图颠覆现行体制的人形成对抗。取而代之的，是具有相同



或相似背景的人们——如党委会成员、干部、党员、学生和工人领袖等等——在局势发展瞬息万变、各方信息含混不清的情况下，阴差阳错地采取了不同的政治立场、形成了相互敌对的两个阵营。而且，这样的分野不是一成不变的——因为冲突的每个阶段都会产生一批赢家和输家，促使人们不断地变换其政治归属，所以派性分野也处于不断地发展变化之中。南京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与北京的情况相同，而且我们推测其他许多地方也是如此——是伴随着官僚政治的进程逐步展开的。官僚政治促使那些效忠现行政治体制的人们相互争斗，从内部瓦解了现行政治体制的权力架构。

---

【史林一叶】

## 1967 年南京“一月革命”的失败

董国强、Andrew G. Walder

按：本文译自英文，原标题为 Nanjingian's Failed "January Revolution" of 1967: The Inner Politics of a Provincial Power Seizure，刊载于英国剑桥大学主办之 *The China Quarterly*, Vol. 203, September 2010, pp. 675-692。

长期以来，学界似乎存在着一个广泛共识——即文化大革命头两年的群众派性冲突是“保守派”和“激进派”两大势力之间的斗争，而斗争的目的在于塑造有利于自己的运动结果。按照这种解释，处于政治制度顶端的毛泽东和从属于中央文革小组的激进官僚们，在林彪和人民解放军若干重要单位的支持下，与地方上的造反派组织——其成员主要来自在现行体制中处于边缘或从属地位的社会团体——结成同盟。游离于这些激进势力之外的，是那些持保守主义立场的官僚和地方上的军队领导人——他们与那些在现行体制中受到偏爱的社会团体成员组成的群众派别结成联盟。这种解释体系是在无缘接触“后毛”时期大量涌现的历史文献、回忆录和重要人物口述史料的情况下，由一些西方学者以一种十分坚定的口吻提出来的。然而它却长期广泛流传，并被英语学界奉为有关那段历史的标准叙述。到了“后毛”时期，这种解释又受到一些曾在文革期间风云一时、而后流亡海外的中国作家的盲目追捧，因而其可信度似乎得到进一步确认（详见 Hua Linshan, *Les Années Rouges*, trans. Henri Leuwen et Isabelle Thireau. Paris: Éditions du Seuil, 1987; 华林山《文革期间群众性对立派系成因》，刊载于刘青峰主编《文化大革命：史实与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6；刘国凯《广州红旗派的兴亡》，香港：博大出版社，2006）。

然而最近一些年来，这个曾被广泛接受的共识受到挑战：挑战针对的不是它对北京领导层中政治分歧的刻画，而是其对省级和省级以下政治对垒的描述。徐友渔曾尖锐地指出，这种解释过分夸大了与“社会冲突”相关的有限证据，混淆了 1966 年下半年“保守派—造反派”之间的分野与 1967 年 1 月夺权以后“激进

派”组织之间的对抗。徐指出在1966至1967年间，在中国29个省级行政区划中，只有6个地区可以认定自始至终存在着“保守派”和“激进派”的概念划分（徐友渔《形形色色的造反——红卫兵精神素质的形成及演变》，第18-21页和第81-109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9）。Andrew Walder关于北京红卫兵内部冲突的研究论著，细致描述了“天派”和“地派”之间的长期斗争。这两派的政治分歧似乎与一般认定的“激进”或“保守”概念毫不相干（详见Andrew G. Walder, *Fractured Rebellion: the Beijing Red Guard Movemen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此前的许多论著往往认定“天派”为“保守派”，“地派”为“激进派”。参见Lee, *Politics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pp. 216-229）。卜伟华在其新近出版的文革研究专著中没有涉及上述理论问题，不过他对1967年许多地方省级权力斗争的概述支持徐友渔的结论（详见卜伟华《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第383-428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

通过对南京“一·二六夺权”前后政治冲突的详实考察，我们将更加深入地探讨上述问题。事实上，这起夺权事件导致当地群众派性组织分化重组，并在此后两年持续影响着地方派性政治。卷入这场争斗的造反派们先是在推翻江苏省委的斗争中结成联盟，而后又在北京大人物策动的仓促夺权行动中发生分裂。他们之间的对抗与首都的派性政争相互牵扯，后者激化与固化了本来十分细小的分歧。我们在这里看到的，不是重建政治秩序问题上的原则冲突，而是一系列含义模糊、变化无常的政治博弈。这样的政治博弈很难用“保守的”或“激进的”概念加以定性。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历史叙事将向人们揭示，一场起初由现行体制攻击者挑起的反对现行体制捍卫者的斗争，是如何迅速转化为一场性质完全不同的斗争的。

### 1967年江苏“夺权”的背景

1967年上海“一月风暴”得到最高当局的赞赏，引发了一波席卷中国大地的群众夺权浪潮。尽管当时的舆论宣传充斥着“群众运动”的激进修辞，毛泽东却始终坚持党政官员和军队干部在“革命委员会”中的主导地位。接踵而至的，是对具有独立倾向的激进组织的大力遏制。上海“一月风暴”本质上是由张春桥（他身兼上海市委和中央文革双重领导职务）领导的一次旨在打倒上海市委领导班子的体制内政变。张的成就主要表现为重建地方秩序、收服工人运动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中央领导层导演了上海的夺权事件，并在相当程度上成功地实现了预期目标。该市在夺权后没有像中国其他地区那样陷入派性武斗的泥潭。上海模式中的一些关键因素显然具有排他性：毛毫不含糊地支持张春桥成为新的地方领导人，中央高层在迅速恢复当地秩序的问题上存在共识，造反派势力在听命于北京的造反派头头的领导下团结一致。在上海1月6日事件得到媒体赞扬后的30天内，其他23省的首府也宣布夺权。然而在1967年的头11个星期内，北京当局只承

认其中4省夺权合法（北京、天津、内蒙、福建和湖南五地没有发生以“上海模式”为蓝本的夺权。详见卜伟华：《砸烂旧世界》，第383-428页）。在这几个省，毛泽东和中央文革都选择一位政治姿态激进、得到他们信任、同时具有相当地位和经验的省委领导人重建秩序（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因模仿毛泽东公开支持造反派，在该省的“夺权”事件中幸存下来。其他几位幸运儿则在关键时刻向其顶头上司造反，他们是：山西省副省长刘格平、山东青岛市副市长王效禹、贵州省军区副政委李再含。详见卜伟华《砸烂旧世界》，第304-308页和383-392页。另见 Roderick MacFarquhar and Michael Schoenhals, *Mao's Last Revolu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171-173.)。其中最后一个获得迅速承认的是3月18日山西夺权。此后直到8月，其他各省的夺权都没有得到中央确认。与此同时，地区性的权力斗争在全国范围爆发（在北京，造反派组织在1966年底打败其“保守派”对手后立即发生分裂，无法联合起来实施夺权。作为替代，毛泽东指令公安部和北京卫戍区于4月间以自上而下的方式组建了一个革命委员会。详见 Andrew G. Walder, *Fractured Rebellion*, ch. 8. 另见卜伟华《砸烂旧世界》，第392-399页）。

如果没有北京的明确支持以及随之而来的军队方面的支持，任何夺权行动都不会成功。这需要地方参与者与中央领导人之间的紧密配合。在中央，发挥重要作用的是周恩来和中央文革。他们向毛泽东提供建议——这些建议常常显示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导向，然后由毛做出最后的决定（详见毛泽东关于各地夺权问题的多次指示，载于《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周恩来的优先考虑是尽快重建地方权力机构和恢复交通与工业生产——这两者都在1966年下半年遭到严重破坏。周在1966年秋天曾试图阻止造反运动向工厂农村蔓延，但是没有成功。当动乱急剧升级后，他变换策略转而积极鼓励造反派“夺权”，以便在“夺权”后迅速重建地方权力。另一方面，中央文革的当务之急则是确保新的掌权者效忠于他们和他们的主张。他们并不急于重建秩序。上述两种考量之间的相互抵牾是显而易见的，因而中央文革疑虑周恩来是否会因权宜之计而牺牲政治原则。中央领导层内部的意见分歧常常导致僵局，很多问题久拖不决，连毛泽东也很难迅速做出决断。在南京个案中，北京高层的内部冲突和优柔寡断，使得与“夺权”有关的一系列问题变得含混不清，加剧了造反派内部的分裂。

南京个案很好地诠释了为什么复制上海模式如此困难——以及为什么那些激进团体在推翻地方当局后如此迅速地分裂为相互对立的两派。

1967年1月26日，当地一个庞大的造反派联盟宣布夺权。这促成在北京举行的任命新的地方领导班子的艰难谈判。南京的造反派无法就分享权力达成一致，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在选择哪位地方干部担任过渡权力机构一把手的问题上意见相左。僵局加剧了江苏的派性斗争，迫使北京于3月5日宣布对该省实施军管——派性冲突受到遏制，但未得到妥善解决。

我们能够对南京的情况做出深入分析，是因为我们所占有的资料一般而言较

为稀缺。其中包括一套近乎完整的《八二七战报》——由当地一个主要派别主办的报纸——和一部由南京市档案馆在 1980 年代中期编印的《南京文化大革命大事记（初稿）》——当时只印发十本向各方征求意见，后来也没有机会公开出版。此外，我们还拥有北京谈判期间当地造反派头头与中央领导人多次会谈的记录，近年来公开出版发行的回忆录和大事记，以及本文第一作者与许多亲历这些事件的主要造反派头头的访谈资料。

### 南京地方党政机构的垮台

“夺权”一词的本意是用武力推翻当局。然而南京的地方政权在 1966 年底已经近乎彻底瘫痪（详见拙文《江苏“一·二六夺权”前后的权力角逐》，《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007 年 6 月号）。这个过程始于 11 月，当时省委主要领导成员们不得不多次陪同造反派赴北京请愿（南京市档案馆编《南京文化大革命大事记》，第 22、24 和 27 页）。到 12 月底，造反派们包围省委大院，要求领导干部们出席批斗会、坦白交代罪行、与造反派签订协议。这些行动引发了保守派工人组织“赤卫队”与造反派之间的街头对垒。他们也派人前往北京请愿（江渭清《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忆录》，第 540-542 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在毛泽东肯定了 1 月 4 日和 6 日上海两大报刊夺权以后，南京的保守派组织放弃了抵抗（毛泽东《对中央文革小组就“文汇报”、“解放日报”夺权事件的谈话》，1967 年 1 月 8 日，刊载于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02。另见《南京文化大革命大事记》，第 35 页）。他们的最后抗争是所谓“一·三事件”——其间保守派和造反派组织在市内发生武斗，造成铁路交通和长江航运的阻断（当时南京长江大桥尚未建成，火车必须通过轮渡横渡长江。南京的武斗阻断了这条动脉，使得工业重镇上海与华北各地的交通运输彻底中断。这令人信服地解释了周恩来为何如此关注南京的局势。关于当时的武斗情况，详见《南京大学八二七革命串联会紧急声明》，《八二七战报》，1967 年 1 月 5 日，第一版；《南京十多万革命造反派举行“一·三血案”声讨大会》，《八二七战报》，1967 年 1 月 11 日，第一版；《南京文化大革命大事记》，第 34 页；《中共江苏省委关于南京“一·三事件”的平反决定》，1978 年 12 月 30 日，刊载于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办公室编《拨乱反正：江苏卷》，第 401-403 页，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江渭清《七十年征程》，第 541-543 页）。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于 1 月 22 日向北京发出特急电报，报告省委已经停止工作（《江渭清给中共中央的特急电报》，1967 年 1 月 22 日，刊载于《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从那天起，省委书记处成员江渭清、陈光、许家屯和彭冲等人遭到造反派监禁，并经常被拉到群众大会上批斗，还被迫在脖子上挂上牌子游街示众（江渭清《七十年征程》，第 544-545 页；另见《自绝于人民的江渭清绝没有好下场》，《农奴戟》，1967 年 3 月 8 日，第四版）。一个大型造反派联盟组织——“江苏省红总”——开始代替江苏省委发号施令（耿昌贤访谈，扬州，2007 年 2 月 1 日。文革爆发时，耿是南大外文系法语专科班二年级学生。他参与发起“南大红

色造反队”，后来又参与发起“省红总”，并成为这两个组织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1月17日，当地造反派几大组织的代表们决定成立“江苏革命造反联合会筹委会”，文凤来和张建山当选主要头头。文凤来是南京大学政治系讲师、“南大红色造反队”一把手和“江苏省红总”的后台老板（他是一名转业军人、共产党员，当时30多岁）。张建山是南大数学系高年级学生、“南大红色造反队”和“南大八二七革命串联会”的重要领导人（他是数学系团总支副书记、系学生会主席。他和葛忠龙都是“红色造反队”的早期成员。“红色造反队”因自身吸收组织成员的标准较高，于是决定派张建立一个外围组织——“八二七革命串联会”——以吸引更多希望加入造反运动的群众。后者的组织规模很快便超过了“红色造反队”，并进而与之竞争群众运动领导权）。造反派控制了大众传媒，但他们并未打算向省委夺权。与北京的情况一样，南京造反派势力的发展壮大，是其核心成员在文革初期遭受工作队惩罚后不断抗争的结果。一旦他们从地方当局那里获得平反和道歉，他们的核心诉求便得到了满足。他们期盼的不是夺权，而是由中央罢免那些最坏的地方官员，同时对在斗争中涌现出来的群众组织予以承认和保护。

### 周恩来的意外介入

南京的造反派们是在周恩来的反复敦促下实施夺权的。这看起来似乎有悖常理——因为周恩来一直努力抵制中央文革的激进主张。然而他的行动其实并不难理解。南京的地方政权已经垮台了，工业生产、交通运输和公共服务变得一团糟。在毛泽东肯定上海夺权之后，重建秩序的唯一途径便是诱导造反派联合“革命干部”和当地驻军实施夺权，而后建立一个革命委员会。周的介入是为了加速这个进程并达成预期的结果。

周恩来于1月中旬主动联系葛忠龙。葛是“南大八二七”的发起人之一。几个星期前，他前往北京状告南京地方当局，得到过周恩来的接见（本段叙述基于葛忠龙访谈，阜宁，2007年4月14、15日。葛是南大数学系高年级学生。1966年12月，他率领一个南大造反派代表团前往北京控告南京地方当局。1967年南京“一三”事件发生后，他在1月6日、7日和8日连续三次受到周恩来接见。参见《周恩来年谱》，下卷，第109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1月16日，周的一位秘书打电话给葛，告诉他南京造反派应该尽快提交一份夺权方案。葛立即向其他造反派头头传达了 this 信息，同时也向高啸平、梁辑卿、杜方平、吴大胜等人做了通报。高啸平是较早支持造反派的省委干部（高啸平文革爆发时是江苏省委统战部长。他在1960年代初受到过省委的处理，个人仕途因而大受影响。他的妻子是南大中文系调干生、“南大八二七”成员）。梁、杜、吴是南京军区干部，曾任省委驻南大工作队副队长，于1966年秋表态支持学生造反派（梁辑卿是江苏省军区副政委，少将军衔；杜方平是南京军区国防工业部部长，大校军衔；吴大胜是南京军区后勤部副部长，大校军衔）。以《解放军报》记者名义派驻南京的中央文革记者邢文举也接到葛的通报（这些以《解放军报》记者身份被派往各地的中央文革记者在当地运动中扮演的角色，参见Walder, *Fractured*

*Rebellion*, ch. 6)。邢文举随后起草了一份夺权方案（《一·二六夺权前后》，《革命造反报》，1967年2月17日，第二版）。1月21日，周的秘书再次致电葛忠龙，敦促造反派们加快行动步伐（葛忠龙访谈）。

周恩来还在1月中旬打电话给“八二七”的另一个头头曾邦元，询问他对上海夺权事件的看法（本段叙述基于曾邦元访谈，南京，2007年11月28日。曾1964年从南大数学系毕业后，留校担任政治辅导员。他在上学期间入党，文革爆发时是数学系团总支书记）。曾回答说：“我们支持中央的决定，支持上海造反派夺权。”周随后问曾，南京的造反派是否也准备夺权。在得到否定答复后，周问：“那你们如何以实际行动支持中央的决定呢？”曾回答说，造反派觉得自己没有能力管理江苏。停顿了一会后，周在电话那头解释道：所谓夺权，并不是真的要造反派接管政府，而是要他们监督那些在任的官员做好工作。曾回答：“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们可以夺权。”周随后指示曾邦元与南京军区取得联系，尽快提交一个夺权方案。周还于1月23日打电话给南京军区干部梁辑卿，表扬他和南京军区“帮助揭开了江苏阶级斗争的盖子”，并要他们考虑一下夺权问题（《访问梁辑卿同志记录》，《革命造反报》，1967年2月18日，第四版）。

周恩来的上述举动与1月22日《人民日报》相互呼应——该报当天在头版发表了三篇文章，号召所有“无产阶级革命派”奋起夺权（详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一切权力归革命造反派》、《造反就是要夺权！》，刊载于《人民日报》，1967年1月22日，第一版）。22日下午，周恩来和陈伯达在北京接见全国各地的造反派头头。周在讲话中强调，（一）各地的夺权必须以造反派的大联合为基础；（二）各政府机关内部的造反派应该在夺权中发挥主导作用，社会上的造反派予以协助；（三）各级政府官员在夺权期间应该坚守岗位、继续履行其日常工作职责，并接受革命群众的监督（《周恩来同志代表毛主席、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对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大夺权问题做重要指示》，1967年1月22日，刊载于《中央负责同志讲话摘录（第三辑）》，第194-195页，未标明编辑出版者，1967年1月印发）。在周恩来和《人民日报》的激励下，南京的造反派开始行动。1月22、23和24日，造反派头头们开会商议夺权事宜。《解放军报》记者、中央文革记者邢文举出席了这些会议，并起草了一个“夺权委员会”名单。梁辑卿、杜方平、吴大胜也出席会议表示支持。会议期间，以文凤来为首的“夺权委员会”宣告成立。

这些会议种下了造反派不和的种子。若干重要组织的代表指责会议“缺乏民主”，反对“夺权委员会”的人员构成，宣布退出会议。结果，“南大八二七”的头头们——其中最著名的是曾邦元——被排除在委员会之外（《一·二六夺权前后》。另见《南京文化大革命大事记》，第38页）。夺权议程继续推进，但造反派队伍分裂为两派：一派参加了夺权行动，而另一派则没有。

1月25日午夜后不久，“夺权委员会”派出一万多名造反派成员分赴省市下属的各个机构夺权（《夺权记》，《红卫兵报》，1967年2月15日，第一版）。南京军区事先得到通知，届时宣布实施宵禁，以确保造反派的夺权行动不受阻碍

（《一·二六夺权前后》。另见《南京文化大革命大事记》，第40页）。其实当地党政机构早已瘫痪，根本无法组织任何抵抗。所谓“夺权”行动虎头蛇尾，不过是在政治上走个过场。

“夺权委员会”事先向周恩来和中央文革报告了夺权方案，并获得他们的批准（葛忠龙访谈。耿昌贤访谈。邢文举在回忆录中否认他事先得造反派方面的通知，不过他暗示南京军区和北京中央确实在事先批准了夺权方案。详见邢文举口述、杨民青整理《为“中央文革”做记者的日子（上）》，刊载于《老照片》，第59辑，第6-7页，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然而造反派阵营的分裂违反了周恩来关于夺权的首要原则——造反派的大联合。参与夺权的造反派们在南大召开会议庆祝他们的胜利。中途总理办公室打来电话，指示与会者们暂缓对外宣布夺权。经过一番讨论，他们还是公开宣布了夺权的消息（《“文记”夺权委员会罪恶种种》，刊载于《革命造反报》、《东方红战报》、《八二七战报》、《红卫兵报》联合专刊，1967年2月23日）。随后张建山代表“夺权委员会”致电总理办公室说明情况，试图争取他的支持（同上）。

反对夺权的造反派受到北京电话指示的鼓舞，冲进《新华日报》社阻止该报发布夺权消息。1月28日凌晨，周恩来的秘书又打来电话说，由于造反派意见分歧，中央准备召集各有关方面代表赴北京汇报夺权情况、商谈组建过渡权力机构事宜（《惊呼省委书记处》，《东方红战报》，1967年2月9日，第四版）。尽管如此，夺权派们还是在1月28日《新华日报》上发布了夺权消息，并于1月30日在五台山体育场召开了一个庆贺夺权成功的群众大会（《江苏省革命造反派联合夺权声明》，《新华日报》，1967年1月28日，第一版。另见《一·二六夺权前后》）。南京军区派出4000名指战员参加大会，军区一位副司令员在会上发言支持夺权，会后还在市区举行了军民联合武装大游行（《南京文化大革命大事记》，第42页。此前不久，毛泽东曾指示南京军区派部队出席安徽合肥的群众大会，以表明军方的“支左”立场。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卷，第197-198页）。

周恩来首鼠两端——先是策动夺权，而后再拒绝赋予其合法性——似乎取决于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当然是夺权前夕造反派阵营的分裂。不过更重要的，恐怕还是缺乏一位中央了解并信任的高级官员去领导新的权力机构。南京造反派领袖文凤来不过是一名普通党员、转业军人和大学讲师。“夺权委员会”核心成员中没有一位高级党政干部或军队将领。周恩来策动夺权的目的在于重建秩序，而现在的情况与他的预期相去甚远。周的后续干预显示，他当时最关心的是过渡权力机构的“一把手”人选。

### 艰难的北京谈判

周恩来指示南京军区组织一个代表团赴北京。他强调这个代表团必须包含支持和反对夺权的两派造反派代表、原省委领导干部代表和南京军区的代表（《南京文化大革命大事记》，第42-43页）。杜方平大校受命组建代表团，并担任军方



代表。原省委书记处成员李士英和包厚昌被选为“革命干部”代表（李士英长期在康生手下工作，1960年代初调任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分管政法工作。包厚昌曾任无锡市委书记，文革前不久调任省委书记处书记，分管经济工作）。文凤来和其他几位来自高校、工厂和其他单位的造反派头头被选为“夺权派”代表。反对夺权的造反派们希望由曾邦元代表他们，但是遭到夺权派的激烈反对。最终，南京大学生物系调干生、“八二七”二号人物袁服武和来自其他高校的两造反派头头当选“反对派”代表。周恩来事先审阅了代表团名单，下令在名单中增加原江苏省委第二书记陈光（周恩来还指示在名单中增加葛忠龙，作为反对夺权的造反派代表。周显然不知道，葛事先已经加入“夺权委员会”并成为其核心成员。葛忠龙访谈。《南京文化大革命大事记》，第42-43页。《“文记抢印代表团”究竟是什么货色》，《东方红战报》，1967年3月5日，第三版）。

江苏代表团于2月7日抵达北京，那些赞成夺权的代表团成员对获得中央的支持信心十足。然而他们的信心很快便发生动摇。代表团住进宾馆的当晚，便有一位自称是中央办公厅干部的人造访。他说他要护送李士英去见“一位中央高级首长”。他拒绝回答为什么中央首长要单独接见李士英，要去见哪一位中央首长，也拒绝了其他人陪同李士英一起去见那位“中央首长”的请求。结果代表团没让他带走李士英（葛忠龙访谈）。

第二天，周恩来和谭震林召见江苏代表团。造反派们对随后发生的事情深感意外。周恩来一上来便拿出最新一期《红旗》杂志，指着上面的社论《论无产阶级的革命纪律和革命权威》说道：

“你们夺权我们已经看到，中央要经过与你们会谈才能表示支持或不支持。这是一个很重大的问题，没有党和毛主席领导，没有无产阶级专政保护，没有解放军的大力支持，又怎么能够夺权呢？今天的夺权，是1949年夺权斗争的深入和继续。但情况不同了。主席批示我，各省夺权后，要一个一个地接见。昨晚我委托康生同志先找李士英同志来谈一谈，你们要派人来监视，来记录。我们这样支持你们，你们这样不尊重我们，我很难过。你们……给不给中央权力呢？”（《周恩来谭震林与江苏省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座谈纪要》，1967年2月8日，刊载于《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造反派们现在才意识到，中央谋求在各地夺权问题上的绝对权威。周恩来立即向毛泽东转呈了谭震林、陈毅等人联名起草的一份请示报告，建议将十多个省的省委领导人——包括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召到北京加以保护（《周恩来年谱》，下卷，第124页。另见《谭震林陈毅给周恩来的两封信》，1967年2月6日，刊载于《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2月8日，南京军区派人前往南京炮兵指挥学院，将被造反派关押在那里的江渭清解救出来，并用专机送往北京。江渭清在北京接受了体检，又洗了澡刮了胡子，然后被安顿在京西宾馆休息（江渭清在其回忆录中非常肯定地说，他从造反派手中获得解救的日期是2月8日。然而这个说法与当时遗留下来的一份史料相互抵触。详见江渭清《七十年征程》，第546-548页。另见《“地下省委”复辟记》，《革命造反报》，1968年1月

21 日，第二至第四版）。

在接下来的两个星期里，周恩来和谭震林多次与江苏代表团内的不同群体举行会谈，促使他们达成共识（以下资料记载了 2 月 10 日、16 日、21 日、22 日、23 日、24 日和 25 日的会议情况：《触目惊心的资本主义复辟》，《星火燎原》，1968 年 4 月 25 日，第一版；《新华日报究竟是谁家的报纸》，《六·一三战报》，1968 年 1 月 23 日，第二至第六版；《“地下省委”复辟记》）。周和谭的意图很快便清楚地显现出来：他们希望江渭清成为过渡权力机构的“一把手”。2 月 9 日，谭震林单独召集旧省委干部和杜方平开会。他轻描淡写地批评了江苏省委的政治错误，同时强调江渭清是近年来敢于质疑刘少奇“桃园经验”的少数几个省委书记之一。他随后提出以江渭清为首的新权力机构的组阁方案（《触目惊心的资本主义复辟》）。

周恩来在与造反派头头的一次私下接触中表达了相同的意思。他告诉他们，《红旗》杂志即将发表一篇正确处理干部问题的新社论（参见《必须正确对待干部》，《红旗》杂志 1967 年第 4 期。该社论还提前发表于《人民日报》，1967 年 2 月 23 日，第一版）。在解释该社论的内容时，周说：“我们必须正确对待那些犯过错误的干部。……老干部参加新的权力机构对我们的夺权斗争有利，因为这些老干部有着丰富的斗争经验和很强的组织能力。”（这篇社论最终发表于 1967 年 3 月 1 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但是周在 2 月 18 日审阅了校样。详见《周恩来年谱》，下卷，第 129 页）周还告诉造反派：江渭清同志是经过战争考验的“老革命”，对党忠诚，所以中央打算让他领导新的革命委员会（葛忠龙访谈）。

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尽管代表团中的那些旧省委干部立即同意周、谭的提议，其他很多人却对此持强烈的保留态度。文凤来和杜方平对周、谭的提议深感困惑和不安。据史料记载，文凤来在一次会议上与谭震林发生争执，强调江渭清的错误非常严重（《谭震林是破坏江苏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井冈山》，1967 年 6 月 23 日，第三版）。杜方平不敢直接顶撞周恩来和谭震林，但他内心不满、试图拖延。当周恩来催促他表态时，杜方平推托说需要先向南京军区首长请示（杜方平访谈，南京，2007 年 10 月 8 日。另见《杜方平在京学习会上检讨摘录》，1967 年 11 月 12 日，刊载于《江苏工人》，1968 年 3 月 15 日，第一至四版）。周恩来立即反问道：“我现在代表中央处理江苏问题，你认为南京军区领导敢反对中央吗？”（杜方平访谈）

最终，支持夺权的造反派们迫于中央的压力同意了这个提案。周恩来和谭震林于是安排江渭清的秘书班子进京，替他起草未来在群众大会上站队亮相的自我批判发言（戴国强访谈，南京，2007 年 7 月 8 日。戴作为代表团成员参加了北京谈判。他是新华社江苏分社记者，文革初期卷入造反运动，后来成为当地支持夺权的造反派头头）。至此，一个由原省委领导干部、军队“支左”干部和愿意合作的群众组织代表组成的新的江苏地方权力机构可谓呼之欲出。

## 反对夺权的造反派

在江苏代表团赴北京谈判期间，反对夺权的造反派组织了自己的代表团——“江苏控告团”。这些造反派也在推翻南京地方政权的斗争中扮演了领导角色。当地第一个群众组织——“南大红色造反派”——成立于1966年8月23日。南大政治系讲师、共产党员文凤来是该组织主要领导人。第二个造反派组织——“南大八二七革命串联会”——于4天后宣告成立，主要头头是数学系青年教师曾邦元。这两个南大造反派组织联手打败了支持省委的“南大红旗战斗队”。然而到1966年11月造反运动溢出大学校园后，这两个同盟组织为扩大各自的社会影响力而展开竞争。不久他们分别组建了两个全市性的造反派联盟：一个是以“南大红色造反派”为首的“江苏省红总”，一个是以“南大八二七”为核心的“南京八二七”。这两大联盟组织合作打垮了保守派联盟组织“南京厂矿企业工人赤卫队”。然而共同的敌人刚刚消失，他们之间围绕省市群众运动领导权的潜在竞争便再度升温。一些“八二七”头头——如曾邦元和袁服武——反对“省红总”方面提出的夺权动议。然而对他们来说很不幸的是，夺权行动并没有因为他们的反对半途而废。意识到自己有可能错失良机，“八二七”的两个头头张建山和葛忠龙临阵倒戈，支持夺权。

因为“八二七”和它的几个同盟组织从夺权行动中退出，所以他们在由28人组成的江苏赴京代表团中仅占3席。为表达不满，他们在南京掀起一轮宣传攻势，指责“一·二六夺权”反映的是少数造反派头头的政治野心，而非广大群众的意愿。支持夺权的造反派们随即对他们上纲上线，宣称“谁反对‘一·二六夺权’，谁就是反革命！”（《一·二六夺权就是好》，《新华日报》，1967年2月8日，第一版。另见《新华日报究竟是谁家的报纸》；《一·二六夺权前后》；《南京文化大革命大事记》，第45页）

周恩来和南京军区对“八二七”方面节外生枝心存不满，然而他们得到中央文革记者邢文举的支持。像邢文举这样的中央文革记者站派驻各地记者，其使命原本仅限于向中央汇报各地造反运动的开展情况。但事实上，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与当地群众组织建立了深厚的关系，并积极支持他们的造反活动。邢在南京便扮演了这样的角色：他起草了江苏夺权方案，并参与策动当地造反派夺权。他注意到“南大八二七”的组织规模大大超过了其校内竞争对手“南大红色造反派”。在1966年秋天，南大造反派学生组织1300多人前往首都控告南京地方当局所作所为时，公开打出的旗号是“南大八二七”。所以许多中央领导人一谈到南京的造反运动便会联想到这个名字（参见《中央首长在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上的讲话》，1966年10月6日，和《周恩来六六至六八年有关江苏省文化革命的部分讲话》，均刊载于《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不过“红色造反派”的头头文凤来是南京最著名的造反派领袖。他是南大最早起来批评工作队的少数师生之一。1966年8月他赴北京告状时，被康生指定为“革命教师”代表，在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的大会上登上天安门城楼，第二天《人民日报》的报道中还特别提到他的名字。因而在邢文举看来，新的权力机构应该包括文凤来（杰出的造反派领袖人物）、“八二七”（革命群众组织的楷模）、

以及高啸平（“革命干部”代表）和梁辑卿、杜方平、吴大胜（军队干部中的“左派”代表）（葛忠龙访谈。另见《一·二六夺权前后》）。

邢文举的看法与周恩来的组阁设想相左，导致他们之间关系的疏远。周恩来让南京军区而非中央文革记者邢文举组建江苏代表团就是一个明证。邢文举对“八二七”头头曾邦元和与“八二七”关系密切的省委“造反”干部高啸平被排斥在江苏代表团之外非常恼火。他没有随同按照周恩来意图组建的“江苏代表团”赴京汇报夺权情况、商议组阁方案，而是帮助曾邦元和高啸平组织了一个“江苏控告团”赴京反对夺权。

“江苏控告团”于2月10日抵京后，周恩来起初拒绝接见他们。他们不得不自己寻找住宿的地方，在全国总工会办公大楼里打地铺（曾邦元访谈。葛忠龙访谈）。不过中央文革对他们的到来表示欢迎，安排他们到北京航空学院招待所住宿（曾邦元访谈）。江青和康生还在钓鱼台秘密接见了南京左派干部高啸平（邢文举《为“中央文革”做记者的日子》（上）。按照邢文举的回忆，高啸平在受到接见时，向中央文革领导人转交了南京造反派从省公安厅档案中发现的两封匿名信。据称这两封匿名信的内容显示，江渭清文革前曾与刘少奇和周恩来暗中勾结，企图谋害林彪。中央文革随即指派高啸平组织一个专案组秘密调查此事）。得知这个情况后，周恩来立即与“控告团”取得联系，让他们搬到更为舒适的居所——京西宾馆（曾邦元访谈。另见《回忆周总理对八二七的支持和鼓舞》，《八二七战报》，1968年1月14日，第一版）。

深谙权变之道的周恩来最终同意“控告团”成员参加谈判会议（曾邦元访谈。另见《“地下省委”复辟记》）。出乎他预料的是，“控告团”绝大多数成员立即表态支持江渭清复出的方案（《谭震林是破坏江苏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控告团”需要得到中央高层的支持，只要他们的竞争对手不在新的权力机构中掌握实权，他们愿意接受任何解决方案。然而激进干部高啸平反对江渭清复出。他已经接受中央文革的指派，秘密调查江渭清涉嫌一项派性谋杀阴谋的指控。更重要的是，高啸平知道一旦江渭清重新掌权，他必定会遭到打击报复。周恩来对高啸平非常恼火。他强调高的职位太低不能代表省委领导层。他还明确责令高脱离“控告团”返回南京（曾邦元访谈。周恩来可能已经知道高啸平与中央文革的幕后来往。据一份史料记载，周在2月22日的会议上说：“高啸平历史很复杂”，“这个人不好”，“对我的话添油加醋”。他还说：“我不主张第二次夺权，照高啸平的主张，很想再夺一次！”详见葛忠龙《高啸平是怎样在江苏复辟资本主义的？——在南大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斗争反革命两面派高啸平大会上的发言》，《江苏红卫兵》，1968年6月25日，第四版）。

## 中央文革的动作

周恩来扶植江渭清复出以稳定江苏局势的努力，很快便因中央领导层的内部冲突而搁浅。2月16日，著名的“怀仁堂事件”发生——这个事件是随后反击“二月逆流”运动的前奏。在当天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谭震林、陈毅和徐



向前因不满中央文革成员攻击老干部，与之发生激烈对抗。毛认定这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攻击，于19日在他的住所召集政治局会议，责令谭、陈、徐三人停职反省。谭震林拒绝反省自己的错误，还在激愤之下致信林彪，表示要与中央文革那帮激进分子斗争到底，即使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毛泽东更加震怒，指示周恩来召集一系列政治局会议批判谭震林。这些会议始于2月25日，导致周恩来稳定江苏努力的失败（《周恩来年谱》，下卷，第129页。围绕“二月逆流”的斗争，显然影响到毛泽东对江渭清复出一事的态度。毛对江一直十分信任，在1966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还曾亲自向他面授机宜。“二月逆流”发生后，毛同意公开批判江渭清，但他多次拒绝江苏造反派把江揪回南京批斗的请求。参见江渭清：《七十年征程》，第526-528页和第548-549页）。

谭震林协助周恩来处理江苏问题，积极支持江渭清复出。在革命战争年代和1950年代初期，江渭清曾在谭震林领导下工作（谭震林和江渭清都是湖南人，都在1920年代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新四军时期，谭成为江的顶头上司。1950年代初谭任中共华东局书记处书记时，江任江苏省委书记）。谭震林遭到贬斥后，中央文革不但否决了江渭清复出的方案，而且试图借助这个事件扳倒周恩来。2月25日，江青和康生将江苏省委第二书记陈光召到钓鱼台。他们告诉陈光，他们正在调查江渭清复出的幕后主使。陈光为了保护周恩来，把责任全部推到谭震林头上。据说康生很生气。他指着陈光的鼻子大声呵斥道：“你陈光，不光明磊落！”（葛忠龙访谈）高啸平告诉其他“控告团”成员，谭震林犯了严重错误，“控告团”应该将谭在北京谈判期间的所作所为写个材料，上报中央文革（曾邦元访谈。“控告团”后来确实上报了一份材料。详见《给中央文革的一封信——江苏革命造反派赴京控告团控告谭震林》，《东方红战报》，1967年6月21日，第一版）。3月2日，中央文革成员接见原“江苏代表团”成员，透露了一个新的决定。他们说江渭清已经被打倒，希望代表团在原省委领导干部中推荐一位“革命干部”担任新的“三结合”权力机构一把手。王力暗示代表团提名他们的对手高啸平，但是没有得到积极回应（《中央文革小组接见江苏代表团的谈话》，1967年3月2日，刊载于《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 僵局：江苏军管

当两派代表在北京谈判期间，南京的局势逐渐失控。造反派组织之间的武力冲突不断加剧，双方都想通过武斗削弱对方实力，从而对北京谈判施加影响（《南京文化大革命大事记》第45-49页记载了2月8日至3月1日间的八次暴力冲突事件）。许多其他省份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周恩来迫于形势，自2月26日起连续召集军队高级干部会议。这些会议提出了处理各省夺权问题的新办法。在3月份出台的一份文件中，中央高度赞扬了各地的群众造反运动，同时对造反派之间的分裂和对抗提出严厉批评——指出“走资派”利用造反派的分裂对抗搞“假夺权”，挑起武斗事件，使得各地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遭受严重破坏。因而，中央决定派出军队“支左”，并在一些地方实施军管。今后各地夺权要采取“三

步走”的办法，即首先将权力全部集中到军队手里；其后由军队将权力移交给由群众组织代表、军队干部代表和地方干部代表组成的“三结合”过渡权力机构；最后通过巴黎公社式的选举产生永久性的革命权力机构（《军级以上干部会议精神传达》，1967年3月，刊载于《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江苏于3月5日被置于军管之下。当天，周恩来和康生联袂接见江苏代表团和江苏控告团全体成员，宣布中央将与南京军区进一步商讨新的权力机构组成办法（《中央首长接见江苏赴京代表团的讲话》，1967年3月5日，刊载于《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两派代表除了表示支持中央决定之外没有其他选择。历时近一个月的谈判到此结束。

3月10日，江苏省军管会宣告成立，南京军区政委杜平被任命为省军管会主任。“夺权委员会”被勒令解散（《南京文化大革命大事记》，第51页）。当地公安机关和报纸电台被军队接管。工厂、车站、码头、邮局等单位也派驻了军代表。造反派头头们被组织起来办学习班，批判检讨自己的错误（《南京文化大革命大事记》，第49-50页。另见《周恩来年谱》，下卷，第134页）。

## 结论

南京夺权的失败，有助于大大深化我们对各省派性政治的认知。需要首先指出的是，在周恩来介入之前，南京的造反派们并未想到过夺权。大量访谈资料显示，造反派们觉得一旦他们从先前打击迫害他们的地方当局那里获得平反和道歉，摘掉了对他们不利的政治标签，他们的主要目标便实现了。他们努力寻求的，是证明其先前反抗行为的正当性，而非对现行政治体制进行激进变革。夺权是北京的主意。

其次，是导致1967年造反派分裂的因素。夺权问题上的公开对抗源自1966年下半年两大造反派联盟之间的微妙竞争。当“八二七”因反对其竞争对手的主导地位而宣布退出夺权行动时，他们突然面临被边缘化的处境。他们其实并不反对夺权，他们所反对的是其在夺权行动中被赋予的从属地位。在他们因否定夺权而被视为“反革命”遭受打压时，他们全力以赴进行抵抗，正如他们先前抵抗南京地方当局强加给他们的罪名一样。他们显然不愿意在获得当局的平反和道歉之后，再被昔日的盟友贴上同样的标签、施以同样的压迫。造反派阵营内部的分裂与他们1966年12月间同捍卫省市的“保守派”组织的斗争存在根本性的差异。我们无法将这种新的派性分野中的一方或另一方界定为“激进派”或“温和派”。这些标签在南京语境中变得毫无意义。由周恩来策动的夺权行动是“激进的”还是“保守的”？造反派是否知道周恩来打算让江渭清复出？反对夺权的造反派是应该被归类于“激进派”——因为他们反对重建秩序？还是应该被归类于“温和派”——因为他们赞成周恩来扶植江渭清复出的计划？处于对立状态的造反派组织出于策略考虑而频繁地变换各自的立场，使得我们无法给其中任何一方贴上那些政治标签。然而他们之间的分野却是真实的和易于感知的。

第三，是关于南京夺权失败的原因。南京的夺权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北京高

层无法在选择哪一位高级领导干部出任新政权“一把手”的问题上达成共识。周恩来和中央文革都无意让一位造反派头头领导新的地方权力机构——这无疑反映了毛泽东的个人看法。周恩来希望江渭清复出，而中央文革则属意于高啸平。周恩来显然十分讨厌高，并且认为他的行政级别不够，而实施夺权的造反派们则将高看作自己的对手。反过来，中央文革无法容忍江渭清的复职，利用谭震林的落马挫败了周恩来的努力。然而他们却无法让代表团——或者，显而易见的，让毛泽东——认同高啸平。在这样的僵持中，南京的暴力冲突不断升级。唯一的权宜之计是将江苏置于军管之下——实际上是将新政权的组建无限期地搁置起来。此举虽然暂时遏制了派性武斗，却无法实现长治久安——当军方的权威在 1967 年的一系列事件中遭受破坏之后，当地的派性武斗死灰复燃。

最后，让我们回到文章开头提出的问题——1967 和 1968 年困扰中国的群众派性冲突是否可以被准确无误地界定为“保守派”和“激进派”之间的斗争？至少南京的情况不是这样。造反派阵营内部两股势力的分歧直到夺权前夕才公开爆发出来。而且 2 月中旬的北京谈判似乎正朝着解决分歧的目标迈进。归根结底，他们之间的分歧在于如何摆平两派在新的权力架构中的相互关系，而不是对中国政治和社会制度的不同主张。两派都同意江渭清出任革命委员会一把手，尽管其中一方并非心甘情愿。而且双方都不反对军管。只有省委干部高啸平竭力反对周恩来的计划，并得到中央文革的支持——他们将周恩来的努力视为一种赤裸裸的资本主义复辟企图。当周恩来的计划因谭震林的清洗而遭受挫败之后，毛和周转而采取一种牵制策略——即实施军管。

然而，让军队置身于悬而未决的派性斗争之中，后果是十分严重的。

---

【史林一叶】

## “军管”时期的南京

董国强、Andrew G. Walder

按：本文译自英文，原标题为 Local Politics in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Nanjingian Under Military Control，刊载于英国剑桥大学主办之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70, No. 2, May 2011。

1967 至 1968 年间中国各地旷日持久的群众派性冲突，长期以来被理解为在现存政治/特权模式中具有相反利益诉求的保守派和激进派势力之间支持还是反对“军管”措施的斗争。这项关于南京——一个饱受群众派性冲突困扰的重要省会城市——的个案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解释：地方群众派性冲突之所以旷日持久，正是因为冲突的双方无法被简单地界定为所谓“保守派”或“激进派”。派性界限的含混不清，使得那些中央政府官员、地方军管当局、甚至毛泽东本人无从下手解决派性冲突。更重要的是，中央官员、当地驻军和地方党政干部这三大群体内部也存在派性分裂和对抗。这无疑导致地方群众派性斗争的激化和蔓延。



为了赢得中央领导层的支持，地方上的群众派性组织竞相采取机会主义的策略，频繁地变换自己的政治立场，并竭力将他们的对手描绘为反动的“保守派”——然而这样的指控其实都是无稽之谈。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尤其是开头两年导致中国政治和社会秩序严重失控的群众派性冲突——是现当代中国历史上一个令人痛苦然而却又十分重要的事件。在文革刚刚结束的时候，以及此后的近十年间，这一事件曾经受到许多国外社会科学家的广泛关注。他们纷纷对此加以记载与分析，还尝试使用一些结构性术语去界定与诠释群众派性冲突。然而到了“后毛”时期，中国大陆发生的日新月异的变化引起国外学界的高度关注，对那些陈年旧事的学术兴趣因而迅速淡出——甚或被完全遗忘。在中国国内，相关的学术研究直到“后毛”时期才开始兴起。然而由于政治敏感性等因素的存在，这样的学术研究并不为学界同仁和有关各方普遍看好。而且，除了个别例外，中国的历史学家们在其研究过程中很少关注早期西方相关论著提出的一些社会科学命题。另一方面，尽管近年来许多相关史料大量涌现，外国学者们对于反思早期西方论著中有关这些政治事件的结构性的诠释似乎兴趣不大。因而，尽管“红卫兵”和文革政治迫害等话题近些年来在回忆录、文学作品和电影纪录片中受到热炒，然而相关的学术研究却并未因各种史料的大量涌现而取得应有的进展。我们对北京和上海以外的文革运动情况依然知之甚少。

这篇论文是两位长期致力于文革时期中国政治研究的学者竭诚合作的产物——其中一位是来自中国大陆的历史学家，另一位是来自美国的社会科学家。我们之所以会进行合作研究，是因为我们两人都很关注北京和上海这两大中国著名都市以外广大地区长期政治冲突的性质和人们卷入政治冲突的动机。在1967年初北京和上海的政治秩序得以恢复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群众派性冲突在全国范围内猛烈爆发，并一直持续到1968年。我们的目的在于探讨这些地方性暴力冲突中的政治因素，并依据大量新发现的史料对一些貌似正确的早期解释进行反思。

尽管1967年初采取了“军管”措施，但在此后的两年间，北京和上海以外的绝大多数省份都经历了显而易见的政治动荡和统治危机。从一开始，一些西方论著便将这些地方性斗争描述为那些在现行政治体制中受到偏爱的“保守派”和那些在现行体制中受到压制的“激进派”之间的社会冲突。按照这种解释，地方性的群众派性冲突之所以长期得不到控制，是因为派性组织表象背后所隐藏的不同社会利益诉求难以调和。其次，因为军方的作用在于重建秩序，所以它往往被视为一种天生的保守势力，而与军方结成联盟的地方群众组织则被武断地界定为“保守派”(LEE, Hong Yung, 1978, *The Politics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A Case Stud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近年来，有些学者质疑那个时期的群众派性阵营能否被界定为“保守派”和“激进派”——即两派的分野是否基于对现行政治体制的不同态度。徐友渔曾指出，1967年间许多地区的斗争事实上存在于相互竞争的激进团体之间，而这些

激进团体曾在先前反对地方当局的斗争中团结一致。他强调，所谓“社会冲突”解释体系混淆了两类矛盾：其一是1966年下半年地方党政机构的捍卫者和反对者之间的对立与冲突；其二是随之而来的获胜的造反派阵营内部的分裂与对抗。除了质疑各地的派性组织是否存在截然不同的政治导向外，他还质疑这些派性组织是否代表不同的社会利益群体。另外一些新的论著没有就西方流行的理论概念展开讨论，但其对各省派性冲突的概述在很大程度上支持徐友渔的看法（卜伟华《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中国国内近年公开出版的一些论著也对军队的角色提出了不同的看法，然而这些看法常常自相矛盾：一方面，它们赞扬军队遏制派性武斗、恢复地方经济的努力，另一方面，它们又批评军方犯了“左”的错误——如激化派性暴力和粗暴对待地方干部与群众（邓礼峰《“三支两军”述论》，《当代中国史研究》，第六期，第39-52页，2001；李可、郝生章《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解放军》，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236-248页，1989；刘随清《“三支两军”的初衷及其两重性》，《中共党史研究》，第5期，第90-95页，2006；杨德山《试析“三支两军”兴起的原因》，《中共党史研究》，第6期，第57-64页，2005；赵国勤《关于“三支两军”主客观作用及事物属性辨析》，《长白学刊》，第5期，第76-79页，1994）。

要对“社会冲突”概念主导下的文革派性冲突解释体系做出批评，就必然涉及到一系列问题——如群众派性组织的社会构成，如卷入派性冲突的人们如何在复杂多变的语境下做出政治抉择，如学校、工厂内部的派性冲突与省市一级派性冲突的相互关系，如各省派性冲突的结构性差异等等。对上述问题的详尽阐释，显然不是一篇论文的篇幅可以涵盖的。因而我们在这篇论文中将集中讨论上述重大问题中的一个方面——即地区性的派性冲突是否真的存在于对现存政治体制持不同看法的群众派别之间。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就必须重新解释为什么这些派性斗争会如此激烈且旷日持久。

本文所提供的是一种基于历史学理论与方法的诠释。它需要更加深入地考察省市一级群众派性冲突的发展嬗变。而本文所依据的各种史料，在社会冲突解释体系被建构起来的时候根本没有可能获得。概而言之，在江苏省会城市南京，由当地造反派发起的群众夺权遭遇失败。中央高层拒绝承认夺权行动，并进而将江苏置于“军管”之下。该地区在随后的两年中经历了长期而激烈的派性冲突。这种情况与毗邻该省的上海市截然不同——上海在1月份宣布夺权后，立即获得中央的承认，并且实现了地方党政官员与地方武装力量的联合，因而夺权成果很快得到巩固。

尽管南京是我们感兴趣的遭受派性问题困扰的众多地区之一，然而我们无意断言这里发生的故事在全国其他类似的外省城市中具有特殊的代表性和典型性。我们重点考察南京基于一个很简单的理由——第一作者董国强作为南京大学（南京造反派运动的发源地）的学生和教师，在当地学习、工作和生活了二十多年。他有条件大量接触地方历史文献，并与许多文革时期的群众派性组织头头和其他政治人物进行访谈。这些信息来源使得我们关于地方政治问题的论述深度，大大超

过那些已经公开发表的论著。

### 1967年初南京派性营垒

在1967年3月5日中央宣布江苏实施“军管”之时，当地的群众派性冲突早已不是存在于地方党政机构的捍卫者和反对者之间了。捍卫旧省委的“保守派”联盟组织在1月初北京公开赞誉上海夺权行动后立即土崩瓦解。此后南京的造反派们因“一·二六夺权”而发生分裂。出于对“夺权委员会”人员构成的意见分歧，一些造反派组织宣布退出夺权行动，而其他造反派组织则在前者未参加的情况下继续实施夺权。此后造反派们分裂为两派：参加夺权的一派被称为“好派”——他们认为“‘一·二六夺权’好得很！”；与之对立的一派被称为“屁派”——他们认为“‘一·二六夺权’好个屁！”。

鉴于造反派阵营的公开分裂，北京拒绝承认这次夺权行动。两派遂于2月初派出代表团前往北京，与周恩来和其他中央领导人举行谈判。周恩来打算让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复出，担任新的过渡性权力机构负责人，但遭到中央文革中的“毛派”激进领导人的阻挠。当北京谈判陷入僵局的时候，南京街头的暴力冲突不断升级。最后北京裁决南京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同时宣布对江苏实施“军管”。

当军队奉命介入“支左”的时候，南京各派政治势力的分化不断加深。造反派不但分成“好派”和“屁派”，而且“好派”内部也发生内讧。夺权后不久，属于“好派”阵营的工人造反派联盟组织“江苏省工总”即发生裂变。该组织起初由市政建筑公司、码头货运公司和人力三轮车行业协会的工人造反派领导。但中央文革认为来自大型工矿企业的产业工人代表应该接管权力。于是“省工总”于1月28日宣布改组（耿昌贤访谈；南京市档案馆《南京文化大革命大事记（初稿）》，1985，第40页；《我们为什么要彻底改组“江苏省工人红色造反总司令部”——革命造反派工人答群众问》，《农奴戟》1967年2月8日，第三版；《彻底粉碎原工总执行的反革命经济主义》，《红色工人》1967年3月1日，第二至三版）。“新工总”领导人上台后表示继续支持“好派”。而“老工总”领导人反对这次改组，遂带领其拥护者加入“屁派”。

类似的内讧也出现于省级机关造反派中。在“一·二六夺权”发生时，省级机关只有“省革总”一个造反派组织，其成员主要包括党政机构各处室中的中下层干部和一般工作人员，其头头是省电信局的一位副处长。该组织积极支持夺权。然而在中央宣布江苏“军管”后不久，一个新的支持“屁派”的机关干部造反派组织“省级机关革命造反大联合总部”宣告成立（南京市档案馆1985，第50页）。与此同时，把持省级机关大权的“省革总”因延误传达一份重要的中央文件受到反对派指责，其头头们为推卸责任发生公开争吵，促使该组织二号头目倒戈加入“屁派”（陈其玠《关于“中央特急电报”的情况》，《东方红战报》1967年3月4日，第一版，《陈其玠严正声明》，同上，1967年4月30日，第二版；《江苏省级机关革命造反新总部在斗争中诞生》，《南京八二七》1967年5月4

日，第三版)。

上述分裂的发生，使我们无法再将群众派性组织界定为“保守派”或“激进派”。旧的标签变得毫无意义。起初联合起来反对南京地方当局的造反派联盟组织现在分裂为“好”、“屁”两派；起初团结一致实施夺权的“好派”组织再次发生裂变，一部分“好派”成员倒向“屁派”一边。两派的政治争端主要涉及新权力机构的领导权分享问题。此外，“好派”方面认为应该立即实施夺权，然后再想办法解决造反派组织内部的意见分歧。“屁派”方面则强调应该首先实现各造反派组织的联合，然后才能实施夺权。这种存在于社会构成十分相似的群众派性组织之间的细小政治分歧，在此后数月中不断扩大，最终导致旷日持久的暴力冲突。那么究竟通过怎样的过程，昔日的盟友才变成不共戴天的仇敌？

我们需要解释，起初细小的分歧如何逐渐激化并最终导致暴力对抗。我们认为答案不是基于群众派性组织的固有特征或他们早先的政治立场，而是因为两派群众被拖入了中央领导人之间的策略性纷争。中央领导人在如何应对群众运动的问题上存在不同主张，而毛泽东选择放任地方武斗事件的发生。北京的操纵加剧了地方冲突，并使之转化为一场北京不同派别代理人之间的战争。地方参与者们被动地置身于一场代价高昂的冲突，然而他们一开始对自己将要付出的代价一无所知，事后也无法理解为什么自己要付出如此惨重的代价。

### 地方高级干部和所谓“干部问题”

实施“军管”是重建地方政权的一个重要步骤，而且北京敕令地方政权重建必须结合“革命的领导干部”。这无疑大大改善了干部们的政治处境。在江苏，除了三位已经被中央点名批判的省委书记处成员，其他所有省委干部都有被结合的可能。他们为了在动乱中求生存，当然都不愿意放过积极表现的机会。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北京的敕令同时促使敌对的两派竭力攻击对方选定的“革命干部”。事实上，一方面，两派在3、4月份都宣称要“解放干部”，竞相拉拢那些有可能被结合的高级干部，旨在增强本派在未来新权力结构中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一旦某些干部表态支持某派，另一派就会立即给他们扣上“反革命”的帽子，同时指责其对手为“保守派”（《坚决执行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八三战报》1967年3月3日，第四版；《南大八二七革命串联会关于干部问题的声明》，《八二七战报》1967年3月6日，第二版；《欢迎一切愿意革命的领导干部站出来》，《东方红快报》1967年3月4日，第一版；《革命的领导干部赶快亮相》，《农奴戟》1967年3月8日，第二版）。

早在“一·二六夺权”之前，一些厅局级干部为了与遭受攻击的省委领导拉开距离，宣布成立造反组织“江苏省革命造反串联会”。由于这批人年龄较大、职位较高，所以人们都称之为“老年串联会”，简称“老串会”（《“地下省委”复辟记》，《工人造反报》1968年1月21日，第二至四版；《砸烂反革命黑手集团“老人串联会”》，《革命工人报》1968年8月16日，第四版）。他们起初试图在造反派和省委领导人之间沟通斡旋。然而当夺权成为大势所趋的时候，他们加入

夺权并站在“好派”一边。军方接管权力后宣布解散“老串会”，但这批干部依然与“好派”保持着联系。4、5月间，两位省委书记处成员——李士英和陈扬——和其他52位厅局级干部在“好派”召集的“解放干部”大会上公开“亮相”，另有100多位厅局级干部随后跟进（同上）。

“屁派”也想拉拢高级干部。但是他们当初反对夺权，使得他们与许多支持夺权的领导干部产生龃龉。在2月份北京谈判期间，站在“屁派”一边的高级干部只有省委统战部长高啸平一人。更糟糕的是，在北京谈判结束前夕，“屁派”曾向中央文革提交一份报告，指控“好派”为“改良主义者”，其理由恰恰是“好派”结合了许多高级干部（《给中央文革小组的一封信——江苏革命造反派赴京控告团控诉谭震林》，《东方红战报》1967年6月21日，第一版）。这样的修辞策略直接威胁到老干部们，他们当然不会对“屁派”抱有好感。

既然在干部争夺中处于不利地位，“屁派”便对站在“好派”一边的干部们发起攻击。他们组织群众大会批斗李士英和陈扬，指责他们是江苏“资反路线”的代理人，试图以此恐吓其他干部脱离“好派”阵营。5月下旬，他们又对若干高级干部实施抄家，并用抄家所得材料“揭露”旧省委干部们的“复辟阴谋”（《触目惊心的资本主义复辟阴谋——公布5·27革命行动的第一批战利品》，《东方红战报》1967年6月9日，第三版）。6月，他们又声称掌握了李士英解放前被捕叛变的证据（《关于李士英被捕叛变问题调查报告（第一号）》，《八二七战报》1967年6月9日，第三版；《关于李士英叛变自首罪行的调查报告》，《南京工人》1967年6月24日，第二版）。

当地军方对上述指控都信以为真。5月上旬，“屁派”群众挟持李士英前往省军管会告状，抱怨“好派”方面藏匿省委干部，帮助他们逃避群众的批判与审查。省军管会副主任吴大胜批评了“好派”召集的“解放干部”大会，并告诉“屁派”可以根据群众意见处置李士英等人（《“地下省委”复辟记》）。

“屁派”方面对干部群体的攻击并不意味着他们反对现行政治体制。这不过是为了抵消“好派”在干部争夺战中的优势而采取的一种策略。然而这种策略带来的一个后果，是驱使省委干部们更加坚定地投入“好派”的怀抱。与此同时，军方的反应又在地方干部群体与军队之间造成裂隙。到1967年春末，地方干部们逐渐与“好派”形成联盟，而军方则日益倒向“屁派”一边。原先在造反派派性争斗中处于中立地位的党政干部群体和军队干部群体——他们是现行体制的两大支柱——现在被阴错阳差地拖入两个相反的阵营。

### 南京军区内部的分裂

军队本身也发生分化。在中央军委正式授权军队整治那些桀骜不驯的群众派性组织之后不久，南京军方取缔了十几个隶属于“好派”的顽固群众组织（卜伟华《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第445-463页）。在这次“三月镇反”中，数百名造反派头头遭到监禁，军方还指使公安机关整了这些人的“黑材料”（《坚决镇压反革命——取缔反革命组织小

统计》，《八二七战报》1967年3月25日，第四版；耿昌贤访谈；葛忠龙访谈；李文卿《近看许世友，1967-1985》，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第29-30页）。

“好派”之所以成为打击目标，是因为他们当中的许多人认为“军管”措施否定了他们的夺权行动。与此同时，他们当时控制着许多重要的交通运输部门和单位，并在军队前来接管时进行了抵抗。此外，军方的立场还受到周恩来的影响。在中央宣布江苏“军管”后，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曾请示周恩来：谁是江苏的“革命左派”？周恩来让他去请教南京“屁派”著名头头曾邦元。另一方面，周恩来又告诉曾邦元：许世友是“毛主席麾下的一员战将，对主席无限热爱、绝对忠诚”（曾邦元访谈）。周恩来对曾邦元有所偏爱，是因为曾邦元在2月份北京谈判期间积极支持周提出的妥协方案。

周恩来的态度还影响到许世友的夫人田普——江苏省委办公厅的一位副处长。她于3月8日加入了新成立的支持“屁派”的干部造反组织“省级机关革命造反大联合总部”。许世友还于4月2日在家中接待了“屁派”的头头们。“好”、“屁”两派都将此视为许世友倾向“屁派”的表征。作为回报，“屁派”方面在“三月镇反”期间及以后多次发表文章赞颂军队（《坚决镇压反革命——取缔反革命组织小统计》；《许世友与曾邦元等的讲话》，《打倒江渭清》，1968年8月15日，第三版；《坚决树立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绝对权威》，《东方红战报》1967年3月19日，第一版）。军方的显而易见的倾向性很快成为当地政治中的一大问题。

许世友对“屁派”的偏爱在省军管会内部引发了一些不满，军管会副主任杜方平的不满尤其强烈。杜方平很早就表态支持南京的造反派，并深深地卷入了“一·二六夺权”事件。军管实施后不久，杜方平等人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大谈军队在“支左”中的作用（梁辑卿、杜方平、吴大胜《我们是如何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红旗》，1967年第5期，第39-43页）。这篇文章的幕后推手是中央文革重要成员、《红旗》杂志副主编林杰（耿昌贤访谈；《杜方平，你和林杰有什么关系？》，《南京工人》，1968年2月14日，第四版；《杜方平与林杰的黑关系》，《东方红战报》，1968年2月19日，第二版）。

人们事后才知道，杜方平和林杰的关系源远流长。1950年代杜方平在浙江省军区政治部任职期间，林杰是他的部下。后来在杜方平的大力举荐下，林杰作为“调干生”进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学习（耿昌贤访谈；《派报后台杜方平，就是应该批判》，《六一三战报》，1967年11月16日，第二至三版）。文化大革命爆发的时候，杜方平和林杰重新取得联系。此时林杰早已投靠康生和陈伯达，成为中央文革的一员。在2月份北京谈判期间，杜方平和林杰接触频繁。杜方平对周恩来最终裁定南京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极为恼火，而林杰和中央文革对此颇有同感。在杜方平看来，只有实施夺权的“好派”才是真正的革命左派。他强调“屁派”必须首先接受这个事实，然后才有可能被认同和接纳（《杜方平在京学习会上检讨摘录》，《江苏工人》，1968年3月15日，第一至四版）。

许世友对“屁派”的明显偏爱使杜方平深感意外与担忧。4月初，中央军委



颁布禁止军队镇压群众组织的“十条命令”后，“好派”势力发生强劲反弹，杜方平的言论也日趋激烈。他在4月至6月间多次公开谈到北京谈判，披露了他与周恩来在“一·二六夺权”问题上的冲突（《杜方平的检查》，《东方红战报》[南京]，1967年12月4日，第二版；《杜方平同志在江苏红总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摘要）》，《东方红战报》[扬州]，1967年6月14日，第三至四版）。他坚持认为南京两派的斗争是“革命派”与“保守派”的斗争，因而强调联合便是放弃政治原则。他还指责“三月镇反”削弱了革命左派的力量、加强了改良主义者的势力（《杜方平的检查》；《“地下省委”复辟记》；《杜方平同志就是坚定的革命左派》，《井冈山》[南京]，1967年11月15日，第二版；《揭“联指顾问组”黑幕》，《南京八二七》，1968年8月2日，第一版；《杜方平，你和林杰有什么关系？》）。然而有点自相矛盾的是，他指控“屁派”是“保守派”，其主要理由竟然是他们反对解放老干部（《杜方平在京学习会上检讨摘录》）。

南京军区领导层多次对杜方平提出批评。杜方平不但没有丝毫悔改，还将军管会内部的分歧透露给“好派”。他还通过何朴向林杰和康生争取支持。何朴是中国科技大学的一名教师，曾在4至6月间作为中央文革秘密特使四次前往南京活动（《杜方平在何朴事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东方红战报》，1968年2月19日，第二版）。“好派”方面也发起一轮宣传攻势捍卫杜方平和他的军中盟友，声称他们是军队内部正确路线的代表。

### 军方权威的崩溃

军队由此深深地卷入派性斗争，其领导层也发生分裂。4月初，南京大学的一个“好派”组织贴出系列大字报挑战军方。该组织的头头是数学系高年级学生万金华。在2月份北京谈判期间，杜方平曾指派万金华去见林杰。此后万金华便成为林杰和杜方平之间的非正式联络人。4月初何朴第一次来南京时，万金华也与他有过会晤（《杜方平与林杰的黑关系》，《东方红战报》，1968年2月19日，第二版；《派报后台杜方平，就是应该批判》；《杜方平，你和林杰有什么关系？》）。挑战军方的大字报是这些幕后接触的产物。

万金华等人在大字报中质疑军队在全国各地的作用，指责他们镇压革命势力、支持保守派。他们还断言军管措施实际上错误地否定了南京的群众夺权，而且“某些人”正试图把斗争矛头转向南京军区内部的“正确路线”。他们还大肆嘲讽邢文举和高啸平——邢文举是中央文革派驻南京的记者。他先是帮助造反派组织夺权，而后又成为“屁派”的有力支持者。高啸平是站在“屁派”一边的地方高级干部。他们被万金华等人称为“阴谋否定群众夺权的反革命分子”。“屁派”方面随即发起反击，称这些“反动的”大字报是对“伟大的人民解放军”的恶毒攻击。南京军方的反应倒是很温和：他们仅仅恳求“好派”头头对那些批评者加以劝阻（《剥开南大红色造反队“心中想念毛主席”战斗队的画皮》，《东方红战报》，1967年5月17日，第三版）。中央文革则将他们的代理人邢文举调往上海，另派一位年轻的《解放军报》记者长驻南京（邢文举口述、杨民青整理《为中央



文革做记者的日子（下）》，《老照片》第60辑，2008，第1页；邢文举访谈；袁刚《风雨八年》，南京：自印本，2008，第68页）。

军方的软弱反应和邢文举的调离使“好派”大受鼓舞，暴力冲突不断蔓延。在4月19日至5月13日间，南京至少发生了七起严重的暴力对抗（南京市档案馆《南京文化大革命大事记（初稿）》，1985，第54-58页）。从5月14日到24日，当地暴力对抗达到37起以上。从5月24日到6月中旬，南京城内平均每天发生街头武斗18起（《情况通报》，《八二七战报》，1967年6月26日，第五至八版）。5月27日，南京林业学校的“屁派”头头死于一起校内武斗事件。6月27日，南京机电学校的教学大楼在一次大规模武斗事件中遭到焚毁。军管会似乎处于瘫痪状态。他们在没有接到中央军委或中央文革直接命令的情况下，拒绝采取任何行动（《中央文革来电》，《东方红战报》1967年7月8日，第一版；《张春桥接见南京地区三派赴京代表团时的讲话》，1967年7月12日）。

军队权威的崩溃可以从“好派”对军管会直接控制之下的公安机关的频繁攻击中略见一斑。“好派”方面一再要求释放“三月镇反”期间被捕的所有人员，并清除他们的“犯罪”记录。6月初，“好派”开始袭击公安机关，查抄军方整理的“黑材料”，释放他们的战友。6月2日，一个遭到取缔的铁路系统“好派”工人组织动员数百群众前往南京铁路局公安处抗议示威，并冲进公安处大楼捣毁了一个旨在颂扬“三月镇反”成果的展览。在6月17日一次类似的行动中，数百名造反派在另一处公安机关门前示威。当他们试图武力进入该机关时，一场武斗爆发了。后因周恩来打来电话制止，进攻者们才撤离现场。一次规模更大的围攻省公安厅的行动发生于6月21日。数百名造反派冲进公安厅办公大楼搜查“黑材料”。在“屁派”动员1000多人赶赴现场后，“好派”成员才带着大批档案材料和两名俘虏撤出大楼。然而在6月24日，“好派”召集3000多群众再次前往省公安厅。在随后发生的冲突中，他们打伤了该机构军管小组负责人。军管会多次发布命令禁止此类行为，但是造反派们根本不予理睬（《南京文化大革命大事记（初稿）》，第68-69页）。

双方都意识到只有中央介入干预，当地的冲突才能得到解决。军管会遂于7月底怂恿“屁派”派出一个代表团赴北京，控告“好派”及其盟友杜方平的“罪行”。许世友的妻子田普是代表团头头之一。作为应对，杜方平和“好派”也向北京派出了他们自己的代表团（葛忠龙访谈）。

### “武汉事件”之前的中央干预

当时负责监管南京的中央官员是张春桥。他是中央文革的主要成员之一，曾参与策动后来得到毛泽东赞许的上海夺权行动，现在是上海市革委会一把手。5月初，他又被任命为南京军区第一政委。毛泽东指示他“关心一下”江苏的局势（《张春桥、姚文元、杜平对江苏和南京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讲话》，1967年5月14日）。张春桥和他的副手姚文元领命来到南京，在当地逗留一周，并在5月14日召开的一个全市性群众大会上发表讲话。张春桥的讲话非常圆滑——他

只是空泛地号召有关各方提高觉悟，团结一致，向他们的共同敌人进攻。没有毛泽东的明确指示，张春桥不愿表明自己的立场。因而他的到来没有产生任何积极影响。在他停留期间，南京发生了4起大规模暴力冲突（《南京文化大革命大事记（初稿）》，第56-58页）。

张春桥在“五·一四讲话”中极力回避当地一些关键问题，使“好派”方面深感失望。他们原先估计张春桥会站在他们一边。他们没有意识到在上海夺权成功后，张春桥已经转而成为政治秩序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定拥护者。“好派”尤其不满张春桥在讲话中重弹“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的老调。在他们看来，这种折中论调起到了保护“屁派”、支持军管会的作用。因而，他们认为张春桥的讲话是一株“大毒草”（葛忠龙访谈）。

站在“好派”一边的高级干部们曾集体上书张春桥请求接见，但是张春桥没有理睬他们。这些干部对“五·一四讲话”中涉及“干部问题”的段落感到困惑与不安。张春桥的这段讲话其实不过是一堆语意含混、内容空洞的政治修辞，但是“屁派”方面却声称张的讲话支持他们在干部问题上的立场——即反对“好派”方面毫无原则地“一揽子”解放干部的做法。一位来自新华社江苏分社的“好派”头头向北京总社提交了一份“内参”，反映当地“好派”和干部们对张春桥讲话的批评意见。另一位鲁莽的“好派”头头甚至走得更远——他派人分赴全国各地收集证据，企图将张春桥打成“叛徒”和“历史反革命”（葛忠龙访谈；《反革命分子杜方平的黑关系》）。

7月12日，张春桥在北京接见两派代表团。“好派”代表团成员葛忠龙一上来就抱怨军方，并指出由许世友的妻子田普代表“屁派”是十分荒谬的。张春桥则将话题转到如何实现双方停火，并重复了其“五·一四讲话”中的许多折中论调。他拒绝明确答复两派代表提出的一些具体问题，同时他的某些言行又令人十分困惑。例如，一方面，他在谈话中批评南京军管当局在释放被捕人员的问题上拖拖拉拉，导致矛盾不断激化；另一方面，他又在会见结束时径直走向坐在后排的田普，首先与她握手告别，而把其他人晾在一边（葛忠龙访谈；《张春桥接见南京地区三派赴京代表团时的讲话》，1967年7月12日）。

张春桥模棱两可的立场，显示毛泽东还没有想好应该如何处理这些问题。毛当时关于南京问题的一些谈话看起来语义晦涩、漫不经心且杂乱无章。例如他在7月13日接见一些军队领导干部时说：

不要怕闹，闹得越大、越长，越好。七闹八闹，总会闹出名堂来的，可以闹清楚。不管怎么闹，不要怕，越怕鬼越来。但也不要开枪，什么时候开枪也是不好的。全国大闹不可能。那里有脓包，有细菌，总要爆发的。南京街上闹得很厉害，我越看越高兴。闹得第三派那么多人，反对内战，反对武斗，这很好嘛！（张春桥：有人讲第三派是走第三条道路的。）哪有什么第三条道路呀！人家要大联合，大批判，你要诱导嘛！（毛泽东《接见军队领导干部的谈话》，1967年7月13日。载《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基于毛和张春桥的上述态度，在南京两派武斗不断升级之时，当地驻军都按兵不动、袖手旁观。这与武汉的情况形成鲜明对照。在武汉，陈再道指挥的军队在对立的两派群众组织中公开支持一方，并用武力摧毁了挑战军方权威的另一方。

### “武汉事件”之后的激流勇进

“武汉事件”爆发后，南京“好派”直接将攻击矛头指向省军管会的后台老板许世友。在充满戏剧性的武汉事件中，公安部长谢富治和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向当地群众宣布，陈再道领导的武汉军区将一派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是错误的。然而在军方卵翼下变得十分强大的群众组织“百万雄师”不同意这个裁决。7月20日，一批支持“百万雄师”的军人绑架并囚禁了王力。后来在周恩来公开、直接的干预下，他们才获得释放。当时秘密驾临武汉、试图亲自调解当地派性冲突的毛泽东，因对当地驻军是否忠诚没有把握，不得不仓皇逃往上海。

上述事件被北京的中央高层视为公然的挑战。陈再道和他的助手们被押解到北京，受到企图发动兵变的指控。“百万雄师”则被定性为“保守派”组织勒令解散。7月27日，中央发出致武汉“革命群众”的一封公开信，表彰他们“英勇地打败了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极端狂妄的进攻”。在南京，杜方平等入于次日在《新华日报》头版发表文章支持中央的立场，号召打倒“军内走资派”（《杜方平的检查》；梁辑卿、杜方平、吴大胜《永远忠于毛主席，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新华日报》，1967年7月28日，第一版）。

中央的立场日趋激进。7月31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联合发表社论，公开号召各地民众“揪出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向革命的主要敌人猛烈开火》，《人民日报》，1967年7月31日，第一版）。同一天，由何朴率领的一个中央文革调查组抵达南京（《杜方平在何朴事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南京文化大革命大事记（初稿）》，第78页；《何朴与杜方平》，《星火燎原》1968年2月28日，第四版）。他们秘密会见杜方平，鼓励公开批判许世友。他们还向南京大学造反派和在南京活动的“清华井冈山”成员传达了相同的信息。其结果是一个呼吁打倒许世友的“紧急声明”公开发表。

在此前后，北京不断传来支持“倒许”的讯息。林杰在7月30日接见一个无锡造反派代表团时，直接将武汉和南京做了类比，还问当地是否有人贴出批判许世友的大字报。与此同时，在北京活动的“好派”头头葛忠龙也给南京打来电话说：林杰告诉他许世友可以批判。他还说：北京造反派头头蒯大富告诉他，中央支持杜方平。8月2日，何朴会见当地造反派头头，说许世友是南京的陈再道。

张春桥的调子现在也变了。他在北京召见蒯大富，告诉他许世友对毛主席不忠。蒯大富立即增派数百名“清华井冈山”成员到南京助推“倒许”运动。张春桥还让蒯大富转告葛忠龙，要他立即返回南京参加“倒许”斗争。张春桥还通过上海的红卫兵头头向南京“好派”打招呼，说“反许”运动是正确的（《南京文

化大革命大事记（初稿）》，第 79 页）

在北京的明确鼓励下，“好派”和他们的军方盟友杜方平等公开鼓动打倒许世友。他们还得到当地高级党政干部、江苏省军区领导人、南京空军领导人和九所驻宁军事院校领导人的支持（《惊心动魄的篡党、篡政、篡军反革命复辟图解》，《东方红战报》1968 年 5 月 8 日，第四版）。迫于各方压力，军管会释放了 3 月份被捕的所有造反派人员，并销毁了他们的案底。许世友意识到他所面临的危险，带着几个亲信逃往位于大别山中的秘密军事基地（李文卿《近看许世友，1967-1985》，第 46-52 页）。

不难理解的是，周恩来一直试图阻止反对许世友的运动。他在 8 月 11 日接见北京红卫兵头头时，警告他们不要因为出了一个陈再道，就对其他所有军队领导人都产生怀疑。第二天，他在接见南京“好派”代表团时又表达了相同的意见（《特急消息》，《八二七战报》1967 年 8 月 15 日，第二版；《派报后台杜方平，就是应该批判》，《中央首长对北京学生代表的讲话》，1967 年 8 月 11 日）。8 月中旬，周恩来以中央名义向南京派出一个调查组，调解当地不断升级蔓延的派性武斗（《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文革小组关于派遣调查组赴江苏通知》，1967 年 8 月 15 日；《南京文化大革命大事记（初稿）》，第 79-95 页）。

“反许”势力的后续行动表明，他们希望建立一个新的地方政权。在 8 月 12 日召开的有杜方平和“好派”头头们参加的会议上，一个“江苏省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宣告成立，以协调指挥各路“反许”人马的行动。“联指”下设的“参谋部”由一批军队高级将领和地方高级党政干部组成，发挥着实际的领导作用。8 月 14 至 15 日，他们又组成所谓“江苏省革命委员会筹委会”。其强烈的政治抱负至此暴露无遗（《江、陈、李、包反革命活动大事记》，《八二七战报》1968 年 2 月 9 日，第二版；《打倒国民党式地下黑组织联指参谋团》，《东方红战报》1968 年 2 月 23 日，第四版；《揭“联指顾问组”黑幕》，《南京八二七》1968 年 8 月 2 日，第一版；《地下黑书记处在行动中》，《星火燎原》1967 年 12 月 7 日，第二至三版）。

### 毛泽东最终决定保许世友

就在南京“倒许”运动胜利在望的时候，从武汉撤退到上海的毛泽东做出了他的决定——他觉得各地反对军方的斗争走得太远。8 月 10 日，他在一份中央军委呈阅的文件草案中删去“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表明其态度的转变（《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第 1014 页）。8 月 16 日，他命令张春桥飞赴安徽，亲自护送正在大别山里避难的许世友前往上海。8 月 18 日，毛泽东召见许世友并当面承诺：许世友和南京军区都不会被打倒（李文卿《文化大革命中的许世友将军（二）》，《党史纵横》，2002 年第 12 期，第 19-22 页；徐开福《许世友的晚年岁月》，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第 91 页）。

既然毛泽东现在做出了决定，中央文革不得不迅速调整其政治姿态。陈伯达在 8 月中旬的一次会议上说，“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是错误的，“全国只有一个

陈再道”。张春桥也紧急刹车：他于8月14日告诫杜方平不要压“八二七”太厉害，不要重犯“一·二六”的错误。8月29日，他又打电话给曾邦元，要求南京的造反派们停止“反许”活动（《派报后台杜方平，就是应该批判》；《南京文化大革命大事记（初稿）》，第87页）。周恩来当然欢迎毛泽东的决定。8月16日以后，他多次在接见各地造反派的会议上强调：绝对禁止攻击人民解放军（《周恩来年谱》，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第181页；《派报后台杜方平，就是应该批判》）。8月25日，毛泽东指责那些策动反军运动的中央文革激进派“毁我长城”、“不是好人”。王力、关锋和林杰作为替罪羊遭到清洗。戚本禹数月后也被清洗。

南京“反许”势力对中央高层的政治动向一无所知。毛泽东关于军队问题的最新指示直到8月25日才公开发表。而许世友在得到毛泽东的当面承诺后，一声不响地返回他在大别山中的秘密藏身之所（李文卿《文化大革命中的许世友将军（二）》；徐开福《许世友的晚年岁月》，第91页）。8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党委给南京海军指挥学院的“反许”派发来电报，警告他们许世友不是另一个陈再道（《南京文化大革命大事记（初稿）》，第90-91页）。杜方平和他的同盟者们错误地认为，这封电报仅仅表明海军高层的保守倾向。8月28日，他们动员了70多个群众组织在南京军区司令部门前示威，并成立一个“揪许火线指挥部”（《南京文化大革命大事记（初稿）》，第93页；《揭“联指顾问组”黑幕》）。

8月29日，周恩来命令南京“反许”派解散“揪许火线指挥部”，并警告其头头们：“许世友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中央对许世友同志是要保护的。这不是我个人的意见，这是毛主席的指示精神。”（李文卿《近看许世友，1967-1985》）。造反派们随即将“揪许火线指挥部”改为“揪江（渭清）火线指挥部”，但他们依然计划在9月2日召开一个批判声讨许世友的群众大会（李文卿《文化大革命中的许世友将军（二）》）。“九二大会”最终流产，是因为当天凌晨张春桥奉周恩来之命两次打来电话加以阻止（葛忠龙访谈；耿昌贤访谈；《南京文化大革命大事记（初稿）》，第95页；《揭“联指顾问组”黑幕》）。

南京的“倒许”运动就此画上句号，然而两派的斗争依然存在。9月4日，周恩来派来的中央调查组促使双方达成一项停火协议，当地的暴力冲突逐渐平息，但两派继续指责对方犯了严重政治错误。9月中旬，中央召集两派代表赴北京谈判。但谈判持续了三个多月毫无进展。为了打破僵局，中央高层于1968年1月28日突然公开宣布杜方平和高啸平——南京两派的标杆人物——是挑起群众派性武斗的幕后“黑手”。这显然是对固执己见的两派头头们的一个警告。坚冰最终被打破。3月下旬，江苏省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许世友成为省革委会一把手。从1967年3月实施军管到1968年3月成立革委会，南京的派性武斗持续了整整一年。导致派性武斗延续与激化的最重要原因，是中央高层的内部政争和毛泽东的优柔寡断。而最终的结果，是许世友在中央的扶持下实施更为严厉的“军管”。

## 结论

1967年南京造反派阵营的分裂，最初始于夺权时机和领导权分享问题上的不同意见，而后逐渐升级为旷日持久的暴力争斗。群众派性组织的分野突破了基于政治地位和职业类别的身份认同。分化植根于文革运动进程中所做出的抉择，而非源于运动发生前已存在的社会和政治身份认同。这样的派性身份认同并非1966年地方党委支持者与反对者派性分野的自然延续和外在表现。对立的两派都没有清晰地界定自己的立场和主张，因而我们无法判断他们究竟是支持还是反对现存政治秩序。他们在一些关键问题上的立场和主张本质上都是策略性的，其目的无非是在中央高层和当地驻军中寻求支持者，同时贬抑对立派别及其支持者。这种冲突导致地方党政干部之间的派性对立，军队干部之间的派性对立，以及地方造反派——主要是学生和工人——之间的派性对立。

南京派性组织之间最初的分歧，仅限于夺权的时机和“夺权委员会”的成员构成。“屁派”成员曾在1966年为推翻地方党委进行了长期而艰苦的斗争。他们拒绝接受在最后的夺权行动中遭到排斥，同时拒绝接受“反对夺权就是反革命”的指控。“好派”方面则先是为捍卫“一·二六夺权”而战，稍后又为抵抗军方的“三月镇反”而战。而他们的这些抗争都得到一些北京大人物的鼓励。

为什么这些起初很细小的不同意见会发展成如此深厚且强烈的仇恨？起点当然是北京拒绝承认南京“一·二六夺权”。北京拒绝承认夺权，是因为中央高层在任命哪一位地方党政高级官员领导新政权的问题上无法达成共识，同时因为造反派阵营已发生分裂。这里，南京与上海的显著差异值得关注。张春桥身为中央文革核心成员，同时又是上海市委书记处成员。他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领导当地的群众造反运动，并很快被任命为新的革命委员会一把手。他有毛泽东的大力支持，又利用当地驻军镇压了一个处于萌芽状态的反对派群众组织——这些学生和工人造反派认为，由一位现任高级干部领导的夺权，是对群众造反运动的僭越。因而，上海造反派阵营内部的分歧得到有效遏制，使这座城市幸免于其他地区普遍遭遇到的旷日持久的派性冲突。

我们依然需要解释，为什么南京造反派阵营内部最初的意见分歧最终会发展为如此漫长而惨烈的暴力冲突。这里，持不同政治见解的北京大人物的深度介入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这些中央官员之间严重缺乏相互信任。他们都试图通过操纵地方派性冲突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即根据自己的意志打造各省的革命委员会。对立的南京两派因而沦为北京官员们实现各自政治意图的工具。另一方面，南京两派都意识到如果没有来自北京的支持，他们便不可能获得成功。所以无论北京的支持来自中央文革，还是周恩来，还是中央军委，他们都会欢迎——当然他们最希望得到的，是毛泽东的支持。正是在对中央大人物的亲睐表示做出回应的过程中，南京的造反派们不知不觉地卷入了他们并不完全了解的中央高层纷争，成为持不同政见的中央官员的地方代理人。

这种官僚斗争的大致轮廓是清晰的。中央文革成员们从一开始便极度不信任周恩来，因为周恩来的所作所为显然旨在恢复秩序和恢复工业生产，阻止文革运动的发展蔓延。1967年2月间，周恩来打算让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复出担

任新的革命委员会一把手，进一步加深了中央文革成员的猜疑。中央文革还疑虑周恩来对许世友施加影响，促使其倒向“屁派”。在许世友的妻子成为“屁派”头头后，特别是在军方逮捕了数百名抵制军管的“好派”骨干分子后，中央文革开始暗中策动“好派”和杜方平反对许世友。这些活动在1967年夏天达到高潮。军方的反对者们指责军方为重建秩序而残酷镇压体现毛泽东思想的群众造反运动。

中央文革在阴谋颠覆军管的活动中双管齐下。一方面，他们通过多种秘密渠道与“好派”头头接触，鼓励他们抵制军方、批判许世友。另一方面，他们积极鼓励军队内部的反对派公开挑战许世友，并与“好派”结成联盟。因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好派”的头头和群众们觉得他们得到北京的明确支持。另一方面，当地驻军因毛泽东没有就许世友的命运做出明确表态，不得不采取一种防御姿态。所以在1967年夏天“好”、“屁”两派在南京城里打得热火朝天的时候，当地驻军拒绝采取任何行动。

“屁派”拥护许世友和军管会。他们这样做不是出于任何复辟旧体制的愿望，也不是因为他们比“好派”在旧体制中享有更多的既得利益——事实上，“好派”方面收留了许多旧省委官员。他们拥护军队的唯一理由，是只有这样做才能稳稳坐实他们早先提出的一个断言：即“一·二六夺权”将他们排除在外，因而不具备合法性。他们视自己为“革命左派”的一员，并以“好派”容留许多高级党政干部为主要论据，指责“好派”是企图复辟旧体制的“保守派”。而“好派”则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指责军队企图否定真正的群众夺权，同时指责“屁派”的言行代表着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反动势力。双方这些自相矛盾的指控貌似雄辩，然而无论双方的修辞策略如何竭力混淆视听，他们之间的冲突绝对不能被理解为真正意义上的“保守派”阵营与“激进派”阵营之间的斗争。

南京军方在军管期间的克制姿态——或者说防御姿态——与武汉军方的所作所为形成鲜明对照。武汉的情况起初与南京的情况一模一样：此前团结一致造反派阵营中的两翼因对一月夺权后的权力分配意见不一而发生分裂，由此形成支持夺权的“香花派”和反对夺权的“毒草派”。武汉军方也对暗中抵制军管的“香花派”实施了镇压——有所不同的是，这种镇压力度很大，几乎将“香花派”彻底消灭。此后武汉和南京的故事便朝着两个截然不同的方向发展。在武汉“毒草派”发表一个冒犯当地驻军的社论后，陈再道将军以此为借口转而镇压“毒草派”，并公开支持1966年因捍卫地方党委被打败的“保守派”残存势力。由此形成的派性对抗使武汉闻名遐迩，并引发了一波全国性的反军浪潮——南京的许世友也因而受到威胁。最后，貌似高深莫测、英明神武的毛泽东出尔反尔，诏谕对军队的攻击必须停止，激进的中央文革年轻成员必须受到整肃，还有就是许世友应该留下——这使得中央文革和张春桥不得不紧急叫停各地的反军运动。在经历了好几个月的相互诋毁和街头暴力之后，造反派重新团结的可能不复存在，毛泽东不得不最终诉诸于赤裸裸的高压威慑的军事统治。

有些学者断言，1967年中国的派性冲突之所以旷日持久而且暴烈血腥，是因



为这种冲突反映了不同社会群体的相反利益诉求。这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看法，却很难从南京个案中找到支持论据。大量的历史资料倒是提供了一些更为有趣的事实：起初结成联盟、具有几乎完全相同背景的两拨造反派人马，因在一些策略问题上产生争端，而后又将这些争端上升到政治原则的高度。两派都寻求北京和当地驻军的支持，而北京大人物和当地驻军首长则从最有利于自己的考量出发去解决争端。这样做的结果，是地方上的造反派们被拖入北京高层内部的激烈政争。中央高层之间争斗的目的在于扳倒对方，并在各地政权更迭的过程中推行不同的政治路线。引发地方造反派分裂的因素则完全不同——他们需要北京的支持，而不在乎这样的支持来自何方。南京、武汉或其他一些地方的派性冲突所揭示的那些问题，是否普遍存在于 1967 年实施军管的其他众多省区，还有待我们对各地的情况做出详实的微观实证分析。然而有一点却非常清楚：即此前关于文化大革命时期政治冲突的宏大叙事，值得我们彻底反思。

---

【史林一叶】

## 江苏省革命委员会的建立

董国强、Andrew G. Walder

按：本文译自英文，原标题为 From Truce To Dictatorship: Creating A Revolutionary Committee In Jiangsu. 刊载于 *The China Journal*, No. 68, July 2012.

【摘要】江苏是 1967 至 1968 年间遭受痛苦而漫长的派性暴力困扰的众多省份之一。当局用了三年多的时间才重新建立了相对稳固的地方行政权威。1967 年 9 月在中央斡旋下达成的暂时停火协定，开启了历时近半年、乱象纷呈的北京谈判。其间相互敌对的军地代表团成员们固执己见，使中央促成两派联合的努力举步维艰。1968 年 3 月江苏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充满争议的许世友将军被任命为省革委会主任，两派群众组织的头头们也被赋予了象征性的职位。然而派性纷争并未终结。许世友不得不又花费近三年的时间去逐步肃清军地反对派。通过一系列极度惨烈的镇压措施，他和他的支持者们最终于 1970 年底在江苏实现了铁腕统治。

1967 至 1968 年间各省革命委员会的建立，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政治的一个最重要变化。Jurgen Domes 在 1970 年写道：“当第一个‘革命委员会’在‘文化大革命’高潮中建立的时候，中国大地出现了一种新型的权力机构，这暗示着地方性权力结构的巨大变化。”（Jurgen Domes, “The Role of the Military in the Formation of the Revolutionary Committees, 1967-1968,” *The China Quarterly* 44 (October-December 1970), pp. 112-145, at p. 112）一些早期

观察家们描述了这些委员会的成员构成——军队干部、幸存的地方党政干部和群众组织代表的结合——以及它们在遏制派性暴力和瓦解群众组织方面的作用。这些早期论著都强调军队在地方行政事务中的地位和作用明显增强。然而尽管各地革委会的成立显然是军事镇压的产物，是对此前激进造反运动的一种否定，却没有人能够清晰地描述革委会形成的过程。军事管制代表着文革期间中国政治的“保守主义”转向的观点被如此广泛地接受。因而，反对军管的群众派别赢得了“激进派”的标签，而拥护军管的群众派别则被称为“保守派”。

对单个省市革委会形成过程的最详实记述无疑要数上海。上海市革委会曾经是全国的著名样板，一些学者依据“毛时代”和“后毛”时代的资料对其进行过颇有深度的描述。然而不幸的是，了解上海个案对于我们研究考察其他许多地方革委会的建立过程并没有太大帮助：上海市革委会成立后立即得到中央的批准，使得该市幸免于严重的派性问题和全市范围的暴力冲突，而且军队在当地行政事务中的影响作用相当有限。而在其他许多省份，1967年夏天的派性武斗几乎演化为全面内战（详见 Barbara Barnouin and Yu Changgen, *Ten Years of Turbulence: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London: Kegan Paul International, 1993, pp. 154-163. 该书对相关问题的论述主要基于上海的情况，另有一小段文字谈到安徽。Roderick MacFarquhar and Michael Schoenhals, *Mao's Last Revoluti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239-246. 该书简单地将革委会建立过程较为平和的天津和较为激烈的广西做了类比，意在强调各省情况的广泛差异性。另有两部详细论述十年文革期间省级派性冲突的专著，则几乎没有涉及当地革委会的建立过程。它们是：Keith Forster, *Rebellion and Factionalism in a Chinese Province, Zhejiang, 1966-1976*. Armonk, N.Y.: M.E. Sharpe, 1990, pp. 56-65 and 84-91, and Shaoguang Wang, *Failure of Charisma: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Wuha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203-209)。

在其专题论述 1966 至 1968 年文革运动的著述中，卜伟华试图对各省的情况做出较为详尽的描述。他提到革委会在重建秩序、遏制派性武斗和恢复经济方面的作用（卜伟华《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第 725-737 页）。他还强调指出，这种努力的最终结果是地方权力几乎完全落入军队干部之手，从而导致无法掩饰的、高压威慑的军事独裁（卜伟华《砸烂旧世界》，第 736-737 页）。不过他对各地军队干部、幸存的地方党政干部和造反派头头的“大联合”是如何实现的，以及如何由此逐步过渡到革委会的正式建立，所谈甚少。他基于对各省情况的粗略考察，指出全国各地的“大联合”经历了造反派分裂、旷日持久的谈判、抵抗和反对、最终达成协议等几个阶段。不过他也发现，各省的政治发展进程存在着巨大差异，而且每个地方政治冲突的复杂程度都令人望而生畏。他说：“各省、市、自治区的革委会的建立过程极其复杂，许多情况到现在也还扑朔迷离，不为人所知”（同上，第 726 页）。

许多问题依然没有答案。北京高层在地方各派势力谈判和各地新领导人任命

问题上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是真的通过协商解决问题，还是由中央就相关议题作出各种规定？群众组织领袖在革委会建立过程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他们真的具有实质性影响，还是被迫充当象征性的配角？派性冲突真的得到了解决，还是简单地在高压威慑下转入地下？军队在新权力结构中显而易见的主导作用，意味着“保守的”军方势力在镇压“激进的”群众组织的过程中崛起（Richard Baum 是持上述看法的学者之一。详见 Richard Baum, “China: Year of the Mangoes”, p. 9），还是军队内部也存在着分歧，因而军队与激进群众组织之间存在着更为复杂的互动？如果各地驻军确实成为一种主导势力，那么他们是通过赤裸裸的武力威慑获得这样的主导地位，还是不得不有所克制以争取中央高层和地方各派势力的支持？

要回答上述问题，就必须对某个特定地方的运动发展过程有相当细致的了解。这里，我们拟借助对江苏——1967 至 1968 年军管期间继续遭受派性冲突困扰的地区之一——的深入分析来阐释这些问题。江苏省革委会建立于 1968 年 3 月，在全国的“大联合”进程中大致位居中游。为了建立江苏省革委会，中央领导层与地方各派势力之间进行了漫长而痛苦的谈判。由军队和地方各派势力不断分化组合而形成的两大对立联盟起初势不两立、争吵不休，后来在北京高层的一再要求和反复斡旋下才逐步达成暂时妥协。在毛泽东提出最终的解决方案后，谈判中的强制性因素日益增强。然而即使在革委会成立以后，因地方两派对许世友担任一把手依然存在争议，所以新政权用了两年多的时间去弹压死而不僵的派性对抗，消灭顽固的反对势力。

我们的相关论述基于一大批新近获得的地方性史料。首先是当地两派群众组织在 1967 至 1968 年间编辑出版的 12 种小报和一些零散的传单。这些资料的出版时间贯穿“大联合”和革委会谈判的全过程，对当地的派性争端有非常详实的记述。其次是中央高层与江苏/南京各派政治人物之间的一系列会谈记录。这些会谈记录曾刊载于红卫兵小报和当时编印的中央领导人讲话汇编。第三是由南京市档案馆在 1980 年代编印、从未公开出版的《南京文化大革命大事记（初稿）》。第四是由几位当年卷入派性冲突和参加北京谈判的亲历者近年撰写的回忆录（有些没有公开发表）——其中一位是南京市委机关干部，后来曾主持当代南京地方史的编撰工作；另外四位是来自南京军区、对许世友看法相左的军队干部。此外，我们还采用了六位南京两派群众组织头头的访谈资料，以及其中一些人自撰的短篇回忆录手稿。

真实地还原革委会建立的过程，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毛时代”最后几年的发展状况，尤其是派性冲突何以断断续续地一直持续到 1970 年代，以及 1968 年实现的国内“和平”是何等脆弱。在江苏个案中，经过省级地方当局和当地各派势力之间无数次谈判、于 1967 年 9 月达成的“九四停火协议”，和 1968 年 3 月建立的、得到中央肯定的江苏省革委会，都是脆弱的和暂时性的政治成果。新建立的地方政权不得不花费很大气力去树立自己的权威，遏制工厂和学校中的派性争斗。许世友领导下的军方势力借助一系列全国性的运动逐步推

进，对公开的和潜在的反对派各个击破，才最终实现对社会的全面控制（其后果是，当许世友在1973年底因“八大军区司令对调”前往广州后，这段时间内他对反对派的镇压立即成为1974年江苏“批林批孔”运动中派性争斗的一个主题。详见 Dong Guoqiang and Andrew G. Walder, “Nanjing’s ‘Second Cultural Revolution’ of 1974”, *The China Quarterly*, December Issue, 2012, forthcoming. )。

更重要的一点是，江苏省革委会的成立使得那些原先造成派性分野的因素不复存在，揭示了文化大革命这一阶段地方政治冲突的本质。当江苏两派代表应邀前往北京消除分歧的时候，他们分别陈述了各自的立场，并对其对手提出诸多指控。然而最引人注目的是，他们之间的分歧丝毫不涉及重大原则问题和各项现行政策。归根结底，双方的分歧在于对1967年一系列地方事件的不同诠释。其核心问题是，许世友领导下的南京军区是否在1967年3月实施军管时犯了严重错误——即是否企图“镇压革命左派”、阻碍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而这个核心问题的相反表述则是，1967年夏天军内反对派和一派群众组织发起的“倒许”行动是否非法——即是否企图无端打倒忠于毛泽东的军方领导人、使文化大革命沦为一场动乱。一方是许世友领导的军队和支持他的群众组织，另一方是军内反对派和他们在学生、工人群众中的同盟者。他们之间究竟谁是对的谁是错的？双方在这个问题上显然都下了很大的赌注。而且这个问题不解决，“大联合”就无从谈起。尽管北京高层起初试图绕过这个问题，但是对立的两派都竭力迫使北京表明立场。

### 1967年江苏派性

到1967年4月为止，在中国29个省级行政区划中，只有5个地方成立了革委会并获得中央的认可。其他地区都遭遇了派性暴力冲突和政治统治危机，并一直持续到1968年。江苏就是这样的地区之一。由于贯穿该省境内的铁路是连接工业重镇上海与全国各地的交通运输命脉，所以北京对江苏的动乱十分关注。

江苏的派性归属关系初步形成于1967年的头两个月。当时，推翻南京地方党政当局的造反派阵营中的两翼分裂为两派。造反派们的分裂不是源于对省市党的不同态度。事实上，对立的两派都以南京大学的造反学生为核心骨干。他们具有相同的背景，并且曾经在推翻省市党的造反运动中结成紧密的联盟。双方的分歧始于1967年1月向省市委夺权前夕的谈判中。当谈判陷入僵局时，一部分造反派宣布退出谈判，而另一部分造反派则在没有前者参与的情况下实施了“一·二六夺权”。在当地驻军的支持下，实施夺权的造反派宣称他们是江苏“革命左派”的代表。当初退出谈判的造反派现在处于边缘地位，便对单方面的夺权行动提出批评。他们争辩说，“一·二六夺权”不能代表当地各大造反派组织的共同诉求。鉴于造反派的公然分裂，先前鼓动造反派夺权的周恩来拒绝以中央名义正式批准这次夺权。随后，两派代表奉诏前往北京谈判。这场谈判艰难曲折，旷日持久，最终未能促成双方的联合。结果，中央于3月5日宣布对江苏实施军管，从而将

两派的争议暂时搁置起来。

以南京军区政委杜平为首的江苏省军管会负责实施江苏的军管。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是杜平的顶头上司，负责指挥江苏、上海、安徽、浙江等地的驻军。许世友将军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1920年代投身共产主义革命前曾在河南嵩山少林寺修习武功。他经历过长征和延安整风的考验，在红军将士中以骁勇善战著称。不过在长征途中，他一度因追随张国焘犯下严重错误。毛泽东为了团结红四方面军的将士，拒绝以“叛徒”罪名将他处死，并说服他做出自我检讨，因而使许世友一辈子感恩戴德。在随后的历次党内权力斗争中，许世友都表现出对毛泽东的绝对效忠（详见孙晓、宋梅：《一代名将许世友》，济南：黄河人民出版社，2004）。在1967年夏天，许世友成为江苏两派争执的焦点问题之一。

当地驻军很快便卷入了两大造反派组织的派性纷争——在“一·二六夺权”期间，造反派们分裂为“好派”和“屁派”。“屁派”欢迎军管，因为军管意味着中央不承认“一·二六夺权”。他们希望当初支持夺权的军队在新的权力机构中发挥主导作用，从而使所有造反派组织都获得同等的政治参与机会。“好派”认为军管是对他们合法夺权的僭越。当军队前来接管处于他们控制之下的交通运输中心和其他重要单位时，一些“好派”组织进行了抵抗。军方随即逮捕并监禁了数百名“好派”成员。作为回应，“好派”方面指责军队“镇压左派”，并成为军管的反对者。他们的抱怨得到北京中央文革大人物们的同情。中央文革在2月份北京谈判期间曾支持“屁派”，然而现在他们对当地驻军贸然镇压群众造反运动感到担忧。中央文革的友善姿态使“好派”大受鼓舞，他们继续抵抗军方。而在“好派”的反军活动日益高涨的同时，“屁派”则越来越坚定地支持军方。

南京军方由此被拖入地方派性冲突。这个冲突在武汉“七二〇”事件后达到高潮，“好派”在此期间公开提出“打倒许世友”的口号。南京军区内部当初帮助策动“一·二六夺权”的一些军官此时公开支持“倒许”运动。南京军区空军司令部、若干驻宁军事院校和当地军工企业的领导人也加入到反对派的行列。由于军管当局不能或不愿采取有力行动，所以街头暴力冲突在8月份完全失去控制，江苏由此陷入统治危机。最终因毛泽东的有力干预，许世友问题才得以解决。毛泽东于8月中旬召见许世友，明确表态支持他。毛还同时表示，不会容忍对江苏军管当局的进一步攻击（详见 Dong Guoqiang and Andrew G. Walder, “Local Politics in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Nanjing Under Military Control.”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70: 2, May 2011, 425-447; 另见董国强：《1967年夏天南京“倒许”风潮的台前幕后》，刊载于《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006年11月号）。一个星期后，中央文革重要成员王力和关锋作为鼓动各地反军运动的替罪羊遭到清洗。戚本禹稍后也遭到清洗。这有效地遏制了反对许世友和南京军管当局的运动。

当南京军管当局的权威在毛泽东的直接干预下得到初步稳固后，促成当地各派势力“大联合”的问题便被提上了议事日程。以中国民航总局政委刘锦平和总理办公室联络员宋皋为首的“中央赴江苏调查组”为实现停火在南京两派之间斡

旋。9月4日，南京两派正式签署了一份停火协议，并立即得到中央的批准。这份协议鼓励双方“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紧掌握革命斗争的大方向，在革命大批判中联合起来”（《中共中央对江苏三派革命群众组织〈关于坚决制止武斗的协议书〉的复电》，1967年9月10日，刊载于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2002）。自此，为打造江苏省革命委员会而进行的、历时7个月的艰难谈判和幕后博弈的进程正式启动。而1968年3月江苏省革委会的成立，不过是一个更为漫长的旨在巩固军管的进程的开始。

### 江苏代表团赴京

“九四协议”签订后，周恩来命令江苏省军管会负责人杜平派出一个代表团赴北京商议当地各派势力“大联合”事宜（袁刚《风雨八年》，第82页，南京：自印本，2008。袁刚当时是南京军区司令部年轻军官、省军管会工作人员，曾亲历北京谈判）。杜平花了两个星期的时间组建这个代表团。他给几个重要城市的两派群众组织分配了代表名额，但具体人选由这些群众组织自己决定（耿昌贤访谈，扬州，2007年2月1日。葛忠龙访谈，阜宁，2007年4月14日。曾邦元访谈，南京，2007年12月29日。耿昌贤是南京大学学生，南京“好派”头头，曾参与策动“倒许”，1968年被选为南京市革委会委员。葛忠龙是南京大学学生，南京“好派”头头，1968年加入南京大学革委会。曾邦元是南京大学团总支书记，“屁派”头头，1968年被选为江苏省革委会委员。他们三人都亲历了北京谈判）。江苏代表团的阵容很庞大，包含六个城市的驻军代表和地方代表184人（其中军队代表30人。南京“好”、“屁”两派代表各30人。苏州、无锡、常州、扬州和南通的两派群众组织也根据对等原则派出其代表。另有6名代表来自南京第三派群众组织“促联”。“促联”成立于1967年7月，组织规模不大，其观点后来更接近于“屁派”。袁刚《风雨八年》，第85页）。而这六个城市都是上海通往全国各地的交通要津。在30名军队代表中，许世友的支持者占据了绝大多数。不过两位著名的军内反对派领导人——省军管会副主任杜方平和南京空军副政委王绍渊——被任命为代表团副团长（王晏《板荡识诚臣：忆尤太忠上将文革初期在江南同“四人帮”反党乱军阴谋作斗争》，第89页，南京：自印本，2002。王晏当时是二十七军政治部处长，江苏赴京代表团成员）。

代表团成员的言行显示，两派赴京谈判的最主要目标在于争取北京高层支持本派关于江苏问题的诠释。相对而言，当地造反派们在新权力机构中的席位之争并不重要。早在2月份北京谈判期间，中央的态度就十分明确：造反派头头不可能在新的权力机构中占据主要领导职位。因而，两派代表最关心的是确保本派不会因1967年夏天的暴力冲突受到责罚，而且确保未来掌权的人同情本派的观点，或者至少对两派此前的暴力冲突持中立态度——仅在南京一地，1967年夏天“倒许”运动期间就发生了91起以上暴力冲突，造成30多人死亡（李之荣《十年动乱期间的南京》手稿。李之荣当时是南京市委机关干部，文革后曾担任南京市委

党校副校长)。而且就在不久前,北京的几位官员被控在1967年夏天挑动各地的派性武斗而遭到清洗。所以代表团成员们尤为关注的是:谁将为这些事件承担罪责?究竟是军管当局犯了错误,应该受到指责?还是军管当局的反对者们违反了中央的指示、背离了毛主席的教导?对上述问题的不同答案,将直接影响两派头头及其追随者的未来命运(陈克兴和罗世果《在阳光的照耀下——记赴京四月斗私批修》,《星火燎原》,1968年2月15日,第一版。陈克兴是南京“屁派”一个重要工人组织的头头,罗世果是华东水利学院“屁派”组织头头)。为了减轻本派的责任,罗织对方的罪名,双方都积极致力于论据材料的收集和整理工作。他们还反复讨论了如何在未来谈判中陈述本派立场的策略(袁刚《风雨八年》,第82-83页)。

这些工作对于“好派”方面显得尤为紧迫,因为他们曾经将斗争矛头指向许世友。而后毛泽东亲自介入干预,诏谕许世友是值得信任的,对他的攻击必须停止。“好派”方面的领军人物是南京军区国防工业部部长杜方平。他在1967年初支持“一·二六夺权”,后来又在北京中央文革成员的鼓励下,与“好派”一起公开反对许世友。不过由于与他关系紧密、积极支持“倒许”的中央文革成员林杰不久前和王力、关锋一同遭到清洗,杜方平的政治影响力逐渐削弱。因而卷入“倒许”运动的三位南京军区空军司令部领导人——江腾蛟、王绍渊和高浩平——开始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江腾蛟是南京空军政委,王绍渊是南京空军副政委,高浩平是南京空军政治部主任。他们三人在文革初期合谋打倒了深得许世友信任的南京空军司令员聂凤智。1967年8月,这三人又公开宣布支持“倒许”运动。出于显而易见的理由,他们坚决反对任何旨在让许世友掌管江苏的安排9《王××高××反许乱军罪行滔天》,《新南大》,1968年4月6日,第三版)。

在江苏代表团赴北京前夕,王绍渊、高浩平与杜方平和“好派”头头们一同制定了他们的战略计划。他们的基本立场是,许世友和江苏省军管会领导班子犯了执行“资反路线”的错误,应该受到撤职查办,并由南空领导人和其他军内反对派接替他们的职务(文凤来、张建山、葛忠龙《王绍渊、高浩平反许乱军罪证二十六条》,《江苏红卫兵》,1968年5月24日,第四版;另见《历史宣判了王高反革命集团死刑》,《革命工人报》,1968年6月5日,第三版)。在谈判开始前,他们将派人前往北京争取中央高层的支持。在谈判过程中,他们要与同情他们的北京领导人和留在南京的盟友加强协调沟通。为了在谈判中抢占先机,变被动为主动,杜方平应该在抵京后立即提交一份彻底承认其所犯错误的自我检查,从而迫使对方也作出类似的检讨(袁刚《风雨八年》,第83页)。

南空领导人强调,“好派”代表应该将斗争矛头指向南京军区领导人,而不是“屁派”群众组织。其主要论点包括:南京军区动用军队镇压左派;他们在干部问题上奉行错误路线;他们镇压军内造反派;他们歧视“好派”群众组织;他们必须为暴力冲突承担罪责(《历史宣判了王高反革命集团死刑》)。军内反对派领导人还派人赴京游说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邱会作将军。与此同时,为了壮大“反许”联盟的声势,他们还要求一批在1967年3月间受到降职降级处分的南京军



区司、政、后机关中下级军官组成代表团赴北京控告许世友——这些人因在文革初期卷入批评南京军区领导人的大字报事件遭到打击报复（袁刚《风雨八年》，第84页）。质言之，上述这些动作是1967年8月南京“倒许”运动的延续——军内反对派及其“好派”盟友们试图利用北京谈判去实现他们在1967年夏天“倒许”运动期间未能实现的目标。

### 北京谈判：艰难的起步

江苏代表团成员于9月18日至24日间分期分批乘火车抵达北京。军队代表们奉命前往京西宾馆住宿，而地方代表们则被安顿在西苑饭店。有关方面向代表团成员宣布了几条纪律：所有代表必须停止派性活动；不得与其他省市的代表团接触；军队代表和地方代表应该在各自的学习班里学习，不得相互干扰；代表团成员应该多做自我批评，而不是竞相指责其对手。然而事实很快便证明，这些规定不过是北京高层的一厢情愿。

地方两派代表学习班第一次全体会议原定于9月23日在西苑饭店举行。当得知这次会议将由省军管会副主任、许世友的亲信梁辑卿主持的消息后，住在京西宾馆的南空领导人立即通知“好派”头头：梁辑卿是“屁派”的“后台老板”，让他主持地方学习班，表明中央还不太了解江苏的情况。他们要求“好派”方面据理力争。结果，第一次会议在两派的激烈辩论中不欢而散（《历史宣判了王高反革命集团死刑》）。此后，中央指示地方两派分别举办各自的学习班。

9月26日，江苏代表团出席了由周恩来、中央文革成员以及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召集的十二省市代表团全体成员大会。毛泽东于会前在主席台上短暂亮相，接受各省代表们的欢呼喝彩，但是一言未发。毛泽东离开后，张春桥和杨成武开始传达毛泽东最近视察各省时的一些谈话。这些谈话除了含糊其辞、言不及义的空洞说教之外了无新意，而且张春桥、杨成武等人在传达、阐释这些谈话时，不愿承认7、8月间席卷中国大地的动乱是由中央高层的内部分歧造成的（《中央首长接见各省军队干部地方干部和红卫兵时的讲话》，1967年9月26日，刊载于《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这似乎意味着暴力冲突完全是由地方因素引起的。因而，应该受到责罚的是地方上的各派势力，而非最近受到清洗的中央文革成员。

9月28日，张春桥和康生代表中央第一次接见江苏代表团。他们两人曾在8月份暗中鼓励“倒许”运动，现在却反复重申中央保护许世友的政策，说许世友是“值得信赖的革命老战士”。张春桥在谈话中表示，许世友在“支左”过程中确实犯了一些错误，不过由此引发的争端可以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加以解决（《中央首长接见江苏赴京代表团的讲话》，1967年9月28日，刊载于《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这个态度引起军内反对派领导人和“好派”代表的严重不满，促使他们加紧反对许世友的努力（王晏《板荡识诚臣》，第91页）。

10月1日，一个盛大的国庆典礼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在京的十二省市代

代表团成员都应邀参加庆祝活动。然而江苏代表们在这次活动中得到一些相互矛盾的信息。在8月“倒许”运动期间逃往大别山避难的许世友，现在与毛泽东和其他军政要员们一同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这是许世友在北京重要活动中首次公开亮相，清楚地表明他得到毛泽东的信任。不过与此同时，杜方平和王绍渊——8月“倒许”运动的两位领导人——也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与各省市“革命干部”们站在一起（新华社《毛主席同首都五十万军民欢度国庆》，《人民日报》，1967年10月2日，第一版）。一个更加令人困惑的信号来自新华社对各省省会城市庆祝活动的报道。在许多尚未建立革委会的省市，庆祝活动一般都由军管会负责人主持。然而在关于南京的报道中，却只有若干“群众代表”受到特别关注（新华社《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革命群众和解放军指战员隆重举行国庆集会游行》，《人民日报》，1967年10月3日，第二版）。这使代表们猜疑：中央对许世友的支持力度究竟有多大？

“中央赴江苏调查组”的态度同样使人感到困惑。调查组组长刘锦平在与“屁派”的谈话中强调，杜方平是一位“老造反”。他还说杜方平被任命为江苏代表团副团长，表明中央现在依然信任他。他还告诫那些忠于许世友的军队干部，他们应该努力实现与反对派的大联合，而不要在幕后搞小动作（《刘锦平十月间接见江苏各派及省军管会代表各次讲话摘要》，刊载于《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实际上，刘锦平的上述谈话以及前面提到的种种情况，无非表明中央试图在处理江苏两派争端时“一碗水端平”。然而，对那些正处于紧张谈判中的两派代表而言，中央这样不偏不倚的姿态却反而给他们造成困惑和焦虑。

### 军队代表团内部的冲突

在西苑饭店遭受挫折之后，北京当局将注意力转向军队代表的谈判。意识到军方的分裂阻碍着地方派性冲突的解决，中央转而尝试首先解决军队方面的问题。可是，军队方面的团结同样前景黯淡。

国庆节过后，军队代表学习班在京西宾馆开幕。为了避免直接对抗，许世友没有参加学习班。在第一次“学习”会上，江苏代表团团长、省军管会主任杜平试图通过自我检讨“支左”工作中的错误，起到积极的表率作用。他承认军管会犯了一些错误，但更强调其成绩。之后，他请各位代表发表意见。曾带头反对许世友的杜方平首先站起来，向杜平发出一连串质疑：“谁应该为江苏的问题承担罪责，是军区和军管会领导还是我？这次学习班的目的何在？斗争目标是那些军区和军管会领导还是我？”支持许世友的代表们批驳杜方平的立场，而站在杜方平这边的代表们则为他辩护。这次会议在争吵中结束，接下来的几次会议也都充满火药味（袁刚《风雨八年》，第87-88页）。

10月中旬，南空政委、另一位军内反对派领导人江腾蛟飞赴北京，在解放军空军招待所与王绍渊和其他南空代表密谈，要求他们不遗余力地支持杜方平。此后军队学习班的争论变得更加热烈，杜平不得不宣布暂时休会。大多数军队代表被派往西苑饭店参加地方学习班的学习，只留下杜方平和九名反对他的代表在京

西宾馆继续辩论。这显然是为了孤立杜方平，迫使其就范（袁刚《风雨八年》，第90-91页）。因为杜方平的命运与南空领导人的命运紧密相关，所以他们绝不善罢甘休。他们鼓励杜方平顶住压力，坚持要求军区领导人做更彻底的自我批评。其次，王绍渊在空军招待所秘密召见地方“好派”代表，指使他们起草一份反映军管期间南京军方所作所为的报告，上报中央领导层（《历史宣判了王高反革命集团死刑》）。他们还敦促那批在文革初期卷入造反活动、后来受到各种处分的南京军区中下级军官收集军方在2、3月份“镇反”期间逮捕“好派”成员的证据，其中包括许世友亲自下令抓人的原始记录。11月中旬，一个“南京军区21人赴京控告团”带着上述材料抵达北京。他们设法与周恩来取得联系，并获准留在北京参加军队干部学习班（《中央首长接见江苏赴京代表团的讲话》，1967年11月18日，《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另见袁刚《风雨八年》，第92-93页；赵玉祥《柳营梦》，[http://blog.sina.com.cn/s/blog\\_59e060570100af58.html](http://blog.sina.com.cn/s/blog_59e060570100af58.html)，2012年2月18日登陆；艾汉美《石头城的风雷》，[http://blog.sina.com.cn/s/blog\\_59e060570100as21.html?type=v5\\_one&label=rela\\_nextarticle](http://blog.sina.com.cn/s/blog_59e060570100as21.html?type=v5_one&label=rela_nextarticle)，2012年2月18日登陆）。

伴随着上述幕后活动，社会上开始谣传许世友可能被调往北京任职——按照中国政治的“潜规则”，如果许世友在这种情况下被调离南京，本身就可能意味着他要为南京的冲突承担责任（李文卿《近看许世友，1967-1985》，第97页，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反革命分子杜方平的黑线关系》，《东方红战报》，1968年4月14日，第四版）。

### 南京局势的恶化

在南京的两派成员密切关注北京谈判的进展，并试图通过扩大本派在当地的影响力去形塑北京谈判的结果。在北京，军队学习班中针锋相对的双方通过电话、便条和信使等途径，将他们之间的冲突暗中泄露给西苑饭店地方学习班的两派代表，从而在那里引起类似的争论（袁刚《风雨八年》，第97-98页；陈克兴、罗世果《在阳光的照耀下》）。与此同时，军地两派代表们又通过相同的途径，将北京谈判的消息暗中泄露给双方在南京的盟友（袁刚《风雨八年》，第85-100页；耿昌贤访谈；耿昌贤《一个红卫兵的亲历》，手稿）。从10月下旬至12月，南京两派竞相发起宣传攻势，声援本派代表在北京谈判中的立场。“屁派”方面率先在其主办的小报上推出一期“专刊”，详细列举了“好派”在8月份“反许乱军”运动中的种种“罪行”（《战胜“八月黑风”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南京八二七》（“八月黑风”专刊），1967年10月21日，第一版；《看，这就是杜方平的黄金时代》，同上，第一版；《南京砖瓦厂“八四”流血惨案纪实》，同上，第三版）。他们还肆意毁谤杜方平是“好派”组织的“黑后台”，是“八月黑风”期间实施“反革命大屠杀”、“双手沾满鲜血的刽子手”（《杜方平是江苏省南京地区八月反革命血腥大屠杀的刽子手》，《南京八二七》（“八月黑风”专刊），第五版）。这些极度浮夸的指控随后在“屁派”报刊上周期性地反复出现，直到北京谈判接

近尾声(《三月五日以后杜方平是如何对抗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星火燎原》,1967年11月1日,第三版;《论南京八月反许逆流的由来和实质》,《促联战报》,1967年11月7日,第一版;《“八月黑风”的要害是篡军》,《八二七战报》,1967年11月25日,第一版;《论南京的八月形势》,《江苏东方红》,1967年12月8日,第一版;《究竟怎样看待南京的八月形势》,《八二七战报》,1967年12月16日,第二版)。

作为回应,“好派”方面强调杜方平是“坚定的革命左派”,“屁派”对他大肆攻击无非是为了掩饰许世友的种种“罪行”(《“打倒杜方平”的要害是为军管会的方向路线错误开脱责任》,《井冈山》,1967年11月4日,第二版)。“好派”方面还声称,“屁派”提出的“八月黑风”论与毛泽东7、8、9月间视察各地时提出的“形势大好”的英明论断相互抵牾。“好派”报刊还公布了一批许世友与“屁派”头头暗中勾结的证据,和一些反映“屁派”在8月份暴力冲突中应负责任的材料(《坚决粉碎反动的“八月黑风”论》,《农奴戟》,1967年11月7日,第二版;《彻底批判反动的南京“八月黑风”论》,《井冈山》,1967年11月25日,第三版;《反动的“八月黑风”论可以休矣》,《井冈山》,同上;《从南大八二七的声明看所谓的“八月黑风”》,《井冈山》,同上)。北京谈判原本旨在消弭两派的争端,没想到反而使两派的争端达到白热化的程度。

事后看来十分清楚,只要中央不对许世友和杜方平在南京暴力冲突中的责任作出裁断,只要这两个关键人物的命运悬而未决,两派的谈判就不可能取得进展。归根结底,毛泽东本人必须就此作出决定,然而他当时没有这样做。在这种情况下,张春桥除了重复“批评和自我批评”之类的陈词滥调之外一筹莫展(《张春桥在江苏军队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67年11月4日,刊载于《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周恩来也高明不到哪里去。11月18日,周恩来在康生、张春桥和余立金(余立金当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委,曾任南京军区空军政委)等人的陪同下,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江苏代表团。他除了简单重复“批评和自我批评”等原则之外,对许世友或杜方平都不置一词(《中央首长接见江苏赴京代表团的讲话》,1967年11月18日,刊载于《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在12月5日接见江苏军队代表时,陪同周恩来代表中央接见的康生提出:“联合达不成协议,制止武斗达成协议嘛!”周恩来和康生重申了中央保护许世友的政策:“主席、林副主席讲了,他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他们还说:“……他性子暴,说几句错话”,但“他是拥护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拥护毛主席的路线的”,“我们敢于出来保他,就是看到他的大节好嘛”。然而他们没有涉及最具争议性的话题——杜方平问题(《中央首长对南京军区和驻江苏部队赴京人员的指示》,1967年12月5日,刊载于《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在12月8日,周恩来在中央文革和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陪同下接见江苏地方代表团,再一次空泛地要求他们“斗私、批修”、“实现大联合”和“解放干部,发展大好形势”(《南京文化大革命大事记》,第103页)。

12月14日,周恩来和康生尝试另一种策略。他们提出江苏代表团成员按照

城市和职业划分进行分组谈判，每个城市的工人和学生分别实现各自的大联合（《中央首长接见江苏赴京代表团的讲话》，1967年12月14日，刊载于《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周恩来对代表们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两派嘛！都是造反的，有先进一点的，有缓进一点的，但也会有变化嘛！有的在这一个问题这一点上做得对，有的在那个问题那一点上做得对，现在就要看他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以斗私批修为纲，执行主席最新指示，执行协议来考验。实现革命大联合并不难嘛！”然而还是因为这样的策略没有涉及至关重要的许世友和杜方平问题，所以收效甚微。

## 12月下旬的突破

北京谈判最终在12月下旬获得突破。12月13日，军队学习班恢复“学习”。此后两派代表依然争执不休。那些被军区领导打成“反革命”的人散发材料揭发批判许世友的种种“罪行”，而许世友的支持者们则对杜方平和南空领导人展开新的进攻。在激烈的争吵持续了几周之后，毛泽东最终做出了他的决定。他的“最新指示”于12月下旬在军队学习班内进行了传达：“许世友不能打倒。南京军区不能打倒。许世友有错误，可以让他作检查。”（艾汉美《石头城的风雷》）

事后看来，毛泽东的决定很有可能源于常州局势的急遽恶化。地处苏南的常州市在7月份已经发生了一系列暴力冲突。8月间，当江苏“倒许”运动达到高潮时，当地各驻军单位也卷入了地方上的派性武斗。拥护许世友的二十七军所部支持“工农学”，而南京空军和江苏省军区所部则支持“大联筹”。南京两派签署“九四停火协议”后，常州两派却于9月11日再次爆发大规模武斗。周恩来指示“中央赴江苏调查组”赶赴当地制止武斗。然而直到10天之后，当地两派才勉强达成一项初步停火协议。此时冲突已造成78人死亡，沪宁铁路中断11天（《常州市志》，第三册，第1106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北京谈判久拖不决，导致常州派性冲突死灰复燃。12月下旬发生的数十起武斗事件再次阻断铁路交通。中央紧急增派二十七军所属部队赶赴常州，但是两派在当地驻军单位的支持下继续交战。在1968年1月的头几天，一伙“大联筹”成员公然与担任护路任务的二十七军部队交火，造成14人死亡，其中包括解放军战士。沪宁铁路常州段的运输因此中断2天（《常州市志》，第三册，第1107页）。

常州是连接上海和全国各地铁路交通的咽喉要地，而且中央高层显然担心当地重新爆发的大规模武斗向其他城市蔓延。12月28日，周恩来接见全国铁路运输系统和南京大学的造反派代表。他严厉批评了常州的两派群众组织，表示将向当地派出更多部队，并申明对军方的抵抗行动将不会继续得到宽容（《周恩来接见铁路运输系统造反派和军管会代表以及南京大学两派代表的讲话》，1967年12月28日，刊载于《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他还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二十七军是一支战功卓著的部队，文化大革命要立新功。”他当即命令江苏省军区和南京空军的部队于12月30日全部撤出，当地“支左”和军管任务由二十七军

统一担任（王晏《板荡识诚臣》，第108页）。他还命令六十军在南京及周边地区恢复秩序，特别是确保连接上海和华北铁路干线的长江火车轮渡畅通。最后，周恩来宣布六十军将派出“军训团”进驻南京大学（《周恩来接见铁路运输系统造反派和军管会代表以及南京大学两派代表的讲话》）。

12月28日接见表明，毛泽东最终决定依靠许世友的军队重建秩序。下一步工作就是落实毛泽东关于许世友的指示，让南京军区提交一份“自我批评”报告。杜平和他的秘书班子起草了一个报告底稿，承认军管会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具体内容包括在3月份错误地镇压了一些群众组织，和对反对许世友的军内造反派进行打击报复（赵玉祥《柳营梦》；艾汉美《石头城的风雷》）。许世友看到稿子后认为对军方的批评太过分了，拒绝将其读完。南京军区政委张春桥也否决了这个初稿，认为它对军方的错误上纲不够高。但对周恩来而言，这个稿子已经足够好了。在他授意下，这个稿子稍加修改后于1月6日上报中央（赵玉祥《柳营梦》；李文卿《近看许世友》，第102-103页）。1月26日，周恩来代表中央起草了一份批语，正式批准了南京军区的这份报告。中央的批语提到：南京军区领导人始终得到中央的信任，也始终忠于毛主席；尽管他们犯过一些错误，但是这些错误已经或正在得到改正（《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对南京军区党委“检讨报告”的批示》，1968年1月26日，刊载于《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这表明中央现在已经对有关许世友的争论作出裁决：尽管他犯过一些错误，然而这些错误还没有严重到要将他撤职查办。

### 分化瓦解“反许派”联盟

现在的当务之急是遏制“反许派”。这个工作从军队内部开始。周恩来于1月4日打电话给“屁派”代表，要求他们立即停止对杜方平的攻击，因为这是军队内部的事情（《南京风云》，《八二七战报》，1968年1月14日，第二版；陈克兴、罗世果《在阳光的照耀下》）。同一天，他又打电话给杜平，要求他尽快解决杜方平在8月份暴力事件中的责任问题，暗示中央为了解决南京两派的争端准备牺牲杜方平（《南京风云》，《八二七战报》，1968年1月14日，第二版）。周恩来还召见“南京军区21人赴京控告团”成员，承诺将为他们平反，但前提是他们停止反对许世友的活动（赵玉祥《柳营梦》；艾汉美《石头城的风雷》）。当时还有谣传，说周恩来考虑将反对许世友的南空领导人调到北京工作，从而使他们脱离许世友的势力范围（《坚决打倒杨、余、傅反党集团黑干将江腾蛟》，《星火燎原》，1968年6月14日，第四版；《坚决打倒江腾蛟》，《江苏红卫兵》，1968年6月27日，第二版）。这些谣言有助于削弱军内反对派对“好派”群众组织的支持（《打倒反革命分裂主义》，《江苏红卫兵》，1968年4月12日，第三版）。

其次，现在必须想办法打压“好派”势力。12月中旬，周恩来指示留在南京的“好派”头头们到北京参加谈判。此举意在消除当地“好派”对军管会的持续抵抗（葛忠龙访谈；耿昌贤《一个红卫兵的亲历》）。当“好派”主要头头们离开南京后，当地工厂和学校中的“好派”二线领导人纷纷表态愿意实行大联合（《历

史宣判了王高反革命集团死刑》；《南京文化大革命大事记》，第104页）。1月7日，周恩来就常州暴力冲突事件发出一个指令，敦促当地两派放下武器，揪出本派挑动武斗的“坏头头”，不准抵抗派去保护铁路的军队（《常州市志》，第三册，第1107页）。为了强化上述信息，上海三大报纸于1月10日发表联合社论，称常州武斗事件是“反革命事件”，并将罪责归结于几位暗中支持“大联筹”挑战二十七军的地方党政干部（《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文汇报》，1968年1月10日，第一版；《热烈欢迎上海三报编辑部重要文章发表》，《八二七战报》，1968年1月16日，第二版；《常州市志》，第三册，第1111页）。这无疑是向“好派”方面发出的一个明确信号——对中央指示的任何抵制行动今后都将被认定为“反革命”行动。镇江市是去年8月支持“倒许”的江苏省军区的势力范围。1月17日，周恩来和康生接见镇江市代表团成员，严厉批评了江苏省军区领导人，责令他们服从中央的决定、改正自己的错误（《中央首长接见驻江苏部队和镇江市代表团的讲话》，1968年1月17日，刊载于《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上述事件表明中央已经坚定地站在许世友身后。“屁派”方面采取主动，“热烈欢迎”上海三报文章的发表，并将这篇文章中提出的指控扩大到其他卷入“反许”活动的军队和地方干部（《联合起来，揪出黑手！》，《八二七战报》，1968年1月16日，第一版；《热烈欢迎上海三报编辑部重要文章发表》，《八二七战报》，同上，第二版；《把反革命组织“老人串联会”揪出来示众！》，《八二七战报》，同上，第三版；《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砸烂陈、包、张现行反革命集团》，《六一三战报》，1968年1月28日，第四版）。他们先后公布了两批名单，将数十位军地干部打成“黑手”（《江苏第一批黑手名单》，《江苏第二批黑手名单》，《南京八二七》，1968年1月30日，第四版）。“好派”头头们现在意识到，他们除了退却之外别无选择（耿昌贤《一个红卫兵的亲历》；耿昌贤访谈）。于是他们也在自己的报刊上发表文章，谴责那些因常州事件受到指控的干部，称他们是“叛徒”、“外国特务”和“历史反革命”（《关于现行反革命分子包厚昌政治历史问题的调查报告》，《农奴戟》，1968年1月25日，第三版；《关于陈扬隐瞒叛变革命情况混入党内的调查报告》，《农奴戟》，同上，第三版；《关于大叛徒李士英的调查报告》，《农奴戟》，同上，第四版）。

为彻底终结“谁应该为江苏的暴力冲突负责”的争论，周恩来、康生和其他中央领导人于1968年1月28日接见江苏军地代表团全体成员（不包括许世友）。周恩来在谈话中提到：“南京军区是长江的门户，江、浙、皖、上海三省一市，地处重要地位。最高统帅毛主席委任许世友同志担任军区司令员，他是久经战争考验的好同志，在这一点上必须肯定。……只是在去年一个时期，由于缺乏经验，群众工作生疏了，……就不免站错了队，有一段时间过早表了态，支持了一派，压制了一派，犯了错误。”周恩来还说：“南京军区的检讨报告是经过许世友同志，张春桥同志看过的，都同意这个检讨。中央认为这个检讨报告态度是好的诚恳的，认识是深刻的，我们同意这个检讨，你们应该欢迎这个检讨。”（《中央首长接见江苏赴京代表团的讲话》，1968年1月28日，刊载于《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光盘)

上述谈话确定了许世友的地位。然而接见的高潮，却是周恩来和康生突然出人意料地宣布两位干部是幕后挑动两派暴力武斗和阻碍“大联合”的“黑手”。

“好派”方面受到指控的是杜方平——“反许派”的领军人物；“屁派”方面受到指控的是高啸平——文革爆发后始终站在“屁派”一边的地方高级党政干部。当杜方平听到自己被宣布为“黑手”后，几次站起来试图申辩，但是都遭到喝止。江青大声叫道：“你不要解释！”周恩来呵斥他：“你回去检讨吧！”康生阴阳怪气地说：“好派要看清杜方平的假面目，他在北京与林杰勾结，反对中央文革，反对军区，反对许世友同志，搞了很多见不得人的事情。你们两派不能大联合，同杜方平有关。”周恩来和康生指示代表团成员，回去后要团结起来批判这两个“黑手”。他们还被告知，除了杜方平和高啸平之外，其他所有人都无需为过去的暴力事件负责。代表团成员一致表态支持中央的决定，同时也都暗暗地长舒了一口气（同上）。1月30日，中国农历新年，江苏代表团飞回南京。

### 向革命委员会迈进

在经历四个月的艰难谈判和激烈的派性争执后，中央高层最终促使南京两派达成妥协，并朝着下一个目标迈进——建立革命委员会和重建地方控制。表面上双方在北京谈判中打了个平手，然而许世友的反对者们得到的，仅仅是暂时豁免他们数月来暴力抵抗军管的责任。在许世友的权力得到巩固后，他们将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许世友通过几个深思熟虑的步骤，逐渐地重建他的权威。

第一，当地驻军限制了两派群众组织跨行业、跨单位协同行动的能力。按照北京谈判达成的协议，一系列相互独立的行业性“大联合”组织——如“工人大联委”、“高校大联委”、“中学生大联委”、“机关干部大联委”和“农民大联委”等——于2月份成立（《南京文化大革命大事记》，第107页）。这有效地瓦解了两派此前的跨行业联盟。其次，军队派出大批干部战士到工厂、学校、社区、机关和农村公社组织学习班，迫使所有派性活动积极分子返回他们的工作单位，阻断了跨单位的政治活动。有资料显示，截止3月份，仅南京一地就举办了13,000多个学习班，参加“学习”的干部群众多达780,000人（《石城内外一片红》，《新南大》，1968年3月23，第二版）。在两大对立派性组织的发源地南京大学，共举办了501期学习班（《全面落实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我校出现一派生机勃勃的革命景象》，《新南大》，1968年3月13日，第三版）。

第二，杜方平及其在军队中的同盟者们于2月份被踢出江苏省军管会。而新增的省军管会成员全部都是来自南京军区司令部、二十七军和六十军的许世友的忠实部下。下面各市、区、县的军管会也进行了类似的改组（《南京消息》，《八二七战报》，1968年2月29日，第四版）。南京还成立了一个警备司令部，负责收缴群众组织武器、镇压派性武斗，其首长也是许世友的亲信（《南京文化大革命大事记》，第108页）。

第三，2月份南京组织召开了一系列大规模的批判杜方平的群众大会。杜方

平在这些大会上遭到揪斗和殴打（《南京消息》，《八二七战报》，1968年2月29日；袁刚《风雨八年》，第105-107页）。杜方平曾在中央文革成员的暗地怂恿下，在1967年夏天支持“好派”与许世友对抗。而后他在北京的靠山因策动反军运动遭到清洗，使他深陷不利境地。现在他要为北京派性政争的潮汐变化付出代价。在批斗杜方平的同时，“屁派”方面还发起一轮宣传攻势，极力妖魔化那些与“好派”结盟的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南京文化大革命大事记》，第108页）。这更露骨地表明，与许世友对抗绝没有好下场。

在许世友尝试巩固其权威时，他对先前的一些政治对手采取了妥协姿态。中央“一·二八接见”后，许世友立即飞赴上海修复与张春桥和上海领导层的关系。他们曾在1967年夏天顺应北京的政治风向，支持许世友的反对派。许世友的外交努力有助于稳住这些潜在的敌人（李文卿《近看许世友》，第105页；邢文举《为中央文革做记者的日子（下）》，《老照片》，第60辑，第6页）。在南京，许世友对此前反对他的造反派头头们采取了类似的妥协姿态。在一次会议上，当“好派”头头们打算就1967年夏天的种种“错误”做自我批评时，许世友打断他们，说大家应该团结起来批判中央首长“一·二八”讲话中点名的两大“黑手”（《许世友吴大胜接见南京大专院校群众组织负责人时的谈话》，1968年2月15日，刊载于《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李文卿《近看许世友》，第105页）。为了避免与南京空军领导人再生龃龉，许世友下令批斗杜方平的大会不得提及任何杜在南京空军中的盟友（袁刚《风雨八年》，第107页）。

关于省革委会委员人选的谈判在上述背景下启动。2月间，一个由军队干部、造反派头头和“革命干部”组成的新的江苏代表团被派往北京。南京军区政委、江苏省军管会主任杜平再次被任命为代表团负责人。为确保谈判能顺利进行，这次选择的“群众代表”是若干比较听话的两派大头头和一批比较容易对付的基层单位头头。“好派”和“屁派”的一把手——文凤来和曾邦元——则被指定参加在南京军区招待所里举办的“群众组织负责人学习班”，无法对北京谈判施加影响（袁刚《风雨八年》，第108页和第111-112页；葛忠龙访谈。葛忠龙是江苏代表团成员）。

在“屁派”方面的举荐下，南京军区从旧省委干部中选择了一批拟结合的“革命干部”。其中最重要的三位是张仲良、许家屯和彭冲。他们原来都是省委书记处成员，曾在1966年春夏受省委指派领导文化大革命运动，而后在蓬勃发展的群众造反运动中被第一批打倒。因为他们垮台得早，是各派群众组织无暇顾及、也无意拉拢的“死老虎”，所以没有卷入1967年的派性政治斗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样的经历反而使得他们在当地派性冲突接近尾声时，成为两派都更易于接受的“革命干部”人选。而他们也乐于对自己在1966年应对群众造反运动期间犯下的种种“错误”作出极为夸张的自我检讨，同时对他们以前的顶头上司——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作出连篇累牍的揭发批判（《关于支持张仲良同志站出来革命的声明》，《星火燎原》，1968年2月28日，第一版；《解放许家屯》，同上；《解放彭冲》，《星火燎原》，1968年3月9日，第三版）。

其实并没有多少事情需要代表们协商。中央已经明确表态，许世友将被任命为江苏省一把手。所以真正可以讨论的问题，仅限于哪一位原省委领导班子成员可以被认定为“革命干部”并被授予重要职务。而且，那些在1967年投靠“好派”的干部早已被排除在提交中央的“拟结合”名单之外（李文卿《近看许世友》，第112页），所以“好派”代表们在谈判中能够起到的唯一作用，就是努力阻止他们认为对本派心存恶意的干部获得任命。当他们听说军方打算提名许家屯担任革委会副主任时，他们立即抛出一批“调查材料”，指控许家屯在解放前从事地下工作时形迹可疑，同时指控他在1966年挑动群众派性武斗。这一招果然奏效，很快便将许家屯挤出候选人名单。其后，“好派”代表采用类似的策略，阻止了对南京军区干部、许世友亲信梁辑卿的革委会副主任提名（李文卿《近看许世友》，第112-113页）。最终，在派性冲突中相对中立的彭冲获得双方一致认可，作为地方高级干部的唯一代表被任命为省革委会副主任（李文卿《近看许世友》，第112-113页；鲁学智访谈，南京，2008年2月28日。鲁学智是“好派”工人组织头头，曾参加北京谈判）。

这样一些小插曲对代表团的工作并无大碍。3月18日，他们向中央递交了省革委会组成提案。新的权力机构拟包含165名成员，其中有10个名额留待以后陆续增补。名单中共有“群众代表”95人，另有军队代表和“革命领导干部”代表各30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江苏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1968年3月20日，刊载于《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上述人事安排看似突显了“群众代表”的重要地位，然而他们在革委会中的“委员”身份主要是荣誉性的——未来的革委会不会定期召开全体会议，“常委”们开会的次数可能多一些，而真正的权力则掌握在“核心领导小组”（通常由革委会主任和副主任构成）手中。军队干部的数量在革委会委员中仅占18%，但是他们垄断了所有重要领导职位。许世友是革委会主任，四位副主任中除了彭冲之外也都是军队干部。革委会下设的办事组、政工组、生产指挥组和安全保卫组，组长全都是军队干部、许世友的亲信。没有一位造反派头头被任命为革委会副主任。南京“好”、“屁”两派最著名的领导人——文凤来和曾邦元——双双入选39人常委会，但都不掌握实权。文凤来是政工组下属的教育革命组副组长，曾邦元是政工组下属的文化宣传组副组长（《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江苏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江苏省革命委员会委员名单》，《革命工人报》，1968年3月28日，第二版；耿昌贤访谈；葛忠龙访谈；曾邦元访谈）。

3月20日，北京高层批准了最后的名单。第二天，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吴法宪、叶群、汪东兴和其他中央领导人接见许世友和江苏代表团全体成员，宣布了中央的批准决定（《中央首长接见江苏赴京汇报代表团暨江苏在京学习班的讲话》，1968年3月21日，刊载于《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随后，江苏代表团飞回南京参加3月23日在市中心鼓楼广场举行的庆祝大会，张春桥代表中央在大会上发表了主题讲话（《南京文化大革命大事记》，第111页）。这是全国获得批准的第17个省级革命委员会，中央还需要为

其余十二个省市的“大联合”谈判继续努力。《人民日报》社论宣称，江苏省革委会的成立是“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个伟大胜利”（《天翻地覆慨而慷——热烈欢呼江苏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人民日报》，1968年3月25日，第一版）。

### 派性抵抗

革委会的建立并未终止江苏的派性冲突，而是通过政治高压将这些冲突限制在各机关、工厂和学校内部。许世友和他的部下们继续致力于镇压反对派。他们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才借助激烈的派性斗争手段实现其目标。那些在1967年8月“倒许”运动中发挥积极作用的人们，在军方的镇压行动中首当其冲。

造反派头头们普遍存在不满情绪。那些当选革委会委员的造反派头头知道他们的职位纯粹是荣誉性的。1968年5月，省革委会组织其成员赴上海学习先进经验，使得这种不满情绪变得更加强烈。返回南京后，两派头头们一致公开赞扬上海经验。与江苏的情况不同，上海的造反派头头们——其中最著名的是王洪文——显然都掌握实权（袁刚《风雨八年》，第115页。这些关于上海经验的印象与Elizabeth J. Perry和李逊的研究吻合，详见Elizabeth J. Perry and Li Xun, *Proletarian Power*, pp. 145-171）。原“好派”成员们的不满尤甚，因为他们意识到他们是其所在单位“斗、批、改”运动的主要目标。当他们返回自己的单位后，常常不得不为生存而战。

当时的一个热点问题，是针对南京空军领导人江腾蛟、王绍渊、高浩平的大批判运动。3月底，北京宣布揪出所谓“杨、余、傅反党集团”。4月份，南京军区领导层不失时机地指控“江、王、高”是“杨、余、傅”的同谋——因为余立金曾任南京空军政委。中央随即宣布这三人停止工作，接受审查（《南京文化大革命大事记》，第114页）。原“好派”成员意识到如果听任事态如此发展，他们很有可能成为自己所在单位正在蓬勃开展的“清队”运动的目标。于是他们发起绝地反击。

这样的斗争偶尔也会导致暴力冲突。在1968年4至7月间，南京至少发生了五起较大规模的冲突（《南京文化大革命大事记》，第113-124页）。不过由于跨行业群众组织已经遭到瓦解，这些派性冲突都发生在各单位内部，而非像以前那样的街头混战。第一次冲突于4月23日发生在南京无线电学校——当地“好派”重镇之一。当省革委会宣布全面发动批判“江、王、高”的运动后，该校“好派”积极分子贴出大字报质疑这场运动。校内“屁派”成员试图阻止他们。双方随即拳脚相向，一位“屁派”成员被打伤。军方派出部队前往该校捉拿“肇事者”，附近其他单位的“好派”群众闻讯后纷纷赶来阻止。双方形成对峙，恶战一触即发。革委会不得不请革委会委员、“好派”头头耿昌贤进行斡旋，才避免事态恶化（《南京文化大革命大事记》，第114页；耿昌贤《一个红卫兵的亲历》）。5月4日，一场类似的派性冲突在“好派”另一重镇、大型军工企业南京3503厂发生。军方派人前往现场干预。该厂“好派”则动员大批群众前往省革委会门前示威（《南京文化大革命大事记》，第115页）。7月初，当地又爆发了几次类似冲

突，一位“屁派”学生在其中一次冲突中死亡（《南京文化大革命大事记》，第120-122页）。

一种不太暴力的派性斗争表现方式，是“好派”头头们策动的一场短暂的“大批判”运动。一个“好派”工人组织于5月间散发材料，严厉谴责几位被结合进省革委会的地方党政干部，宣称他们是“走资派”和各种阴谋活动的“后台老板”。“屁派”方面立即予以反击，指责“好派”的所作所为是对新生的革命政权的恶毒攻击（江苏省水利厅八二七支队“捉爬虫战联”《“110战联”还是放老实一点！》，传单，1968年5月22日；南京八二七革命串联会工人接待站328部队《这样拼命的结果必定送命——一评新工总110战联“拼命”大字报》，传单，1968年5月；南京八二七工人革命串联会924部队《真假揪“王高”》，传单，1968年5月23日；袁刚《风雨八年》，第112页）。6月份，南京大学一个“好派”组织在文凤来、张建山的鼓动下贴出大字报，指责针对南空领导人的批判运动偏离了阶级斗争大方向，是企图借助批判“江、王、高”搞垮一派群众组织（《从江、陈开刀，直捣刘邓黑司令部》，《新南大》，1968年6月22日，第三版）。“屁派”方面谴责这张大字报企图为反革命分子翻案，恶毒攻击许世友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魏东平《“仍从容”为谁招魂》，《江苏红卫兵》，1968年6月13日，第二版；《必须从“王高”开刀》，《新南大》，1968年6月22日，第三版）。上述激烈辩论还延伸至革委会内部。在一次省市革委会联席会议上，文凤来借汇报情况之机，重述了“好派”方面关于革委会“复辟资本主义”和“压制造反派”的批评。忠于许世友的军方委员们随即作出强烈回应。双方的激烈辩论持续了三天（袁刚《风雨八年》，第112-113页）。这样的“文斗”直到夏天都没有平息，因为“好派”始终认为革委会不过是镇压他们的一个工具（《“以我为中心”论的要害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新南大》，1968年8月8日，第三版）。

这种久治不愈、反复发作的基层派性冲突令军方领导人十分恼火。但他们当时所能做的，不过是举办更多的学习班。许世友在8月份的一次谈话中提到，尽管办了1,500,000多期学习班，“但革命大联合不巩固，革命三结合搞不起来，生产搞得也不好，革委会有丢权垮台的危险”（《许世友在江苏省首次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经验交流会上的讲话》，《新南大》，1968年8月8日，第一版）。他的一个部下则抱怨：由于派性没有消除，省市革委会的一些指示传下去后就变样了，或者被单位头头们的派性顶住了（袁刚《风雨八年》，第113页）。由此可见，尽管街头混战停止了，然而革委会在基层的权威依然十分脆弱。

### 强化控制

7月3日和24日，中央高层发布了两个措辞强硬的《布告》，授权广西和陕西驻军采取任何必要手段制止当地的派性武斗。与此同时，毛泽东在7月底接见首都红卫兵“五大领袖”时也发出类似的警告。许世友抓住这个机会，采用更加严厉的手段对付反对派。7月底，省市革委会在南京的委员们被全部拉到郊区举办学习班。许世友于8月9日莅临学习班发表谈话，声色俱厉地批评南京“好派”

头头文凤来、张建山、朱开地和鲁学智，说与他们的斗争是“两条路线斗争”，并提出把他们送回原单位接受群众批判（《许世友在江苏省革命委员会常委会上的讲话》，1968年8月9日，刊载于《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朱开地是南京“好派”著名工人组织“新工总”头头）。第二天，南京大学一个“好派”组织为了表示与“好派”领导人彻底决裂，贴出大字报指控文凤来和张建山是“坏头头”（《南京大学红四联“乘胜前进”战联关于批斗坏头头文凤来、张建山严正声明》，《江苏红卫兵》，1968年8月15日，第二版）。

8月13日，军方召集省市革委会全体成员和各大群众组织负责人开会，议题是“团结广大人民群众向阶级敌人发动猛烈进攻，粉碎反对省市革委会的反革命逆流”。一位军方领导人在会上宣称，革委会内部存在着“两个司令部”，文凤来和朱开地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头头，他们卷入了反对合法政权的秘密阴谋活动。两天后，南京市革委会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批判“好派”反对革委会的罪行，朱开地和鲁学智成为主要目标（《南京文化大革命大事记》，第126-127页）。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针对每一位“好派”头头的公开谴责。有人提出要彻底调查他们的“罪行”，并分别召集大会对他们进行批斗（《江苏红卫兵》，1968年8月15日，第一至第四版；另见《南京文化大革命大事记》，第127页）。

在北京下令向学校和工厂派驻“工人和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后，南京当局立即加以贯彻执行，并借此发起进一步打击反对派的运动。9月份，新成立的红代会、工代会和农代会正式兼并了所有群众组织，并查封了他们主办的各种出版物（《南京文化大革命大事记》，第127-131页）。当局镇压反对派的努力还得益于大批大中学校停摆。从1968年下半年开始，南京许多高校的学生纷纷毕业离开南京，而许多中学生——甚至包括一些初中生——则被下放农村（《南京文化大革命大事记》，第130页）。因毕业分配离开南京的“好派”头头包括张建山（被分配到东北山区的一个林业队）、葛忠龙（苏北一个军垦农场）和耿昌贤（皖西一个军垦农场）。（葛忠龙访谈；耿昌贤访谈；耿昌贤《一个红卫兵的亲历》）其他学生和学校教职员工则被送到厂矿企业和农村参加劳动锻炼，直到1970年前后才陆续返回学校。

许世友还逐步加强其对军队的控制。4月份反对南空领导人的这场斗争是第一步。江腾蛟后来逃往北京，得到林彪的保护，被任命为解放军空军政治部党委书记（百度百科，《江腾蛟简历》，<http://baike.baidu.com/view/23828.htm>）。高德明《不该被历史遗忘的高浩平之死》，《党史博览》，2010年第12期，第27-28页）。许世友随后对江腾蛟的部下和其他军内反对派大加清洗。从1968年4月至12月，南京军区组织了四个大型学习班。其中最大的一个学习班位于南京东郊，关押着500多名军内反对派干部战士，包括一批1967年8月“倒许”运动的领军人物。他们的“学习”过程非常残酷，包括各种精神和肉体摧残。这样的做法显然引起北京高层的关注。1969年1月，中央军委下令南京军区学习班全部改在北京举办。在经历一个相当温和的自我批评过程之后，绝大多数学习班成员都获准恢复原职（高德明《不该被历史遗忘的高浩平之死》；赵玉祥《柳营梦》；艾



汉美《石头城的风雷》)。1969年8月,鉴于中苏边境的紧张局势,中央下令加强军队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并主张采用强硬手段制止影响部队团结的军内派性问题(《中央军委关于加强全军组织性纪律性的指示》,1969年8月22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命令》,1969年8月28日;上述文件均刊载于《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许世友抓住这个机会,强迫那些参加过学习班的军内反对派们提前退伍、转业或复员(赵玉祥《柳营梦》;艾汉美《石头城的风雷》)。

对反对派的最后一击是“清查五一六”运动。这场运动于1970年春天在全国范围发动,不过江苏的运动情况异乎寻常地惨烈。根据事后官方公布的统计数据,江苏在这次运动中受到牵连的人数超过130,000,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中名列前茅(刘定汉主编《当代江苏简史》,第235页,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潘祝平《江苏清查“五一六”冤案》,《炎黄春秋》,2007年第11期,第63-66页。另见Roderick MacFarquhar and Michael Schoenhals, *Mao's Last Revolution*, p. 237)。当地的清查运动在1970年底达到高潮,然后间歇性地持续到1973年。运动一开始,所有南京“好派”重要头头——包括已经被分配到外地工作的张建山、葛忠龙和耿昌贤——统统被揪回南京接受“专案组”的隔离审查。文凤来和戴国强(“好派”头头、新华社江苏分社记者)则被关进南京老虎桥监狱(葛忠龙访谈;耿昌贤访谈;戴国强电话访谈,南京,2008年7月12日)。投靠“好派”的地方党政干部和那些在1967年夏天支持“倒许”的人,都遭到隔离审查和刑讯逼供。包括南京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史景班、杜方平和高浩平在内的一批军队高级干部被关进军中监狱。高浩平在监禁期间死亡(高德明《不该被历史遗忘的高浩平之死》)。与他们有政治牵连的人,以及那些在1969年被迫离开军队的人,只要其所在的工作单位地处江苏境内,都成为本单位清查运动的重点目标。其中有些人还被押回南京接受审讯(赵玉祥《柳营梦》)。

## 结论

本文关于一个省级革命委员会形成过程的叙述,充分揭示了1967年中国派性问题的性质。围绕北京谈判的斗争突显了这些冲突背后的若干核心诉求。令人印象最深刻的一点是,双方的派性立场几乎完全不涉及重大的原则问题或实质性的政策问题。他们在文革前中国政治秩序的性质、这种“党/国”体制在多大程度上沾染修正主义和背叛毛泽东思想、或者在重建秩序后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劳动政策、干部政策或教育政策等问题上,并不存在分歧。双方的派性论战根本就没有提到上述问题。归根结底,两派群众组织曾在1966年联合推翻旧的地方党委。他们的分裂仅仅源于1967年“一·二六夺权”,以及他们对南京军管当局的不同态度。

显而易见,地方性政治问题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尤其值得关注的,是1967年“一·二六夺权”前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以及南京军区在执行北京军管命令时所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双方在北京谈判期间最为关注的问题是:1967年夏天的暴力冲突是如何发生的,以及中央将如何评判促使江苏各派政治势力分



化重组的“倒许”运动。这样的不同意见仅仅涉及两派成员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所作所为。换言之，导致分歧的政治身份认同形成于文化大革命爆发以后——即具有相同背景的人们在运动发展过程中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因而，一部分学生造反派反对另一部分学生造反派，一部分工人造反派反对另一部分工人造反派，垮台的省市干部们为了保护自己加入了不同的群众派别，来自同一个司令部的军队干部们也被分裂为对立的两派。

在群众派性冲突的最后阶段，双方最关心的是本派此前的政治选择和行动将会得到怎样的评价。他们在谈判时都清楚地意识到，这样的判决将对所有运动参与者的未来生活产生巨大的影响。“政治野心”——“后毛”时代初期中国官方文献对造反派头头行为动机的归纳（在南京的造反派头头后来被判入狱时，他们的动机被归结为“政治野心”。具体的例证，详见《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检察院起诉书》〔1979年12月24日〕和《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1979年12月29日〕对曾邦元的指控），同时也是许多关于文革派性冲突的学术论著的共同看法（例如，王绍光在 *Failure of Charisma* 一书第170-171页写道：“造反派头头们希望获得权力。这倒不是因为他们需要借助权力去实现诸如变革现存体制之类的崇高目标，而只是因为他们渴望权力……他们开始觉得，这场运动是他们取代那些旧当权派的一个天赐良机……他们只是想成为新的当权派。”）——在本文的叙述中几乎未见踪影。两派竭尽全力地拼杀，无非是为了确保对方不会获得权力，从而避免使本派沦为牺牲品。中央只不过在两派中指定了个别替罪羊，便足以使第一轮谈判达成妥协。从这一点可以看出，这种派性斗争的基本动力不是追求权力，而是自我保护。

这个过程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北京高层为促成一个暂时性的妥协居然需要花费如此漫长的时间。本文叙事所展现的一个重要维度是，当两派代表意识到敌对状态即将结束时，反而强化了本派的谈判立场，并不断地向对方发起新的攻击。这种短期结果看起来有悖常理，因为中央高层从一开始便竭力表明一种不偏不倚和不愿先入为主的立场。然而，更加深入的考察显示，正是意识到派性争斗终结的最后期限日益迫近，双方才会更加急切地希望在谈判桌上赢得主动。而中央的中立姿态却使两派误认为中央在一系列问题上依然犹疑未决，可以继续对它施加本派的影响。类似的动因在北京的学生派性斗争中也有所展现。

本文叙事所展现的另一个重要维度是，北京当局显然不太愿意依托军管方式实施赤裸裸的暴力统治。这无疑源于北京大人物们之间的分歧。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把“造反”看作原则问题，对军方的强势介入和另外一些官员急于重建秩序心存疑虑。北京领导层内部各种势力的相互抗衡注定了江苏谈判的旷日持久和艰难曲折。

然而即使在毛泽东作出他的决定后，许世友依然不得不逐步地、谨慎地巩固自己的权力。因为他意识到，对当地反对派的暴戾镇压可能导致事与愿违的后果，促使那些依然位高权重的大人物——如曾经支持“好派”反对他的张春桥——撤回对他的暂时支持。所以，许世友慢慢地收紧其控制，利用1968年中央关于秩

序问题的强硬命令、1969年中苏边境冲突和1970年“清查五一六”运动渐次消灭所有反对派。尽管革委会的统治是一种难以掩饰的军事独裁，但是从江苏的个案不难看出，军事独裁局面的形成需要经历几个阶段。

要厘清造成江苏群众派性组织分裂的那些复杂因素，需要透彻了解一系列相关事件——如造反派势力如何在1967年1月夺权前后发生分裂，以及他们随后如何在军队“支左”问题上选择立场。就本文而言，还需要透彻了解1967年8月的“倒许”运动，以及卷入这场冲突的两派群众组织主要头头和军方主要领导人物的个人情况及性格。这些无疑都是些地方性的问题。我们推测，在中国许多其他持续存在派性冲突的省份，这段时间的事态发展并不一定都与江苏的情况相同，而是会呈现出它们各自的内在逻辑理路。这或许解释了为什么现有研究论著对革命委员会的形成过程大多语焉不详。从北京的视角出发，要对这样的过程作出一个宏观的、整体性的描述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二十几个省市代表团谈判所涉及的都是这些省市的地方性问题，而局外人常常将这些问题混为一谈。然而采用自下而上的视角去考察一个省的情况，这样的过程却十分清晰。

---

【文摘】

## 社会史视野下的文化大革命研究

董国强

按：原载《中共党史研究》2012年第二期。本刊有删节。

### 一、相关研究产生的背景及其现有的解释体系

根据笔者的长期观察，按照研究理念和研究路径的不同，目前国内外学界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较为传统的“精英政治”研究。这类研究关注的重点是中共党内高层分歧的由来与发展，以及由此所引发的政治冲突和阶段性的主要矛盾变化。这类研究的代表性论著包括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Roderick MacFarquhar,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4—1997)、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8年)、金春明《文化大革命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5年)、麦克法夸尔和沈迈克《毛最后的革命》(Roderick MacFarquhar and Michael Schoenhals, Mao's Last Revolu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佛里德里克·泰维斯和孙万国《毛时代的终结》(Frederick C. Teiwes and Warren Sun, The End of the Maoist Era: Chinese Politics during the Twilight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972—1976, M. E. Sharpe, 2007)等。二是由社会史视角切入(同时带有显著的地方史研究特色)的群众运动研究。这种研究关注的重点是一般社会公众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反应和抉择，以及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对地方政治发展、经济建设、社会生活和人际关系的实际影响。这类研究的代表性论著包括

陈佩华、李鸿永、骆斯典等人关于广州红卫兵运动的研究（参见 Anita Chan: *Children of Mao: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Activism in the Red Guard generati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77. Hong Yung Lee: *The Politic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 Case Stud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Stanley Rosen: *The Role of Sent-Down Youth in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Case of Guangzhou*,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1）、吉斯·佛斯特关于浙江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研究（Keith Forster: *Rebellion and Factionalism in A Chinese Province: Zhejiang, 1966-1976*, M. E. Sharpe, 1990）、王绍光关于武汉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研究（《理性与疯狂》，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Shaoguang Wang: *Failure of Charisma: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Wuha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裴宜理和李逊关于上海工人造反派的研究（Elizabeth J. Perry and Li Xun: *Proletarian Power: Shanghai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Westview Press, 1997）、安德鲁·维尔德关于北京高校红卫兵运动的研究（Andrew G. Walder: *Fractured Rebellion: the Beijing Red Guard Movemen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何蜀关于重庆红卫兵运动的研究（《为毛主席而战：文革重庆大武斗实录》，香港三联书店，2010）和启之（吴迪）关于内蒙古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研究（《内蒙文革实录：“民族分裂”与“挖肃”运动》，香港天行健出版社，2010），等等。当然，上述类型划分并不是绝对的。从现有的大量相关研究论著不难看出，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精英政治”和“群众运动”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内在关联。如果完全采用单一的视角和路径，许多问题是无法讲清楚的。

在笔者看来，以社会史、地方史视角切入的相关研究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至 80 年代初蓬勃兴起，主要基于以下几点理由：

第一，随着社会科学（尤其是社会学、人类学）的发展，及其理论与方法向人文研究领域的扩张与渗透，导致人们对“历史”概念和史学研究的认知的显著变化。一些研究者开始自觉地将关注的焦点由少数精英人物转向一般社会公众，由重大事件本身转向其对日常生活的影响。

第二，毋庸讳言，在目前的档案管理和信息披露制度之下，由社会史和地方史视角切入进行研究，在史料和其他相关信息的获取方面无疑具有更多的便利。例如，以各种方式保存下来的大量文化大革命期间群众组织出版物、传单、大字报底稿和一些文化大革命风云人物的笔记、日记等，在记述地方上一些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谈判活动方面具有着类似档案资料的功能。另外，由于地方性文化大革命叙事的政治敏感性相对较弱，一些公开出版的地方史志资料对当地群众运动的情况有较为详细的记载。细心的研究者往往可以从这些资料中发现非常重要的线索。

第三，以社会史和地方史的视角切入，可以更广泛地采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方法。通过对大量文化大革命亲历者的深度访谈，研究者可能获得更多的第一手资料。关键人物的口述历史往往包含着大量的背景信息，有助于我们正确解

读历史文献字面背后的特定含义。

第四，一些重要的文化大革命亲历者，尤其是一些著名的造反派头头，近年来也利用各种途径（如网络媒体、港台出版和个人印刷等）发表他们的文化大革命叙事作品。撇开其中所包含的派性偏见和个人申诉等因素，这些带有回忆和反思性质的文字，对于我们了解当地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无疑大有帮助。

综合上述各种来源、形式各异的资讯，研究者完全有可能客观地重构再现地方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的历史图景。在现有的相关研究中，有两类著述值得我们特别关注。一是以李鸿永、骆斯典、陈佩华等人为代表。他们基于对广州地区红卫兵运动的实证研究，在 80 年代提出了著名的“**社会冲突理论**”。按照他们的解释，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和派性冲突的发生，与此前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有关。简而言之，在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基于家庭出身、个人政治表现和社会关系网络等因素，一部分社会群体成员在现行体制中享受特权、得到好处，另一部分社会群体成员则在现行体制中遭到排斥、到处碰壁。因而文化大革命运动一来，那些受到排斥的社会群体成员便成为“造反派”，而那些得到好处的社会群体成员则成为“保守派”。两种社会势力的冲突不断升级，最终形成冰炭水火不相容之势。尽管在文化大革命各阶段，两派的争执焦点随着主流舆论的导向不断变化，但是两派的基本立场和派性认同是始终一贯的。二是以刘国凯、杨小凯和郑义等人为代表。他们主要基于个人经历和个人观察，在 90 年代至本世纪初提出了“**两个文革说**”。这种解释体系一方面延续了“社会冲突理论”的基本观点，认同文化大革命前的社会分化与社会冲突，另一方面则强调，文化大革命期间群众性的造反运动并不完全是对主流舆论导向的盲从，而是对高层文化大革命号召的策略性运用。换言之，文化大革命运动在两个不同的层次上平行展开：上层文化大革命本质上是毛泽东试图利用群众运动打倒所谓党内走资派；而下层文化大革命本质上是一场民众革命运动。“造反派”群体在主观上具有颠覆现行体制的自觉，不过为了获得政治上的合法性掩护，他们策略性地利用了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号召。

笔者认为，从社会史、地方史视角切入的相关研究，大大拓宽了我们的学术研究视野，带有史学观念革命的性质，值得大力肯定。但在具体的研究路径和观点结论上，“社会冲突理论”和“两个文革说”似乎带有以偏概全的倾向。其突出的潜在弊端，是有意无意地赋予文化大革命运动以某种历史进步意义。以下，笔者将结合南京地区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的个案研究，一方面检验现有认知体系的各种得失，一方面对文化大革命运动作出新的全面反思与历史评价。

## 二、相关研究关注的主要问题及南京个案的实证检验

以精英政治视角为切入点的研究，主要关注党内高层分歧的由来与发展，以及由此引发的政治冲突和阶段性的主要矛盾。而以社会史、地方史切入的研究，则主要关注一般社会公众（包括地方上中高级领导干部）对中央号召的反应和抉择，以及由此引发的派性冲突和社会动荡。其阶段划分和论述重点分别是群众运

动的发动和以学生为主体的群众性造反运动（1966年6月至10月）、群众运动向社会各界蔓延（1966年11月至12月）、群众组织向地方党委夺权（1967年1月至2月）、军队的介入与群众派性武斗的不断升级（1967年2月至8月）、群众运动合法性的终结（1967年秋至1968年底）、对群众派性头头的反复打压（1968年至1973年）、群众派性斗争的持续存在与最后消亡（1974年至1976年）。由以上时间简表不难看出，群众运动的发动只用了半年多的时间，而遏制消解群众运动的努力，则持续了九年多的时间，直到毛泽东去世和文化大革命终结。如果跳出具体的史实叙述，从理论层面上进行分析与归纳，以社会史、地方史视角切入的研究所关注的主要问题是：①何谓造反？为什么造反？向谁造反？②为什么卷入运动的干部群众会形成派性冲突？③群众派性冲突持续存在的基本动力是什么？为什么时隐时现的地方派性冲突与文化大革命运动始终相伴？

（本刊注：以下对南京大学、南京师院附中和南京长江机器厂三个单位群众运动情况所作的分析探讨在本专辑中《南京文化大革命冲突的起源》一文里有详细内容，故此处作了删节）

.....

以上论述内容，实际上重复验证了王绍光在《理性与疯狂》一书中提出的一个重要观点，即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群众运动整体上看似杂乱无章的表象背后，每个个体的抉择其实都遵循着某种理性，都经过某种计算。归根结底，人们的抉择与其当时所处的特定地位和处境有关。这个观点常常遭到一些文化大革命亲历者的批评和质疑，乃是因为有些人不愿意坦然承认这一点，而另外一些人则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一点。

然而“社会冲突理论”并没有对以下两个问题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一是为什么每个个体参与者的理性抉择，并未造成整个群众运动走势的理性发展？最早提出这个问题的王绍光在《理性与疯狂》一书的最后，从“个人崇拜的两个向度”、“不一致的目标”、“不适当的纲领”、“畸形的传播媒介”、“靠不住的执行机构”等角度展开的理论探讨，因过于简单抽象，多少给人以凌空蹈虚之感。二是为什么在“保守派”势力随着地方党委垮台以后，群众性的派性斗争依然持续存在？群众派性斗争的持续动力是什么？在王绍光和其他一些“社会冲突理论”倡导者的叙述中，一般将1967年“一月风暴”以后持续的群众派性冲突，解释为此前“造反派”和“保守派”两大势力对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变态延续。这种解释体系近年来遭到另外一些实证研究成果的质疑与挑战。南京地区的个案也不支持这个解释框架。

以下，笔者将根据南京地区的情况，对上述两个问题作出探讨。

第三，群众派性冲突持续存在的基本动力是什么？为什么时隐时现的地方派性冲突与文化大革命运动始终相伴？

从中央高层的动向看，在1967年“一月风暴”前后，特别是各地的“夺权”斗争发生以后，毛泽东就有意收缩群众运动。中央在1967年初发出的一系列文件和指示，可以充分证明这一点。而“三支两军”的提出与实施，则是依托军队

重建各地政治秩序、生产秩序和社会秩序的一个重要具体步骤。后来发生了“怀仁堂事件”，加上各地军管部门在恢复秩序的过程中过分扼制造反派，引起毛泽东的担忧。他一度在重建秩序和“继续革命”之间举棋不定。不过在“武汉事件”平息后，他最终下决心依靠军队终止群众运动。1968年春夏发动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将斗争矛头由“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转向所谓“叛徒”、“特务”、“阶级异己分子”、“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和“群众组织坏头头”等，与文化大革命初期的舆论导向大异其趣。在1970年以后持续数年的“清查五一六”运动中，各地许多群众组织头头纷纷落网，无疑是旨在终结群众运动的铁腕措施。然而这些举措只是暂时遏制了群众派性斗争，并未达到根除的目的。在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和1976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期间，许多地方的群众运动和派性冲突发生强劲反弹。以下，笔者以南京个案为例，探讨群众运动和派性斗争持续存在的动力。

在1967年初“一三事件”后，南京的“保守派”群众组织很快土崩瓦解。但是当地的群众派性斗争并未终结，而是发展转化为省“红总”和“南京八二七”之间的冲突与对抗。究其原因，这两大“造反派”组织在反对“保守派”的斗争中存在同盟关系，但在影响和操纵当地群众运动方面，双方又存在着潜在的竞争关系。因而在“一·二六夺权”前后，双方在由谁领导“夺权”的问题上（连带的问题，是谁将在未来的过渡性权力机构中发挥主导作用）各执己见，争执不下。在协商无果的情况下，居于少数地位的“南京八二七”及其同盟者以退出“夺权”为要挟，试图迫使省“红总”方面让步。而以省“红总”为首的多数派不为所动，断然实施“夺权”行动。由此在当地形成所谓“好派”和“屁派”——“好派”宣称“一·二六夺权好得很”！“屁派”则认为“一·二六夺权好个屁”！很快，双方由“文斗”转入“武斗”，冲突的规模不断扩大，当地的社会秩序和生产秩序受到严重破坏。周恩来曾用“内战”来形容当时派性斗争造成的混乱局面。

在此背景下，中央于3月5日宣布对江苏实行军管。当地的权力由南京军区和江苏省军区干部组成的军管会接管。在“好派”组织看来，这样的处置显然违背了“一月风暴”期间主流媒体大肆宣扬的“一切权力归造反派”的舆论导向。而军方为巩固其权力而实施的“三月镇反”，更强化了“好派”的抵触情绪。与此同时，一度受到“好派”排斥镇压的“屁派”，则试图依附军方势力，在反对“好派”的斗争中取得胜利。于是两派便由“好”、“屁”之争迅速转化为“拥护军管”与“反对军管”之争。军管部队也由此越来越深地陷入难以解脱的矛盾之中。毛泽东担心冲击过军事机关的“造反派”会受压制，因而4月初，中央的舆论导向再次发生变化。《人民日报》发表《正确对待革命小将》社论。中央军委随即出台了《军委十条》，强调对过去冲击过军事机关的造反派组织概不追究。“好派”方面抓住时机卷土重来，不断制造事端挑战军方的权威。军方被新出台的《军委十条》束缚住手脚，只能暗中支持“屁派”与“好派”进行对抗。当地的群众派性冲突因而愈演愈烈。武汉“七二〇事件”发生后，《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相继发表社论《向人民的主要敌人猛烈开火》，公然鼓动“揪军内一小

撮”。南京的“好派”再次利用中央舆论导向，在当地策动了声势浩大的“倒许（世友）”运动。如果不是毛泽东直接出面干预，南京的军管政权必将重蹈省市市委的覆辙。值得注意的是，《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社论，不但对“好派”群众组织产生误导，而且在遭到军方排斥的地方干部群体和军队干部内部中也造成思想混乱。结果，有不少军地干部程度不同地卷入了8月间的“倒许”运动。这无疑使当地的群众派性斗争变得更为错综复杂。

“倒许”运动平息后，中央召集南京各派势力赴北京谈判。经过中央领导人反复做工作，终于在1968年3月成立了以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为首、由军队干部、地方干部和造反派头头“三结合”的省革委会。在此前后，地方各级革委会纷纷成立。然而这样的政治安排，并未真正达到“大联合”的目的。此前运动中形成的裂痕，引发了各级革委会内部一系列明争暗斗。在1968年至1973年之间，中央倡导的“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运动，特别是持续数年的清查“五一六”运动，使刚刚经历了“天下大乱”的人们又置身于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的严酷氛围之中。1968年“大联合”时结合的地方干部被逐步地边缘化。而群众组织头头则在一系列后续运动中全部受到审查，有些在单位内部遭到“群众专政”，有些被关进监狱。上述铁腕措施造就了暂时的、表面的社会安宁，但是潜在的不满也在不断积聚，为后来的反弹孕育了巨大的能量。

1974年初中央发出“批林批孔”运动的号召后，被边缘化的地方干部群体和遭到审查的造反派群体闻风而动，借口“清查与林彪有牵连的人和事”，对当时掌握当地党政军大权的军队干部展开“革命大批判”。在中央的直接干预下，江苏的党政大权于当年11月重新落入地方干部之手。而在军管时期被打成“群众组织坏头头”、“‘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人，则在这场运动中获得平反。不过那些曾经在各级革委会中担任过领导职务的“造反派”头头们提出的“恢复原职务和原待遇”的要求，并未得到满足。这又为1976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期间的激烈冲突埋下了伏笔。

当我们试图在南京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回答一些理论问题时，我们当然应该充分意识到，每一个地方个案都必然地带有其显著的地方性特点。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在军队干部、地方干部、造反派头头这三种势力之间，以及在这三种势力内部，矛盾关系的基本模式及其阶段性发展的大体脉络，各地的个案也呈现出一些共同的特征。因而下面的两点认识可能带有相当的普遍性。

**第一，为什么群众派性斗争会持续存在？**群众派性冲突之所以持续存在，是因为派性问题不仅仅存在于群众组织之中。事实上，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从中央领导层到地方上的干部群体，从地方干部群体到军队干部群体，都因为认识的分歧或利益的冲突，存在着隐蔽的或公开的派性冲突。这样的派性冲突与群众组织间的派性冲突同时存在，共同构成一个多层的、复杂的关系矩阵。其中每一个因素的每一个行动，都会引发一系列复杂的连锁反应。质言之，群众派性冲突的存在，与干部派性冲突的存在有关。地方派性冲突的存在，与中央的派性冲突有关。

**第二，为什么每个参与者的理性抉择，并未造成整个群众运动走势的理性发**



展？上述悖论的形成，根本源于文化大革命理念本身的含糊性以及中央领导层对地方群众运动的非体制性干预。文化大革命理念本身的含糊性，为各种势力出于自身需要、自主诠释中央指示精神提供了巨大的空间。高层的非体制性干预在很多情况下造成运动发展的突然逆转，使得具有理性思维的人们常常感到进退失据、无所适从。在这种情况下，个人的每一次抉择都变成一场无法预计后果的赌博。因而最初具有相同利益诉求的群体会逐渐分道扬镳，而最初具有不同利益诉求的群体会逐渐成为盟友，都是不难理解的。质言之，缺乏客观的、恒定的、公认的行为准则，是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无序发展的最基本解释。

### 三、对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整体性反思

在前文的叙述与分析中，笔者已经对现有的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认知体系作出了一些零散的批评。这里再系统、概要地总结一下笔者对“社会冲突理论”和“两个文革说”的商榷。

第一，“社会冲突理论”强调，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群众派性冲突与文化大革命前的社会分化和身份认同有关。该解释体系还认为，军管时期“拥军派”与“反军派”之间的冲突是此前“保守派”和“造反派”冲突的变态延续。这种整齐划一、逻辑连贯的解释，显然忽略了文化大革命运动整体上的非理性特征。南京个案显示，即使在文化大革命的最初阶段，由于文化大革命理念本身的含糊性与单位内部固有矛盾的存在，群众派性斗争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模式，所谓“造反派”与“保守派”概念具有显著的交互性和兼容性——关键问题是看“为什么造反”和“向谁造反”。第二，由于当时中国社会各阶层、各群体处于同样的宏观政治环境中，因而各阶层、各群体成员所面临的困境和抉择也是大体相似的。所以所谓“派性问题”不但广泛存在于学生群体、工人群众内部，而且广泛存在于中央干部、地方干部、军队干部群体内部。第三，由于中央领导人非体制性干预常常造成运动走势的突然逆转，因而人们不断地面临新的困境与抉择，所以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派性冲突和个人身份认同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频繁变换的运动走势和持续不断的政治碰撞中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冲突理论”没有涉及也无法解释这些复杂现象，主要是因为它所考察的面过于狭窄，没有看到学生群体与工人群体以外的群体，也没有看到中央精英政治与地方群众运动之间的复杂互动。

“两个文革说”的偏误，在于过分强调了群众性“造反”运动的主观自觉性，过于强调了人们对现行体制的不满和反抗的勇气。这显然是基于某些激进的个体经验所得出的对群众心理的严重误读。它忽略了在所有社会资源被权力独占性垄断的情况下，一般社会公众必然产生的人身依附意识和严重的犬儒主义倾向。从这个意义上讲，无论在精英政治层面还是在群众运动层面，文化大革命本身都没有任何积极意义。这不是一场真正的社会革命，而是在思想愚昧和强权胁迫双重作用下发生的动乱。文化大革命后期出现的、在后文化大革命时期得到确认的社会意识转变和中国发展道路的转变，并非源自文化大革命理念与实践本身，而是源于人们借助经验理性对文化大革命理念和实践及其灾难性后果的反思。

笔者对“社会冲突理论”和“两个文革说”的批评和质疑，并不意味着对社会史视角的否定。笔者不赞同的是采用孤立的、静止的、片面的观点看待和解释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或者是基于某些特定的个体经验来推导一般社会心理。采用社会史视角考察文化大革命运动，最大的意义在于揭示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的多重动力。如本文所述，单位内部和地方上固有矛盾的存在，内在地规定着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的具体形态和发展趋势。各种政治势力为了最大限度地维护自己的利益，常常对中央指示加以自主诠释与策略性运用，有时甚至对中央指示阳奉阴违，无疑大大削弱了中央的实际政治影响力。从这个意义上讲，将文化大革命动乱的责任完全归咎于毛泽东个人是有违历史事实的。体制性因素的作用显然要大大超出个人因素的作用。

然而对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多重动力的强调，并不意味着毛泽东没有责任。混沌理论说：“一只蝴蝶在巴西煽动翅膀，引发了数月后德克萨斯州的一场风暴。”本文和其他以社会史视角切入的研究所关注的重点，是后面那个放大效应的过程。